

# 融合不是刚性结合

撰文/科文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日益增强，现在的高科技成果大都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文物保护取得的任何一项骄人成绩，也无不呈现交叉融合的特征。

在10月23日召开的文物保护与科技融合战略研讨会上，融合，又一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文物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依靠科学技术，需要将文物保护的需求与科技相融合。这是大家早已形成的共识，关键是怎样融、怎样合。文物保护与科技的融合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也不是二者之间的刚性结合，而应该是两者水乳交融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因此，文物保护与科技的融合应有几层意思。

第一，文物保护与科技的融合，不是与单一学科的融合，而是与所有已知的和潜在的相关学科的融合。文物保护与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这决定了文物保护不可能只依赖于某几个单一学科来实现，而是要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科体系的日益丰富，综合尽可能多的学科知识。文物保护与科技的融合，孕育着一个关于文物保护科技的复杂巨系统。

第二，文物保护与科技的融合，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对科技成果的创造性转化。人类创造的大量先进科技成果，在不同领域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个领域表现出众的科技成果，就一定完完全全适用于其他领域。所以，文物保护与科技的融合，必须要针对文物保护的实际需求，要适应文物保护的特殊要求，通过部分的或完全的创新，得到文物保护

真正需要的科学技术。

第三，文物保护与科技的融合，外化于物与物的结合，其实质则是人与人意识的交流和知识的互通。人是保护文物与发展科技的主体，文物保护与科技的融合，关键在于两方面人的“融合”。一则是促进双方的互知互通，二则是培养尽可能多的复合型人才，使科技部门更容易明晰文物保护的需求，让文物保护部门更清楚科技的潜能。只有实现了人这一层面的融合，才能真正达到文物保护与科技融合的目的。

融合大都是循序渐进的，文物保护与科技的融合同样需要一个相知相识相融相合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这首先需要文物保护专家与科技专家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同时，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机制，为文物保护与多学科的融合营造良好环境，将学科间、领域间个别的、自发的、小范围的合作向普遍的、有组织的、系统的合作推进。我们有过不少单纯的技术引进或材料引入，也有过较大项目的多学科合作，两支力量如何在适当的合作模式下，在理念和才智等诸多方面碰撞出时代的火花，聚焦文物保护，实现合作共赢、协同创新，既是提升文物科技保护水平的关键所在，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融合战略的形成，是文物科技保护万里长征第一步，未来的道路很长，前景也很广阔，有理由相信，科技与文物保护两支队伍脚踏实地携手前进，定能不断谱写出文物科技保护的新篇章。

江阴文博

(原载《中国文物报》2012年11月2日第一版时评)

俞伟超题

# 江阴文博

2012年第2期

·总第28期·

(内部刊物)

## 目录 CONTENTS

### 特载

- 融合不是刚性结合 ..... 科文

### 考古发掘

- 江阴市周庄镇陶城遗址勘探试掘简介 ..... 高振威 周利宁(04)

### 文物研究

- 论古籍牌记的设计及其作用 ..... 缪皖苏(07)

#### 留得残荷听雨声

- 品读淮上高士边寿民《墨荷图》 ..... 陈健智(12)

- 新四军发行的江南商业货币券 ..... 林嘉华(14)

- 董其昌昆山二图考略 ..... 刘徐昌(18)

- 光绪青花人物瓷碟赏析 ..... 邬红梅(22)

- 紫泥清韵润文化 ..... 高振威(25)

#### 捏泥问火试新腔

- 陶瓷印散谈 ..... 蒋瑾琦(28)

### 博物馆学

- 体验古陶瓷修复 ..... 杨华丽(30)

#### 浅析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开发

- 以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旧址为例 ..... 孙巍涯(32)

- 浅谈利用多种渠道吸引观众走进博物馆 ..... 周家坤(36)

### 历史钩沉

- 孙中山视察长江要塞百年祭 ..... 徐泉法(38)

#### 不朽声音越百年

- 纪念孙中山先生莅澄演讲100周年 ..... 汉竹(45)

- 孙中山视察江阴 ..... 程以正(47)

- 关于暨阳县治历史纷争之我见 ..... 徐祖白(49)

古暨阳湖考	宋炳良(52)
范仲淹景祐兴学与江阴重修文庙	贡振亚(55)
徐霞客的“溯江纪源”与江阴人的实验精神	徐敏(58)
乡情·旱情·疫情 ——读《爱吾庐诗钞》 赋绝人寰惨象	刘湘和(59)
秦望山名称考说	陈锡良(64)
柳宝诒与致和堂膏滋药	王晓燕(68)
孙逊群(孙选)年谱	江沙瞿涌晨(70)

## 文化遗产

浅议江阴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结构及建筑特色 .....	祝君凯(72)
古刹钟声·悟空寺	贡金城(77)
漫话夏港万安桥	陆云湘(80)

## 谱牒研究

江阴姓氏源流考略(十) 孙氏	刁文伟(82)
----------------	---------

## 非遗拾珍

中国民间器乐合奏《十番锣鼓》	邵振良(87)
----------------	---------

## 追忆怀念

亚蒙先生	唐汉章(89)
------	---------

## 自然科学

森林卫士——啄木鸟 ——江阴博物馆馆藏鸟类标本掠影(二) .....	符蕴(93)
---------------------------------------	--------

## 大事记

2012年江阴市文博大事记	(95)
---------------	------

## 文博信息

江阴博物馆通过市档案局年度评估	(17)
江阴博物馆与杭州官窑博物馆、上海闵行博物馆进行馆际交流	(24)
江阴博物馆参加第二届石峁玉器研讨会	(27)
刘氏兄弟故居被授予无锡市第二批社科普及示范基地	(35)
江阴博物馆获中国自然博物馆协会优秀工作者	(54)

## 主办单位:

江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江阴市文广新局  
江阴市文化艺术集团  
江阴市博物馆

顾问:袁秋中 倪颖伟  
龚振东 黄磊  
刘卫星  
主任:钱晴 董录科  
副主任:杜颖波 韩峰  
翁雪花  
编委:刁文伟 高振威  
邬红梅 孙军  
武宝民 唐汉章

主编:唐汉章  
编:邬红梅  
务:符蕴  
美编:孙军

《江阴文博》编辑部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路128号  
邮编:214431  
电话:0510-86862683  
电子邮箱:jymuseum@sina.com  
印刷:无锡市海得印务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苏出准印 JSE-001654  
出版日期:2012年12月

# 江阴市周庄镇陶城遗址勘探试掘简介

撰文/高振威 周利宁

陶城遗址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陶城村城头上自然村，俗称城头上，是一处坡形台地，遗址本体南北最长223米，东西最长304米，面积约6.8万平方米，最高处现距地表3.1米。东部为水塘和城头上村，南为水塘、水田，西本体为工厂，北为农田和村道。一条水泥村道将遗址本体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为工厂，北部西为工厂，中为民居和卞氏宗祠，向东是现代坟地和村民的芝麻地。2012年7月至9月，为了配合周庄镇陶城村公园的建设，江阴博物馆考古部对陶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试掘。

遗址本体南部因1968年建窑取土被挖成水塘，以新修的卞氏宗祠东南角为基对点，对保存相对较好的遗址北部进行重点勘探，对遗址本体外的低洼地进行选择性勘探。

从勘探的情况看，该遗址本体北部大致可以分为四层：

①层，现代耕土，深0.3-0.5米，黄色，夹杂建筑垃圾；

②层，厚0.7-1.9米，黄褐土，土色西北偏黄，下部夹杂少量炭粒和红烧土颗粒，东南偏褐，夹杂少量炭粒和红烧土颗粒；

③层为灰褐土，厚0.3-1.2米不等，夹杂较多炭粒和红烧土颗粒，东部高地最厚，局部较松软，现代坟地和南部工厂附近未发现该层，西北也有部分探眼无该层；

④层，黄土，土质细密结实，夹杂铁锈斑，北部边缘部分上部偶尔夹杂极少青泥。

遗址本体外，北部水塘边、西部工厂、南部水塘南部约1.7米下均发现土质松软的淤泥层，可以推断该遗址是一个人工堆筑的土台，四周为围绕遗址的河道。小河道南、西、北部被填平，仅存东部，也被分割成四个小水塘。遗址本体被村道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因建窑厂取土的剩余部分也被工厂所覆盖；北部被取土破坏，地表高低不平，地面可采集到夹粗砂的红陶、原始瓷和印纹陶片。东部芝麻地最高，与现代坟地的落差有1.5至2米。现代坟地深1.5米左右土质松软，含有大量水分，探铲无法带出泥土，据村民回忆该处原有河道，大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左右被填平。

勘探的②、③层土色并不纯净，有探眼出现黄褐土中夹杂较薄的灰黑土或者灰黑土中夹杂较薄的黄褐土的情况，为进一步了解遗址的堆积情况，对遗址北部进行了试掘。在遗址北部东南角和西北角，各布2×10米的探沟1条，编号为TG1，TG2。

TG1南北宽东西窄，发掘3.5米深至生土，可以分为5大层：

第①层为现代耕土，深0.2-0.3米，质地松软；

第②层为堆填杂乱的堆土，厚1.2-1.7米，出土陶片极少且细碎，主要是夹砂红陶；

第③层为黄土和灰黑土交替堆填的平整土层，厚1.1-1.5米，夹杂少量红烧土颗粒，除出土少量夹粗砂红陶片外，在靠近西壁和靠近南壁中部发现有兽骨若干，无规律，为随意放置在该层；

第④层为黄土，夹杂大量红烧土颗粒，出土

少量夹粗砂红陶片；

第⑤层为黄色生土。

TG2,东西宽南北窄,至发掘结束发掘至2.1米深。共可分为5层：

①层为耕土,厚0.3-0.68米,土质松软,夹杂砖块等建筑垃圾,质地松软;

②层为黄土,厚0.1-0.64米,土质软,砂性,出土有石块和陶瓷片若干,有夹砂陶、泥质陶和原始瓷;

③层灰黑土,厚0.40-0.46米,土质板结,夹杂炭粒,出土大量夹砂、泥质陶片、印纹硬陶片和少量原始瓷片,特征与②层相似;

④层黄土,厚0.39-0.5米,土质硬,夹杂红烧土颗粒和炭粒,该层近底部夹杂有较多红烧土颗粒,出土少量细碎夹粗砂红陶片,特征与TG1④层相似;

⑤层为黄色生土。

TG1、TG2均未发现任何遗迹现象。

TG1出土遗物有陶器和兽骨。兽骨有肢骨和牙齿,骨质已酥,无法提取。陶器绝大多数为夹粗砂的红陶片,唯在②层发现一片泥质红陶片。夹砂陶片都细碎,仅能辨识的器形是釜的腰檐,大多素面,仅在一片陶片上有三道弦纹,一片陶片上有红色陶衣。

TG2出土遗物为泥质陶器、夹砂陶器、原始瓷器和硬陶。④层出土的陶片较少,都是夹粗砂红陶,陶片小,无可复原和作为标本的。②、③层出土陶器陶色、陶质都十分相似。

②层出土陶片、原始瓷片不多,软陶占近三分之二,硬陶次之,原始瓷片最少。软陶中泥质陶占绝大多数,泥质与夹砂陶中灰陶又较红陶多。在纹饰上素面最多,方格纹片、折线纹、席纹等次之。原始瓷多素面,仅有一片使用戳印纹,器形为碗、盂等小型器物。硬陶拍印有方格纹、折线纹、填线大方格纹、回纹,也有折线纹加方格纹这样的组合纹饰,皆为釜、罐类器物腹片。泥质陶的纹饰采用的是硬陶常见的席纹、方格纹、回纹等,也是釜、罐类器物的腹片。夹砂陶纹饰有绳纹,是

鬲、鼎类器物的残片。无可复原器物。

③层出土大量陶片和原始瓷片。泥质陶最多,占该层所出陶瓷片的52%,其中又以泥质灰陶较多,主要为拍印席纹的釜、罐、盆类器物,夹砂陶占15.7%,多饰细绳纹,有烟炱痕迹,器类有鼎、鬲、釜等。原始瓷较少,占5.7%,多素面,饰戳印纹、水波纹、“S”形纹等,器类为碗、盂等,复原器较多。硬陶占26.6%,坛、罐类大型器物较多,拍印纹饰有席纹、方格纹、回纹、菱形填线纹、折线纹或其组合纹饰。

《江阴县志》记载,陶城遗址“南唐时屯戍之所”,1968年出土陶器100余件,云雷纹青铜鼎1件。1978年烧窑取土,陆续发现60余口古井,出土数百件陶器,以及少量石器。加上历年来零星出土的,出土器物的年代由新石器时代至明清,其中以春秋时期陶器出土最多。

此次勘探试掘证实,该遗址是个人工堆筑的土台。两个探沟底部夹杂大颗粒红烧土的④层为同一层,出土有意砸成小块的夹粗砂红陶,从可辨识的釜陶质、陶色、器形判断,主要流行于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在太湖北部地区崧泽文化中期如江阴南部的南楼遗址还能见到<sup>①</sup>。TG1②、③层为土台堆土,其中年代最晚的梯格纹陶片显示堆筑年代不晚于商周时期。TG2②、③层与TG1不同,出土大量周代的泥质、夹砂陶片,少量原始瓷和硬陶片,其中主要是生活用的炊器、盛器,是个生活垃圾的处理场,破損的陶器被直接丢弃于此。

TG2②、③层出土的原始瓷和硬陶器与太湖北部和浙江发现的同类器物相似。夹砂陶器和泥质陶器来源相对复杂,纹饰多来自硬陶的主流纹饰,而盆、釜、鼎的敞口造型在本地区余城遗址夏商时期同类器物有一定渊源<sup>②</sup>。综合TG2②、③层出土器物的器形、纹饰特征,其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

周庄镇历来有“山(砂山)北七十二个墩”的传说,除陶城遗址南部的砂山上石室土墩外,至今还有近十个土墩分布在陶城遗址的周围,大多

为春秋时期建于平地的土墩墓<sup>③</sup>。从往年发现的大量水井和TG2出土的大量生活用器判断，陶城遗址在春秋时期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居住址，而其确切的始建年代和堆积性质还有待于今后的正式发掘。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博物馆考古部)

## 注释：

- ①江苏江阴南楼遗址联合考古队：《江苏江阴南楼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7期，第12页，图十五：5。
- ②江苏花山遗址联合考古队：《江阴花山夏商文化遗址》，《东南文化》2001年9期；江苏余城遗址联合考古队：《江阴余城遗址试掘简报》，《东南文化》2001年9期。
- ③陈晶、陈丽华：《江苏省江阴县大松墩土墩墓》，《文物》1983年第11期。



原始瓷孟



原始瓷孟



原始瓷碗



原始瓷碗



原始瓷豆



泥质陶盆

陶城遗址 TC2 出土器物

# 论古籍牌记的设计及其作用

撰文/缪皖苏

牌记，是出版者用以说明版本情况的一种专门标志，又叫牌子、书牌，或称书牌子。牌记主要记录刊刻时间、刊刻地点、刊刻者姓名、室名、书坊字号、版本特点以及刊刻经过。带有牌记的书籍起源于唐、五代，到了宋、元，已广为推行，但最多的还是明、清两代的刻本。最初的牌记只是无边框的题识，后来发展到在文字的周围框以方格，明代以后牌记渐渐减少，以至于后来演变成封面的一部分。

牌记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书商在刻书的时候，为了引起人们关注；为了树立自己的品牌，说明自己版本优良；为了使书畅销；还有就是防止别人模仿，保护版权。

在官刻本中就没有牌记，那是因为官方不需要营利，官刻本本身具有权威性。牌记是书商的发明创造。

## 一、牌记的演变

### 1. 宋代牌记发展状况

最初的牌记大多没有边框的刊语或题识，宋建本的牌记大多跨两行或几行刻制，一般包含有书坊或书坊主人名称。宋浙本一般官刻居多，而且所刻的牌记大多比较规整，死板，牌记的形式也没有很大变化。浙本是一行几行字，建本加方框居多。如《南宋建炎三年前杭州钟家课本文选五臣注》卷三十后题有“杭州猫儿桥开牋纸马铺钟家印行”<sup>①</sup>一行，建炎三年（1126）时，杭州被升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定都临安，从这里可

知道这本书应该是刻于建炎三年前。临安府绍兴九年刻《汉官仪》卷末有“绍兴九年三月临安府雕印”<sup>②</sup>，一行共十一字，这里简单的记述了刻书的年代，刻书的地点，刻书的方式，而形式很简单。后来渐渐的在刊语的上下加上横栏，而左右仍然是原有的行格线，比如绍兴三十年《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卷一后的牌记是“饶州德興莊谿蒙龍應夢集古堂善本”<sup>③</sup>，此时的横栏有点墨围的感觉，它很好的体现了牌记从无墨围到有墨围的转变。

### 2. 金元时代牌记发展状况

到了金元的时候，外形设计相比宋代更加多样化，不仅是内容更加丰富了，牌记也比宋代更加美观了。元建本的牌记使用更加普遍，而且花式比宋建本更多，如钟形、鼎形等。极少有刻书序跋，没有宋代序跋出现的多。元代的平水课本有的有牌记，说明是平阳的书坊所刻的。这个时候牌记在一本书出现的频率比宋代的要多。

### 3. 明代以后牌记发展状况

明代的牌记渐渐减少，有牌记的不多见，《莲谷先生读易索隐六卷》中的牌记“嘉靖丁未季春吉旦顺裕堂刊”<sup>④</sup>，还有《新编录鬼簿二卷》<sup>⑤</sup>后有牌记。后来渐渐出现了封面，加刻在全书前书衣后。它一般竖分三栏，右边刻撰者或校订者，中间刻书名，左边刻书堂名，牌记则基本消失。这种封面的出现对现在书籍版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二、牌记的设计

### 1. 简洁型

简洁型的牌记就是形式很简洁，内容也不多，比如书棚本的牌记就一般比较简洁。何谓书棚本？书棚本就是因为南宋时期刻书事业比较发达，当时临安府的棚北大街开设书坊比较多，所以藏书家就称这一带的书坊为“棚本”，如《唐女郎鱼玄机诗》它的卷末就写着“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图1)；《朱庆余诗集》卷末“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图2)；《王建诗集》卷末是“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刊行”(图3)；《文粹》卷末是“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宅刊印”(图4)；《书继》的卷尾是“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图5)，虽然它们牌记略有不同，但是它们都是出自同一个刻书地点。还有《李丞相诗集卷上》卷后是“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印”(图6)牌记一行，它的版式与上面的几乎相同，它们都是书棚本中的上品之作。《国朝文类》其后曰“右下杭州路西湖书院准此”(图7)，《周礼注》卷三后有“婺州市门巷唐宅刊”(图8)牌记，卷四卷十二后有“婺州唐奉议”牌记。还有眉山课本《新编近时十便良方》的总目录后面是“万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检用，请详鉴”(图9)二行十八个字。

### 2. 醒目型

醒目型就是牌记给人的感觉很醒目，让人一目了然。《三苏文粹》的目录后的牌记说“婺州义乌青口吴宅桂堂刊行”(图10)，它的形式就是四周双栏黑框，傅增湘曾经在《藏图羣书经眼录》中称这本书“字体俊整，镌刻精湛”此话不假。《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其后曰“建安余氏勤有堂刊”(图11)篆书牌记，与正文字体完全区别开来，又如，《史记集解序》书后有方形牌记，中间有竖栏，上写着“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图12)，而《资治通鉴》中在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后空一行记载“鄂州孟太师府三安抚位刊梓于鹄山书院”(图13)，牌记中的字比正文要略粗一些，但是它的牌记中间没有竖栏，是一个整体。与此相同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卷后是“建安黄氏刻梓”

字体是篆书，与正文字体有所不同，让人印象深刻，《汉唐事笺对策机要》也是中间没有竖栏的方框，里面写着“至正丙戌日新堂撰”(图14)，《朱子成书》长方牌记是“至正元年辛巳日新书刊行”(图15)，《广韻》的牌记是“泰定乙丑菊节圆沙书院刊行”(图16)。元代《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其后曰“延祐丁巳孟冬圆”(图17)，《周易程朱传义》后是方形牌记“至正己丑庐陵竹坪书堂新刊”(图18)，《后汉书》目录后面有牌记曰“时嘉定戊辰季春既望，刊于一经堂，将诸本校證，并无一字差訛舛”(图19)，而《唐书目录卷上》空一行写着，“建安魏仲立宅刊行，收书贤士伏幸详鉴”(图20)，牌记字体是有点行楷的味道，书的刊刻工艺比较精细，刀法比较险峻，这类牌记让人一眼就能看见，自然能很好的被记住。

### 3. 图案型

图案型一般是它的形式是以各种图案出现，不同于前面的醒目型，简洁型的牌记。图案型的牌记以元代以后居多。《后汉书》的目录后面是牌记五行，写着“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正，并写作大字，侵板刊行的无差错”(图21)，它左右的框线还是原来的竖栏线，与前面简洁型牌记不同的是，它上下不是醒目型大方框，而是呈波浪形的花边，并且波浪下方还有小圆圈作装饰，乍一看，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窗帘，创意新颖。元代《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目录有钟式牌记说“延祐丁巳”鼎式牌记“圆沙书院”(图22)，给人以新鲜之感。《昌黎先生集》卷后有篆书牌记“世綵廖氏刻梓家塾”(图23)八个字，牌记的样式是大方框，而且其四个角各有四分之一的圆。类似此类牌记样式的《论语》，卷末有“盱郡重刊廖氏善本”(图24)。《河东先生集》卷后牌记是“世綵廖氏刻梓家塾”(图25)，字体也是篆书，但是牌记的形式是椭圆形。《春秋经传集解》六第二十五卷后是矩形的牌记形式，上写着“相臺岳氏刻梓荆谿家塾”(图26)；第二卷后则是长方形的牌记，上面内容相同(图27)。《春秋穀梁传》卷末是隶书小木记曰“余氏万卷堂藏书记”(图28)，它的图案是大方框，四

个角各被挖去四分之一的形状,与上面的牌记形式正好相反。虽然《孟子》《论语》是重新刻的,但是它们雕刻的很精美,也是很难得的。魏天佑中和堂至元二十六年(1289)至二十八年刻的《资治通鉴》书序后有“矩鹿奉国”(图29)爵式木记,“容齐”圆形木记,“中和堂”的方形木记,这说明此时牌记在书中出现的频率增多了。《集千家注杜工部诗》目录后有钟形牌记,中间空着没有写字,下面是“勤有堂”(图30)鼎形牌记。《故唐律疏议》的牌记是“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图31),它的形状是在方框形的基础上,四个角呈海鸥花边状。

#### 4. 宣传广告型

宣传广告型就是对书作广告。元至正十六年(1356),翠岩精舍刻本《广韵》的扉页有长方形牌记(图32),上部横眉有“翠岩精舍”“校正无误”两行字,中间是“新刊足注明本广韵”八个大字,右侧是“五音四声切韵图谱详明”,左侧是“至正丙申仲夏绣梓印行”。这些充满溢美之词的文字显然起到吸引读者,宣传该书的目的。元天历三年(1331)广勤书堂刻《新刊王氏脉经》序后长方形牌记云:“天地以生物为心,故古之圣贤,著书立论,教人以智而济人之生也,得其书而自秘者,岂天地圣贤之心乎。夫治病莫重于明脉,脉法无出于王氏脉经之为精密。本堂所刻,不欲自秘,先以针灸资生经梓行矣,今复刻脉经与众共之,庶以传当世济人之道,且无负古人著书之意云。时天历庚午仲夏建安叶日增志于广勤书堂。”<sup>⑥</sup>这里不仅极力宣传该书优点,还将已刻之书提出一并广告。

### 三、牌记的作用

#### 1. 版权作用

宋眉山本《东都事略》有“眉山程舍人斋刊刻,已申上司,不许覆板”的长方形牌记,同现代书籍版权页印刷的“版权所有,不得翻印”没有什么差别,显然当时的刊刻者已有版权意识,这和现在的版权归谁所有一样。明万历刻本《月露音》牌记云:“杭城丰东桥三官巷口李衡刊发,每部纹银捌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sup>⑦</sup>这体现了刊刻这本书的

人非常有版权意识,从千里究治可以想象如果你翻刻了,即使你离得再远也会找到你。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赵本山《不差钱》中丫蛋的台词“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在我们一笑之余,可以看出当时的版权意识之强。再看明万历刻本《大明万历七年岁己卯大统历》牌记云:“钦天监奏准印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sup>⑧</sup>这个程度更严重,伪造者要被处斩,能发现伪造者的人有赏银,在这么强烈的制度下,伪造者很少。想想我们现在的状况,盗版产品到处都是,从图书到生活用品,盗版的图书错别字连篇,这给我们阅读造成很大的不便;盗版的生活用品质量不行,也会对身体造成危害……那为什么现在这些盗版的东西屡禁不止呢?归根究底还是惩罚力度不够。像古代的“千里必究”“依律处斩”,而我们的法律并没有这么严厉的处罚,所以盗版者才屡禁不止,如果盗版者都能自觉遵守法律,那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 2. 广告作用

牌记具有广告性质,是从宋代就有了。如宋刊本东莱先生的《诗律武库》三十卷,书前有牌记曰:“今得吕氏家塾本手校武库一帙,用是为诗战之具,因可以扫千军而降敌。不欲秘藏,刻梓以诸天下,收书君子伏乞详鉴。”<sup>⑨</sup>前文提到的元天历三年(1331)广勤书堂刻《新刊王氏脉经》序后长方形牌记也具有广告作用。

#### 3. 版本鉴定作用

一般来说,鉴别版本的依据是根据书的字体,版式,纸张的情况,书籍的牌记,避讳,书的刻工,可见牌记对书籍版本的鉴定有着重要作用。例:明正德本《文献通考》,目录后刻有“皇明正德戊寅慎独精舍刊行”牌记和卷348末刻有“皇明正德己卯岁慎独斋刊行”牌记,由此可证明此书是正德十三(1518)年至正德十四年刻成。牌记上反映的著者、编辑者、校勘者,能给鉴定者提供真实可信的版本依据。例:同治甲子年刻本《唐人说会》封面栏上横题:同治甲子冬镌,右刻:长沙周

愚峰订,山阴陈莲塘辑,左侧下方刻:双门底纬文堂藏板,由此让鉴定者正确无误地判断出刻本年代、校订者、编辑者以及藏板处。牌记上出现藏板者、版刻地、刻工名以及刊刻经过等文字,能给版本鉴定者鉴定版本、考订版本源流提供重要的参考。例:元刻本《论语》,各卷卷末刻有一处长方形或椭圆形的牌记,其中写着“盱郡重刊廖氏善本”。由此可以知道是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的重刊本。又例:明嘉靖间宗文堂刻本《皇明文衡》的目录后有牌记曰:“《皇明文衡》一书,原版出在金陵,乃於我朝名贤之所著,纂集百余卷。今书坊宗文堂购得是本,命工刊行,以广其传,四方君子幸为鉴焉。”据此可知宗文堂本出自金陵原刻。

一些独特造型的专用牌记,还往往能给版本鉴定者据此判定版刻年代提供有力的证明。例:南宋咸淳间廖莹中世彩堂刊本《昌黎先生集》,用的是“亚”字形牌记,中间篆书“世彩堂廖氏刻梓家”二行字。据《古籍版本学概论》一书记载: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旧刻本《颜氏家训》,曾经过清代名家何焯、孙星衍、钱大昕、黄丕烈等人鉴定,宋椠元刊,莫衷一是。最后还是根据刻本中一个琴形牌记“廉台田家印”确定为元刻本,因为这个特殊图案的牌记只在其他元刻本中出现过。<sup>⑩</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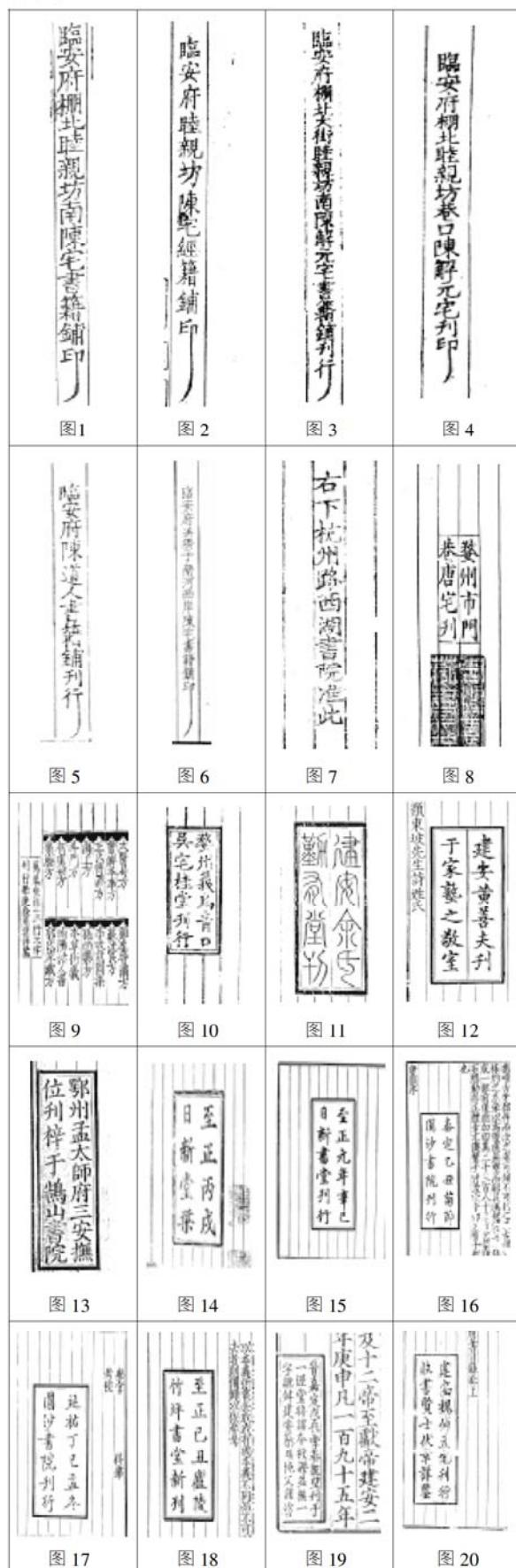
#### 4. 艺术美化作用

还有的牌记的形式比较美观,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比如咸丰七年梁氏十二石山斋本《笏以诗》即有钟鼎形牌记。明万历四十年书林余仙源刻本《新锓钞评校正标题皇明资治通纪》,此书牌记,上覆荷叶,下托莲花,独具一格。蒙古定宗四年张存惠晦明轩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sup>⑪</sup>刻有长篇牌记,顶部二龙飞舞,底部双龟静伏,图形巧思异构,风味别调。好的艺术设计能使人有很深的印象。它还体现了刊刻牌记的人的智慧和巧妙的构思。

#### 结论

牌记从宋代开始出现,到了元代从原本的简单到繁复,在书中出现的频率也增多,字体也有

附录:



## 附录:



很多变化,体现了古代刻书者的创新意识,是一本书中特别有艺术匠心与艺术价值的部分。虽然牌记对于鉴定书籍有作用,但是只是光看牌记来鉴定书籍会发生偏差,所以不能单单仅看牌记,还要从其他方面来研究。牌记中的文字比正文要活泼,许多也是很好的书法作品。研究牌记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信息。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博物馆藏品保管部)

## 参考文献:

## 著作类:

- [1] 林申清.《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 [2] 时永乐,王景明《古籍牌记的起源与价值》
- [3] 顾惠冬.《牌记在古籍版本鉴定中的作用来源》南通市博物馆
- [4] 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5] 王荣国.《辽宁省图书馆馆藏古籍精品图录》.沈阳:沈阳出版社,2008
- [6] 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7] 黄燕生,林岩《版本古籍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 [8] 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 [9] 朱学波.《古籍版本》.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 [10] 魏隐儒,王金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
- [11] 时永乐.《古籍整理教程》.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 [12]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13]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 期刊类:

- [1] 王若.《试谈“牌记”产生的年代》.大连市图书馆,
- [2] 张天星.尺寸之间见筹谋——明清小说刊本封面、内封与牌记设计的促销策略及价值,2007
- [3] 朱亚莉.《牌记与版本鉴定》.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0,(04)
- [4] 门凤超.《古籍牌记的特点》.新世纪图书馆,2008(02)
- [5] 时永乐,王景明.《古籍牌记的起源与价值》.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8(01)
- [6] 顾惠冬.《漫谈古籍牌记》.图书馆杂志,2002(06)
- [7] 马智忠.《浅谈古籍版本中的牌记》.唐山学院学报,2008(05)
- [8] 王若.《“牌记”与“书末题署”的比较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02(11)
- [9] 朱亚莉.《牌记与版本鉴定》.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0(04)

## 注释

- ①林申清《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52页
- ②林申清《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19页
- ③林申清《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30页
- ④王荣国《辽宁省图书馆馆藏古籍精品图录》.沈阳:沈阳出版社,2008 第79页
- ⑤王荣国《辽宁省图书馆馆藏古籍精品图录》.沈阳:沈阳出版社,2008 第156页
- ⑥王若《浅谈古籍版本中的牌记》.大连市图书馆
- ⑦马智忠.《浅谈古籍版本中的牌记》.唐山学院学报,2008(05)
- ⑧马智忠.《浅谈古籍版本中的牌记》.唐山学院学报,2008(05)
- ⑨黄强祺.《古籍牌记简述》.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55页
- ⑩顾惠冬.《牌记在古籍版本鉴定中的作用》.南通市博物馆 第16卷第一期 2002年3月
- ⑪顾惠冬.《漫谈古籍牌记》.图书馆杂志,2002(06)

# 留得残荷听雨声

## ——品读淮上高士边寿民《墨荷图》

撰文/陈健智

在中国古代绘画历史上有一个享誉盛名的画派——扬州八怪。扬州八怪并非是我们传统理解上的八个人，“八”字并不专指某八个人，实际上是泛指清代中期活跃于扬州画坛的一批画家，这个团体大约有十五人左右。这些画家风格怪异，艺术个性鲜明。除了我们熟知的金农、汪士慎、郑燮等人外，边寿民亦是“扬州八怪”中艺术造诣精深，风格独特的一位。

边寿民（1684年—1752年），江苏山阳（今淮安）人，秀才，清代著名花鸟画画家。初名维祺，字颐公，又字渐僧、墨仙，号苇间居士，晚年又号苇间老民、绰翁、绰绰老人。以画芦雁驰名江淮，有“边芦雁”之称。其泼墨芦雁，苍浑生动，朴古奇逸，极尽飞鸣、食宿、游泳之态。泼墨中微带淡赭，大笔挥洒，浑厚中饶有风骨。又善以淡墨干皴擦小品，甚为佳妙。因画芦雁，故颜其所居“苇间书屋”。他又工诗词、精中国书法，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清代“扬州画派”代表人物之一，凌霞《灵隐堂集》和黄宾虹《古画微》都将其列入“扬州八怪”。



在江阴市博物馆的书画藏品中，就有一幅边寿民的《墨荷图》。此幅《墨荷图》为1989年陶白捐赠。<sup>①</sup>当代著名的书画鉴定家评论家萧平先生在为纪念陶白诞辰一百周年的《大柏有高风》一书中就提到：“一幅清代淮安画家边寿民的墨荷妙品，大约是‘十年动乱’后期他（陶白）被贬流寓扬州时所得。”

打开画卷，呈现出了一派经受暴风骤雨洗礼之后的荷塘一隅。残破的荷叶或随波浮沉，或濯然独立，出污泥而不染，亭亭静直，香远益清的荷花在叶片中掩映成趣，清妍优美，参杂其中的苇草遒劲飞动。用水墨阔笔铺染的荷叶片，硬朗而丰腴，清新幽香。用中锋写出荷茎、苇草，浓淡干湿，轻重缓疾同时兼用，整体笔墨虚实相生，烘染出恬淡宁谧的氛围。

细观此“墨荷图”，纸本，纵63厘米，横110厘米，系一幅写意荷花，略施赭色，大部分以墨笔为之。画幅右有一题“一尘不染”，落款“边寿民写”，有印两方：上一钤印白文“颐公”；下一钤印白文“寿民”。在整幅画的左边空白之处，画家又后题诗一首：“乱泼松煤奥（念阿）太狂，荷花荷叶满横塘。停毫欲就骚人间，还是花香是墨香。”另再加一钤印白文“绰绰老人”。（见图）

通过欣赏边寿民存世的绘画作品<sup>②</sup>，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绘画风格总体上用色较少，其作品多以墨色表现。这一绘画特点在这幅《墨荷》图上就体现的非常鲜明。纵观此画，画中荷花花茎、莲蓬、苇叶的线条以书法用笔进行勾勒。《墨林今

话》谓其“写芦疏而劲”、“皆墨竹法也”。<sup>③</sup>他笔下的花茎、叶杆、苇叶密而不乱，疏而不断，有疏有密，随浓随淡，可燥可湿，既自然又富于生气，给人一种生动鲜明，意境高远之感。

边寿民的书法风格后人对他的评价是楷书中带碑意，非常的规矩平实，但是又不乏富有变化。在绘画时他把这种书写风格很有特色地融入进去了。此画中，画家这种用笔写出来的花茎叶杆质感非常好，莲蓬也是惟妙惟肖。平朴的荷叶在画家的笔下变的形象而又鲜活，花叶的翻转表现更加生动。画面左下方那张低垂的荷叶，用墨的深浅，表现出了花叶的正反两面。荷叶的背面以轻松的淡墨表现，正面则加以重墨。把本不容易表达出的这种交叠翻转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画中偏右方的那一朵大的翻转的荷叶，同样也是用墨的深浅，运笔自如地把荷叶的阴阳相背姿态描绘出来。使这两处翻转的荷叶立体感更强烈，整体造型更优美。整个画面墨色浓淡相融，形象生动。

另外此画还有一处值得让人细细品味之处，在画面右方那一朵大的翻转荷叶后面，画家把四面都画成了墨色，中间略施一点赭色，再加上前面那朵翻转荷叶交织在一起的层次感，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跃然绽放，在残荷败叶中鲜活灵动，这朵荷花亦是整幅画作的点睛之笔，它抹去了残荷给人带来的萧瑟、败落之感，传达出清远、宁静、温馨之情，笔简意繁，情溢画外，是画家的内心写照。结合到画家的生平，虽然一生穷困潦倒，却是那样地操履端方、大节弥高、风骨庄纯、道德馨懿。

边氏工于诗词，但是诗名为画名所掩盖，他经常参与“曲江诗会”，为当地的“曲江十子”之一。汪枚赠诗誉之“海内称其才，画诗字三绝”。写有大量的题画诗词，或即景抒情，或咏物谐趣。这些诗词写得平实灵动，淳朴自然，苍润处透出清雅，浑厚中显出骨力，超逸中生出理趣，极富韵味，且言简意赅，既诠释画面，又生发画意。他将写实与象征、具象与寓意相结合，展现出绘画艺术

与语言艺术两者妙合生趣、浑然成章所生发出特有的魅力。这幅《墨荷图》中的题画诗，诗中既有“荷花荷叶满横塘”这种写实的表现，又有“还是花香是墨香”这种寓意的体现。“花香”与“墨香”二和为一，溶为一体，这是一种境界，是画家的境界，是诗人的境界，更是中国文人心灵的境界，这种境界就叫做“一尘不染”。北宋著名的哲学家周敦颐有《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这其中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性格，深受中国古代文人之推崇。边寿民在画这张画的时候，实际就表达了这么一种心境和境界。

边寿民的人品和艺术品，在“扬州八怪”中独具风采。他的一生寒微竭蹶，境遇困穷。与其为人高洁、特立独行性情有关。自古论画，先论人品，文人画要素，更要讲究人品第一。清人松年在其《颐园论画》<sup>④</sup>中指出：“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笔墨，更钦仰其人。”今人潘天寿更是强调：“品格高，落墨自超。此乃天授，不可强成。品格不高，落墨无法。人格方正，画品亦高。”在边寿民身上，画如其人，不失当，人如其画，恰适宜。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博物馆陈列宣教部副主任)

#### 注释：

①陶白，江苏江阴人，著名的杂文家，在他晚年时期将他多年收藏的153件珍贵文献给家乡江阴市博物馆。这幅边寿民的《墨荷图》就是陶老众多捐赠文物之一。

②《扬州画派书画全集—边寿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③《墨林今话》中国清代画史著作。蒋宝龄著，其子蒋廷生续。全书18卷，续1卷，共记述乾隆中期至嘉庆、道光(1796~1850)年间的画家1560人。

④松年(1837—1906)字小梦，号颐园。松年，字小梦，生于清道光年间，蒙古镶蓝旗人，是清代晚期齐鲁的名画家，他的书画影响很大，是晚清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

# 新四军发行的江南商业货币券

撰文/林嘉华

八十年代，在苏南（江南）地区陆续发现了“江南商业货币券”的“壹角”、“贰角”、“伍角”以及“壹元”等四种。而在江阴也曾征集到“壹角”、“贰角”、“伍角”的这种货币券，现为江阴博物馆的收藏品。“江南商业货币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1939年年底至1941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由“江抗”部队在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西部）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发行并流通使用过的江南地方货币代用券。现将该券的发行背景、印制经过与票券种类及其发行后的作用与影响作一简述。

## “江南商业货币券”发行的历史背景

1939年5月，叶飞根据陈毅同志的指示，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东进纵队进入东路地区的无锡、江阴一带。

1940年5月，谭震林同志化名林俊，奉调入苏南东路，担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创建了以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西部）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当时在苏常太、澄锡虞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流通领域内，曾一度发生了市镇、农村辅币奇缺，其主要原因是日寇大肆搜刮战略物资，特别是对银元、银毫及铜元的大量掠夺，造成了市面上辅币的紧缺。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乱发辅币的混乱状况，商民买卖零找，有以邮票、火柴、草纸等代替。于是各街镇一些殷实商铺自制“代用券”在当地流通；有的用牛皮纸印成一分、

五分、一角、贰角等代用券，俗称“黄票”；有的用铜元加盖钢印改制铜币；有的用骨、竹、铝等烙印制成定价筹码。紊乱情况，达到极点，既无基金之保证，又乏法定之手续，致成任何人均可发行，出现了漫无限制的现象，一时纸券、竹筹、铝币等充斥市场，甚至赌场筹码亦皆通用，券面金额有分、角、一元固无论矣，五元竟亦有之，种类复杂，甲地之券，不能通用于乙地，使用者颇多困难。在此期间，市场上还出现日本军用手票，汪伪政权的“中储券”，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和关金券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财政金融之混乱，对江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危害极大。

根据以上情况，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苏南第二区经济委员会作出了“整理与取缔代币券并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的决定，而且准备发行“苏南商业货币券”后定名为“江南商业货币券”。

“江南商业货币券”的发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而且有充分的准备基金作保证。所以“江南商业货币券”发行后，信誉很高，深得群众信任，在江南抗日根据地得以流通无阻，并深受群众的普遍欢迎。

## “江南商业货币券”的印制经过与票券种类

1939年年底，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领导指示蔡辉（解放后曾任华东行政委员会财办主任，已故）筹办苏、常、太地区的流通券——“江南商业货币券”，又派吴福海到上海搞“流通券”的制版和印刷。吴福海秘密潜回上海，找到了他三十年

代在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的老同学柳溥庆(吴、柳二人都是二十年代的老共产党员),柳溥庆当时在“华东照相平版印刷公司”任经理兼总工程师,其弟柳培庆任公司“制版部主任”(柳培庆擅长铜版雕刻制版,和吴福海在“中华书局”同事过,关系也甚密切),他们商量印制苏、常、太地区的“流通券”分一角、两角、五角、一元等四种,用“四达银行”行名,由“华东照相平版印刷公司”秘密制版和印刷,为了防备警察局和敌人发现,“流通券”不印行名,行名另外做好照相铜版带到根据地再加印上去。“流通券”都是晚上秘密进行印刷,印好后由吴福海在海关工作的弟弟吴迪飞利用海关工作的有利条件,把印好、切好的“流通券”(实际上是半成品)夹在四周周围用“羊绒团”做伪装的大木箱中,装船后再亲自押送到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然后用印“东进报”的脚踏圆盘机再加印而成。

“江南商业货币券”的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元等四种,其版式分述如下:



①壹角券:长9.6厘米,宽4.8厘米,为粉红色票面。票面正中上方从右至左印有横书“江南商业货币券”等7个楷书,白底蓝字;四只角上均印有竖书“壹角”票值;居中从右至左印有横书“壹

角”票值,其下印有“037227”的印制号码,其左上角盖有“主任之印”印鉴,其右上角盖有“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印”印鉴;居右印有呈椭圆形古寺、石坊、河堤、石栏、宝塔图景;反面呈蓝色,四只角上呈椭圆形花卉图案里和正中呈葵花形图案与椭圆形图案里均印有“10”票值;在正中葵花形图案中印有横书“TENCENTS”英文票值;其下印有“1940”为印制年份。(券名、号码、印章都印蓝色)



②贰角券:长10.1厘米,宽5.5厘米,为蓝色票面。票面左上方从右至左印有横书“江南商业货币券”等7个楷书,白底红字;其下印有山门、华表、石桥、池栏、古树等图景;风景图案下从左至右印有“068652”印制号码;票面右上方葵花形图案中印有直书“贰角”票值;其下从右至左分四行直书“积成拾角兑付国币壹圆”,再其下从右至左横书“中华民国廿九年印”的印制年份,票面左上及下角葵花形图案中亦印有直书“贰角”票值。反面呈紫色,四只角上和正中印的“20”票值下从左至右印有横书“1940”为印制年份;其下从左至右印有“TWENTYCENTS”英文票值。(券名、号码、印章均套印红色)



③伍角券：长13厘米，宽6.1厘米，为桔红色票面。票面正中上方从右至左印有横书“江南商业货币券”等7个楷书，白底红字；其下左右两侧从左至右各印有“151376”印制号码，四只角上的葵花形图案内均印有横书“伍角”票值；正面居中的葵花形图案中印有大号楷书“伍角”票值；其左右两侧的葵花形图案中印有小号楷书“伍”字；其下右侧盖有“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印”印鉴；其下左侧盖有“主任之印”印鉴；其下从右至左印有横书“每拾角兑付国币壹圆”等9个楷书；再其下从右至左印有横书“中华民国廿九年”（公元1940年）等印制年份；票面的左右两边各印有一束稻穗图案；反面呈青色，四只角上和正中左右两侧呈葵花形图案中均印有“CENTS”，正中的葵花形图案中从左至右印有“FIFTYCENTS”英文票值。（券名、号码、印章均印桔红色）。

另外见到，该伍角券有加盖“苏北流通券”、“抗币伍角”等字样，据说是新四军北撤后在苏北地区使用的。

④壹元券：长15.7厘米，宽7.5厘米。淡黄翠绿色套印。中间花框内有大海及两艘帆船图景。左右两侧印有“壹圆”票值；四角印有“壹”字票值。下端正中印有“凭票掉付中华民国国币壹元”及“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印”的印制年份。左右两侧印有“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印”及“主任之印”篆体小

方章各一。票名的左右两侧印有“116476”印制号码。反面呈棕色。右上角印有孙中山像，左侧花框中印有“1”及“ONEDOLLAR”和“NATIONALCURRENCY”英文票值。左上角与右下角印有“1”票值。左侧下端与英文票值两侧印有“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印”（右）及“主任之印”（左）篆体小方章各一。发行年份为“1940”。（券名、号码、印章正面为红色，反面为黑色）。

以上票券均为凹版制，版模精致，纸质很好，印制质量甚高。该券主要流通在澄锡虞、苏常太等地区。反“清乡”时，有的抗属还把“江南商业货币券”用布、油纸包好藏于墙洞、瓦楞之中，解放后翻建房屋时，时有发现。此券，解放后先后在江阴、无锡、苏州、常熟西乡等均有发现，然其中一元券极为少见，颇足珍贵。

#### “江南商业货币券”发行后的作与影响

“江南商业货币券”发行之后，首先在澄南、澄东、沙州等地区流通，然后在苏常太地区流通。该券的发行，取缔了市场上以物换物以及私人发放的地方代用币，统一了市场的流通货币，给群众生活带来了方便，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它不仅使苏南东路通货稳定，物价平稳，广大市镇、农村有力地抵制了日伪货币，并为繁荣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生产做出了贡献，有力地促进了江南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另外，由于“江南商业货币券”占领了苏常太、澄锡虞广大农村，敌伪货币被排挤了，影响了日伪对江南农村的农产品与物资的掠夺，致使敌人深感惊慌。因此当时敌伪各大小报纸都有载文要求民众抵制使用该券，甚至以“捣乱金融罪”相威吓。今举例如下：

《虞报》1941年5月30日载：“新四军当此新茧上市、新麦登场之际，以经济委员会的名义，发行一种“江南商业货币券”。此券发源于邻邑江阴一带，逐渐蔓延苏锡等处，最近常熟西乡方面亦有流入。自经当局发觉非常震怒，立即严禁，凡收该货币者，即以捣乱金融罪论。”

《江苏日报》1941年1月19日载：“（本报讯）清

乡督察专员公署，前据警察队检呈抄获之匪共伪钞“江南商业货币流通券”……着即转饬第一区专员公署，通饬所属严密查禁外，并发帖大批布告，晓谕清乡地区民众一体周知，设(若)有已经误收此项“江南商业货币券”伪钞者，应立即焚毁，否则照使用伪钞罪从严论处，并须随时注意，如遇使用前项伪券之人，可就近向清乡机关举发，或扭交究办，案关扰乱金融，希望民众协同严为防止，毋使滋蔓云。”

以上两报刊严禁“货币券”流通，其时间前后，有半年之差，可见该券的流通是屡禁不止的。敌伪报纸对“货币券”布告晓谕，严禁使用，并以“从严论处”、“扭交究办”相威吓，这也反映了敌伪当局对抗币在江南地区的流通，他们是深感恐慌的！

“江南商业货币券”的发行是采用黄金、棉纱、粮食作为实物保证。首先在澄锡虞地区发行流通，继而在苏常太地区发行流通，成为当时苏

南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主要使用的一种抗币。后来在日伪清乡前夕，在新四军北撤时，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安全，“基金保管委员会”向群众用黄金、布匹、粮食等收兑，绝大部分的抗币收回了，只是极少量的流散在民间。

江阴博物馆收藏的这三张（壹角、贰角、伍角）“江南商业货币券”是当年新四军北撤时由江阴祝塘的大房村徐姓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将其藏在瓦漏里才得以保存下来。直至1987年其子徐东明翻建房子时才发现并将其捐赠给江阴党史办，党史办再将它移交给江阴博物馆。

“江南商业货币券”从诞生到结束，时间仅一年多，但它在整个江南革命斗争史中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它为我国革命钱币史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它的发现为研究我国的革命钱币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博物馆保管部原主任）

## 江阴博物馆通过市档案局年度评估

2012年9月20日江阴市档案局对江阴博物馆2011年度档案工作进行评估检查并顺利通过，尤其是照片档案的制作详细、规范，受到评委的表扬。2012年江阴博物馆积极做好各项档案工作，年初即派专人参加江阴市档案局档案管理培训工作，并通过考核取得合格上岗证。并邀请江阴市档案局指导科李美华科长来我馆对全馆人员进行档案知识培训。还为档案室配备了先进的设备设施及档案管理软件等工具。档案工作人员经过努力，将2006年之后的文书档案材料进行了整理及电子档录入，将2005年以来本馆照片档案进行了收集整理及电子档归档。完成了虚拟档案室的原文数据的导入，与输机数据进行了对接，共计文书档案1543条、实物档案56件，照片档案4卷，完成了各类台帐及全宗卷的编撰，使博物馆的档案工作走上正轨。

（符蕴）



江阴档案局指导科李美华科长来江阴博物馆做档案工作讲座



市档案局对江阴博物馆档案工作进行评估检查

# 董其昌昆山二图考略

撰文/刘徐昌



明董其昌倣黃公望山水 卷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是明代后期著名的书画家、书画理论家、“松江画派”的创始人,在文人画发展史上堪称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是一位集大成的书画家。清顺治元年(1644),南京南明福王政权以董其昌成就与元人赵孟頫相类,故授予他与赵孟頫相同的谥号:“文敏”,后人因此把他称作“董文敏”。

万历十七年(1589),董其昌考中了进士。是年,因文章、书法优秀,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深造,这一年,他35岁,从此开始了四十多年的仕宦生涯。历官翰林院编修,明光宗日讲官、太常寺少卿,掌国子监司业、南京礼部尚书。崇祯六年(1633),这一年,他已经79岁的高龄了,崇祯皇帝

还召拜他为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七年,进太子太保。他上书“乞骸骨”,疏章七上乃充,赐乘传还。先是,光宗登践大位,时董其昌不在朝为官,光宗看不见他,而想念他,问阁臣曰:“旧讲官董先生安在?”于是宣其进朝为官。其为官跨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其82岁逝世时,据康熙《松江府志》载:“讣闻辍朝,赐祭葬,赠太子太傅。”

文敏一生,仕途顺畅。其实他之为官,是半官半隐,所以尽管明朝中后期宦海风波迭起,而他却安然无恙,这与他之为官之心态不谓无关。历史地看,其书画艺术的成就远超其政声。康熙《松江府志》载:“(其昌)少好书画,临摹真迹而至忘寝食。中年悟入微际,遂自成名家,行楷之妙,跨绝一代。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已意,论者称

其气韵秀润，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也就是说，董其昌年轻时就非常喜欢学习书画艺术，中年以后，参悟书画之道，并得其精髓，于是就成为了名家。其书法行楷之精妙，已跨绝一代。他的画作，既兼采宋元以来诸大家之长，又独立创新而自成一家。人们称赞他的画作品精美，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故时人“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尤精于品题，好事家至今（康熙时）引重焉。”

董其昌的书画作品当时的人们就这样看重，至今其价以“连城”为称也不为过。不过这样精美的书画作品与江阴云亭昆山有关的就有二幅。一幅为《夏子昆山读书图》，另一幅为《昆山道中》。分别详述如下。

《夏子昆山读书图》是董文敏亲笔手写而赠送给夏树芳的。当时，夏树芳为“侍亲而不愿为官”隐居于昆山能仁寺。他与董文敏相友好，时有诗文唱和。因为友好，所以董文敏还在此画上题有小诗：“昆山把酒和陶诗，千载柴桑是尔师。敢道柴桑输一着，出山何似住山时。”诗中，董文敏将好友夏树芳比作了晋时住在柴桑的陶渊明，而且认为陶渊明在出山为官方面还不及夏树芳高明，因为陶还“出山”为官做过县令，后不愿“为斗米折腰”而退隐的，而夏就始终没有“出山”做过官。

据《长泾习礼夏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载，此题诗前还有一段小序：“江阴夏茂卿，今之曾、闵也，一意奉亲，不上公车。著书满家，丙辰秋七月，余访之昆山草堂，写此为赠，并系一绝。”此小序很重要，一是与诗集一样点明了地点：“昆山草堂”，而且还点名了时间，“丙辰秋七月”，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七月。据《昆山诗抄》记载，“玄宰董大宗伯绘昆山图。并缀绝句咏也，系万历时事。”所以，“丙辰”年确为万历四十四年无疑。三是点明了事情：“余访”，也就是董亲来拜访夏树芳。四是写明了董其昌对夏树芳的评价，他认为夏是“今之曾、闵也”。曾，即曾参，字子舆，也称曾子，他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中国名人

大辞典》称其“事亲至孝”。他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富有才学，相传《大学》即为他所著。后被尊为“宗圣”。闵，即闵子骞，又称闵损。也是孔子学生，也以孝著称，旧时，二人合称，尊为孝子的典范。萧广济《孝子传》：“闵损与曾参，门徒之中最有孝称。今言孝者，莫不本之曾、闵。”看来董其昌赠图的用意在于一是称赞他一意侍奉母亲至孝，二是隐居深山不愿为官之品格，三是夏之学识之富，因为有称夏“一志养母，屡征不应，著述其富，名播环区”的记载。

那么此图大体画了哪些内容呢？清朝时人张元升有一首《题昆山读书图为芜皋先生属赋》诗，其诗小引曰：“宗伯（即董其昌）一日过山斋，嘉其隐居乐道，泼墨赠此，题曰‘夏子昆山读书图’。至是芜皋翁索题。”芜皋，即夏世名(1593~1666)，字舆先，号芜皋，是夏树芳的第二个孙子。张元升是夏世名好友，一日张元升至夏家拜访夏世名，于是夏世名对他谈起他的祖父夏树芳与董其昌很为友好，说“华亭学士千里来，特写新图媚交好。”“言罢乎儿出此纸，再拜向我求题此。”说这《夏子昆山读书图》“一峰嶙峋青插天，一峰雨后何婵娟！空天云气几时歇？野鸟啼入青林烟。怪松老木阴风颠，飞泉直溅双眉边”（以上引用诗句出自张元升《题昆山读书图为芜皋先生属赋》）。

这是幅雨后昆山青翠图，昆山西东两峰并峙，一主峰嶙峋直插青天，几株古松老木，树荫森森，飞泉高挂，珠花飞溅。另一峰秋雨刚过青翠欲滴，富有生气，小鸟鸣啭，飞入林间，有声有色。书画大家传神之笔，将昆山的诗情画意尽收幅内，真是幅上品佳作啊！此图不是鸿篇巨制，而是“尺幅丹青”，晚明时诗人赋诗曰：“丹青尺幅耳，尺幅最通神。不雨能生润，悲秋亦有声”（《昆山八咏？咏写绘拈题》）。

此画一出，夏树芳就视为珍宝。夏树芳在一首《奉怀董宗伯》诗中说：“一幅丹青堪照乘，数行残墨重连城。”夏树芳认为这幅字画价值连城。于是夏家将此视作为传家宝物。可惜的是这幅宝图在夏家经历了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直至消失的

命运。

夏树芳之孙夏世名有一首诗《展董文敏公赠夏茂卿先生昆山读书图感赋》，其诗前有一句小引：“图已失，声儿力购得还”（此小引抄自《昆山诗集》手抄本）。从这句小引可以看出，此图曾经离开过夏家，而流于世间，并在此诗中写道：“尺幅久已落人间，辛苦亡儿力购还。”而且离开夏家的时间也较长，是夏世名之子夏声努力搜寻，最后化资购得，才使宝物“完璧归赵”。那么，这幅图是什么时候由何人之手离开夏家的呢？宝物（出卖另当别论）不是非常因素，一般是不可能丢失的。此物，夏树芳一定会传给他的独子夏宝忠。夏宝忠是“邑廪生”，也是个很有文化涵养之人，他也一定深知此物的文化含量及历史价值，而且，这是父亲留下的传家宝，一定会很好地收藏。

夏宝忠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卒于清顺治九年（1652）。他在46岁时经历了明清变革的大动乱事件——“乙酉之变”，江阴受害尤其酷烈，城中屠杀，波及乡下，民心浮动，盗贼蜂起。同时期的南旸岐徐家也遭受“奴变”之害。所以，此图应是甲申年间由夏宝忠手中丢失的。因为其子夏世名生于崇祯七年（1634），乙酉之变时，世名还只有11岁。世名是为夏宝忠次子，其长子名世寿，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甲申之变时，其长子世寿也只有14岁。所以，这种宝物，夏宝忠绝不会交给儿子收藏，因为，他们都还没成年。夏家的宝物一定是在夏宝忠手中丢失了。

夏世名，“邑廪生，赋性萧闻博学，善咏，通内典，著有《东村草》（《家谱》）”。传家宝丢失时，他虽还小，但他一定听他父亲讲过此事，并为之深感遗憾。不料此图，却被其子夏声购而复得。夏声，夏世名次子，庶出，字允和，“邑廪生，才高而夭。（《家谱》）”他生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卒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一生只活了27岁。他虽年轻而逝，且是世名小妾所生，却也很有才，对“传家宝”一事，一定也非常清楚，所以，他要努力搜寻而购回。假如他在二十三岁购得，那么，此图离开夏家已有38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一时间应证

了夏世名“久已落人间”的诗句。

夏声死时，他还没有儿子，死后二月才生了一个遗腹子，名为夏清江。所以夏声死时，他一定将此“传家宝”交回给他父亲夏世名，上面提到的诗是世名看到此图，想起了他儿子后有感而作。此诗云：草堂还挂旧青山，大隐家风尚可攀。墨气欲浮川岳洞，云林常带薜萝间。力从孝弟求尧舜，静时诗书晴孔颖。回首不堪游息地，白头吟望泪潸潸。他赏图思儿，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他想要不是亡儿之努力，祖父之传家宝怎么还能挂在自家的堂上呢？

那么，这幅图什么时候又从夏家丢失的呢？从现有的证据看，它在乾隆元年（1736）还被夏家家人收藏着。这论断有清人徐伯龙的诗为证。徐伯龙的诗题为《题夏氏昆山读书图》：再展香光画与诗，风流儒雅亦吾师。摩挲忽成惊诧，岁月今时却昔时。从诗文看，徐伯龙是夏家的好友或亲戚，否则他不会“再展”此图了。因为它是传家宝，非至亲好友，一般不会展示给人家了。此诗还有一段跋语：“丙辰秋九月九前一日，过夏氏昆山草堂，得观华亭董宗伯诗画小帧，其笔墨清超，非今人所能及。规仿其意作为此卷，并和原韵。昔宗伯，过此系丙辰秋日，故拙句云云，亦一奇也。”此跋语中说，过去，董宗伯作图于“丙辰秋日”，我今天再次观赏此图也在“丙辰秋”（九月初八日）。时间巧合，诗人很为惊奇，于是用董宗伯原韵题诗其上，而且说“今时却昔时”。

那么徐诗所写观画的“丙辰”是董宗伯作图后的第一个“丙辰”还是第二个“丙辰”呢？笔者认为，应为第二个“丙辰”，即乾隆元年。因为第一个“丙辰”是康熙十五年（1676），这一年，此图还没回到夏家，因为这年夏声还只有18岁。况且，从徐诗看他是第二次在夏家看到此图的，那么第一次看此图时，时间至少会提前一二年，那么，那时夏声还只有十五六岁，我想，这样一种举世公认的宝贵之物，要想购回应有一定的难度的。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要想购回这样有难度的宝物是不可能的。所以，徐诗所说的“丙辰”应为乾隆元年

(1736)无疑了。

那么,这图最终应在夏家哪支后代手中消失的呢?它应该在夏声的遗腹子一支后人手中消失。据《宗谱》记载,夏声的遗腹子夏清江(字练习如,号訢庵)生于雍正十年(1685),其祖父夏世名逝世时,夏清江已有22岁了。因为此图失而复得,全仗其父夏声,如果没有夏声的努力,此图早已不知流失于何人之手了,所以夏世名逝世时,应该将此传家宝交给其孙夏清江了。因为他此时已成人了。况且夏清江也是个“太学生”,而且很有其家风,“嗜学、工书、慷慨好义(《宗谱》)”。所以,夏清江接受这一传家宝是完全应该,而且也有文化涵养基础的。

另要说明的是夏世名这一支夏氏后人属长寿符祥支。据《宗谱》记载,夏宝忠四子,分为四支,长子世寿为长寿慕义庄支,次子世名为长寿符祥巷支,三子世安为南峭岐支,四子世振为长泾河南支。以往江阴学人因夏世名收葬逝世于由里山山居庵的李介立,所以认为他居住在峭岐之钓台村,其实不然,他是居住在长寿符祥巷的,而钓台村就没有哪一支夏氏子孙居住过。而且《宗谱》还明确记载着他逝世后葬于“昆山北麓云亭黄思巷东”。此坟现在还在,名为“夏家坟”,坟前有一河浜与应天河相通,名为夏家浜。

综上所述,董其昌的《夏子昆山读书图》应为1736年后,在长寿符祥巷夏清江这一支夏氏后人手中消失的。

另一幅图《昆山道中》,笔者曾于2008年在网上看到过,它现在收藏于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

纸本,水墨画。其画作内容其实不是以昆山为题材,而是《仿黄公望山水卷》,其题诗曰:“大痴画法超凡俗,咫尺关河千里遥。独有高人赵荣禄,赏伊幽意近清标。”落款为“董其昌画”。其画还有跋语云:“余得黄子久所赠陈彦廉画二十幅,未及展临,舟行清暇,稍仿其意,以俟批图相印,有合处否?丙辰九月,昆山道中识。董其昌。”从此跋语可知:此图与《夏子昆山读书图》作于同一时期,此图应作于前,它应是董其昌在乘船到昆山拜访夏树芳的路上所作。在此图前,董其昌先得到了黄公望为陈宝生(字彦廉)所作的二十幅画,但没有来得及仔细品鉴,在乘船到昆山的路上才有闲暇心情认真品鉴,并提笔临摹的。

近读1989年6月版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董其昌年谱》一书,其中将“昆山道中”错写成“昆山道中”,一字相差,地方大为不同了。而且其中关于此画的时间也错了,将“九月”写成了“九日”,所以就有“九月九日”之误了。而“九月九日”董已到昆山,那天,他为夏树芳画《夏子昆山读书图》了。笔者写本文前,为校核此事还特地写信给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其来信明确答复其“跋文为‘丙辰九月,昆山道中识’”,所以,《董其昌年谱》一书所载的有关《仿黄公望山水卷》一图的地点、时间确系错误无疑了。

总之,这两幅图证明了董其昌与昆山文化名人的交往,同时也是丰富了昆山历史文化的内涵。在重视历史文化的今天,考核证、研究它们,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二中退休教师)

# 光绪青花人物瓷碟赏析

撰文/邬红梅



光绪青花人物瓷碟是八十年代于江阴市辅延小学工地出土，一套四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通高3、口径14.8、底径12.2厘米。圆唇，口微侈，直壁，细圈足。胎色纯白，胎质致密。除足根一周未

施釉外，器物内外施满釉，底部釉面见数处细小的缩釉点，足根处有粘沙。釉色白中略泛青，有桔皮现象，釉层清亮滋润。瓷碟内用青花料描绘了一幅古代高士的“清谈行舟图”，外底部中心用青花料书写“内府”二字，青花发色淡雅，人物刻画生动。“清谈行舟图”描绘的是两位身着短衫的人物对坐闲谈于河边枯树旁的岩石上。两人物两首相对，双手抬起，似谈兴颇浓，滔滔不绝。旁边的河中间一渔夫在一叶轻舟上双手用力撑杆前行，小舟旁边泛起了阵阵涟漪，整个画面恬淡而舒适，别有韵味。画面的上部用青料楷体书写“对坐清谈世事，闲看浅水行舟”的点题诗句，将画面内容交待的十分清楚。诗与画相谐，诗情画意，相得益彰。画面色调清雅，青料浓淡相间，层次错落，人物刻画简练随性，小山、枯树、人物、水波均几笔写成，勾勒、皴染十分写意。

小盘的底部落款“内府”，“内府”一词最早是掌管皇室仓库官名，《周礼·天官》“内府”条称：“内府掌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内府”就是皇宫内负责监管制造器具的部门，也是皇室的仓库。另有《史记·淮阴侯传》“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语，说明内府还是储备粮食的地方。元明之时，内府则专指皇宫大内。署“内府”款的瓷器最早出现在宋代的磁州窑的器物上，在元代则多见于磁州窑系梅瓶上和小口大腹的瓷罐上。而在明代景德镇生产的梅瓶上也常常书写“内府”铭文，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在清末很多民窑出品的瓷器，在底

部落款上也常常使用“内府”铭文，但并不是每一件写有“内府”的器物均为皇室用品，这只是民间制瓷的一种流行元素。

青花瓷器白地蓝花，有明净、素雅之感，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上至尊贵皇族下至平民百姓均对青花瓷器情有独衷。元明以来，青花瓷器始终在彩瓷生产中占主流地位。而青花瓷器上的装饰纹样丰富多彩，花草树木、人物故事、山水风景等无不在青花瓷器中有所体现。人物纹饰中的高士图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类。所谓的高士图刻画的是隐居山林，不问世事，或博学多才，目光高远的清雅之士，他们虽居山野，深居简出，但骨子里又心怀天下。高士图多以文人雅士的爱好及生活情趣为题材，象明清瓷器中常见的“四爱图”刻画的就是王羲之爱鹅、林和靖爱梅、陶渊明爱菊和周敦颐爱莲，主要描绘的是四位高士的个人喜好。此外，象竹林七贤、携琴访友、张骞乘槎等也是明清瓷器中常用的装饰纹样。高士图作为纹饰题材在瓷器上使用，使瓷器具有了文人气息和清雅之态。高士图在瓷器上的出现最早在五代和北宋时期，但均较为少见，元代始渐为多见，到了明清时期已成为瓷器装饰纹样中的重要类别。

瓷器上的装饰纹样，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高士图在明清不同的时期显现出不同的时代风格。

明早期政治相对稳定，社会经济也较为繁荣，制瓷业得到较大的发展。瓷器上高士纹样的刻画运用实笔绘画线条，勾勒渲染并用，人物衣袂飘扬，精神饱满，气度非凡。由于采用了国外进口的苏麻离青料，颜色浓艳，有些有晕散现象，使得人物的面目较模糊，但不掩其大气之势。人物多配以山水美景，辅助纹饰多配以海水江崖纹、蕉叶纹、卷草纹。民窑作品人物刻画相对简单，多采用一笔点画的画法，线条简单写意，五官不清，或不画五官，只画轮廓，辅助纹饰多为简单的云气、花草。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社会动荡，瓷业不振，史称空白期，是处于上承宣德、下启成化的过渡期。瓷器胎质及釉色略显粗糙，高士形象以

简笔画法，画面疏朗，线条流畅，人物形象写意概括，但飘逸而具神韵，大件器物多配以大片的云气纹。

明中期政治稳定，经济开始繁荣，瓷业生产有所发展，成化时期瓷器造型小巧精致、胎质细腻、釉色白净润泽，青花瓷使用国产的平等青料，为色泽淡雅的淡描青花，绘画风格清秀、舒朗，造型精巧细致，绘画笔法采用勾勒渲染，线条纤细柔和。高士图较前期增多，人物高雅飘逸，往往置身于有庭台楼阁或栏杆花草的庭园之中，还多见对弈的高士，颇具闲情逸致，显平静淡泊之气。民窑作品人物形象较为简略，单线勾画，青料浅浅渲染，淡雅脱俗，多配以简单的庭园、小棵的松树、简略的云气等景物。

明后期，政治、经济逐渐走向衰落，瓷业生产也开始走下坡路，瓷器多较粗糙，质量明显下降。绘画采用单线平涂。嘉万时期，使用“回青料”，青花色调浓艳发紫。此时的高士图较为多见，但人物显得较为呆板，没有了飘逸灵动的韵味，布局稍显繁琐杂乱，与道教和长寿相关的一些景物和场景，如炼丹、仙鹤、鹿等作为辅助纹饰在高士图中较常出现，还多见头戴高冠、身一鹿或头顶一太阳的“高冠后鹿”和“指日高升”的高士题材。而明末，出现了淡描青花、铁线描的绘画技法，开始用云南的珠明料，发色明艳，深浅分明。人物纹饰则变得布局疏朗，轻柔而缓，画风飘逸自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民窑瓷器中还常见独坐江边的高士及一执杖老人独站在江边的场景，略显凄凉。

在清代，康熙青花瓷“独步一朝”，青料采用色彩鲜艳的珠明料，成熟地运用多种浓淡不同的青料，有意识地造成多种不同深浅层次的色调，有“墨分五色”的说法，被称为“五彩青花”。这种层次分明的青花着色方法，有利于表现瓷器画面中山头远近和衣褶内外的情致意境。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瓷器达到了中国瓷器生产的黄金时代，表现在人物纹饰上，极为精致细腻，生动传神，无论是人物的表情还是衣饰均细致入微，特别注意

周围环境的描绘,远山近水、花草树木、亭台楼阁均细细勾画、浓淡相宜,有时甚至将小小的人物置身于浓墨重彩表现的山水图之中,此时的高士图就象一幅精心描绘的工笔山水画。

乾隆以后瓷器的发展开始从高峰走向衰退。光绪一朝在晚清相对比较强盛,有“光绪中兴”之说。光绪瓷虽比不上清三代,但在清晚期还是达到了瓷器发展的一个“小高峰”,光绪年间仿制康熙瓷器的现象多有出现,好者几可乱真。象这件瓷碟胎釉均较白,纹饰较为清雅写意,不落俗套,有康熙之风。但与康熙器相比,其胎体较康熙时轻,白釉较薄,釉面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青花的用料节俭,显得单薄无层次感,远远达不到五

彩青花的艺术效果,画意及款式的用笔亦不及康熙时的硬朗,画面的刻划也简略草率,缺少了康熙瓷的神韵。清朝末年,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封建王朝奄奄一息,这件瓷碟上的高士图给人一种萧条和冷清的感觉。瓷碟上光凸凸的小山、枯瘦的树木,冷清的河水,均给人一种苍凉无力之感,岸边的人物虽然侃侃而谈,船夫也似奋力撑船,但他们远离尘世,闲坐清谈的举动其实是对社会的一种逃避和无奈之举。观整个画面,体现更多的是幽静、柔弱和远离尘嚣的气息,缺少了清前期强盛时的那种欢快、吉祥、和谐的意境。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市博物馆科研部主任 副研究馆员)

## 江阴博物馆与杭州官窑博物馆、上海闵行博物馆进行馆际交流

2012年11月29—30日,江阴博物馆馆长董录科带领办公室、陈列宣教部等部门工作人员一行5人参观考察了杭州官窑博物馆、上海闵行博物馆,并与他们就如何做好陈列展览等方面进行了友好交流。交流会上博物馆同仁畅所欲言,分别针对临时展览引进、业务知识培训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还针对一些具体工作交换了建议和意见。

通过参观两馆展览,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同行们的陈列方式,收获颇丰。杭州官窑博物馆举办的“宋金瓷话——五馆馆藏瓷器精品展”设计新颖,陈列展示有创意、展品精美,使人充分感受到了中国古代陶瓷的独特魅力。上海闵行博物馆结合自身特点,专门针对郑观文创办大同乐会时期的一批音乐家资料及他们使用的乐器这一专题做大做强,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此次馆际交流活动不仅加深了馆与馆之间的了解,联络了文博同行间感情,交流了工作经验,而且为下一步更好地开展合作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祝君凯)



与闵行博物馆进行座谈



参观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

# 紫泥清韵润文化

撰文/高振威

素面素心，不与青花、粉彩斗艳，紫砂的古朴可爱神的文人笃好。这种欣赏和实用于一身的雅玩，成为近两年拍场上的“黑马”，可谓器小乾坤大。

当今拍场上最贵的10把紫砂壶，有8件出自近代“壶艺泰斗”顾景舟之手，而顾氏最推崇的前辈大师，乃清道光至咸丰年间的邵大亨。

这位年少成名、孤僻狷介的传奇圣手留下的壶不多，今夏上海宝龙推出一件邵大亨制缀只壶，估价500万元，最终以1.725万元问鼎，创下古代紫砂壶拍卖价格之新高。此件盖印为“大亨”的缀只壶，造型饱满，光泽沉绵，线条至简却气度非凡，不愧文人之心铸紫砂之魂。

邵大亨壶的价格现在只有顾景舟壶的三分之一，但从数量来讲，邵大亨的存世壶是顾景舟的几十之一，如此稀罕，对其出处来源的要求颇高，有时壶好但没清晰的流传，藏家也不敢出手。此现象今年有所转变，藏家把焦点更多地放在壶本身。

邵大亨是江苏宜兴蜀山上袁人，制壶以朴庄重见长，其作品在清代时已被嗜茶者及收藏家视为珍宝，有“一壶千金，几不可得”之说。200年后，他的上袁小老乡顾景舟在《宜兴紫砂壶艺概要》中写道：“经我数十年的揣摩，觉得他（邵大亨）的各式传器，堪称集砂艺大成，刷一代纤巧靡繁之风。”

此次的“天价”生动地反映了藏家们越来越青睐，学术价值深邃的尚品。真正的好壶是

“素壶”，其线条多一分则多，少一分则少，已臻完美，多刻一笔就是对它的损伤。

大雅之遗，千载一时。

紫砂不是紫色，为什么叫紫砂？

其实在古代汉语中褐色就是紫色。例如将褐色兔毛做成的毛笔称为紫毫，将有褐色斑纹的竹子称为紫竹，以及将褐色的檀木称为紫檀等等。紫色还有帝王专用的含义，如将帝都的道路称为紫陌，北京的故宫称为紫禁城等，可见古人将紫砂视为一种高贵祥瑞的器物。

而紫砂壶的起源，一般只上溯到明代正德年间，那时宜兴湖边金沙寺的和尚已能熟练地用紫砂泥制作缸一类用具，当年学使吴颐山读书寺中，他的侍童供春空闲时也跟着和尚淘土、拉坯，学做砂器，业界因此奉不知名的金沙寺僧和供春为紫砂鼻祖。

据《宜兴县志》载，供春所制紫砂茶具，新颖精巧、温雅天然，质薄而坚，负有盛名。所制“树瘿砂壶”为世所宝，又称“供春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壶把内及壶身有篆书“供春”二字，这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紫砂器题铭。后来，这种将制作者的名号印于其内的风气就流传下来，与瓷器底部写帝王年号的纪年款式迥然不同。

明万历年间，又出了一位壶家妙手——时大彬，他所制的茗壶，得幽野之趣，世称“大彬壶”，为后世楷模。其作品虽多，但流传存世者极少，至清乾隆年间，“大彬壶”已被视为

稀世珍宝。

时大彬是宋尚书时彦的嫡孙，晚明紫砂“四大家”之一时朋之子，明人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称其作品“不务研媚而朴雅坚致，妙不可思”。时大彬是紫砂陶艺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对泥料配制、成型技法、造型设计与铭刻都极有研究，确立了至今仍为紫砂业沿袭的用泥片和镶嵌凭空成型的技术体系。

大彬将壶式由大改小，是为了适应晚明士大夫嗜饮清茶的风尚和淡雅超俗的趣味。当时文人雅士以书斋内陈置“大彬壶”为荣，京城里也有“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之美言。此后，雅致的小壶逐渐取代了粗朴的大壶，在实用性之外更加入了文人审美、名工与名士的互动也更为明显。（图一）

及至清康熙、雍正年间，陈鸣远的作品常被选作宫廷贡品，出生于紫砂世家的他上承明代精华，下启清代格局，还突破以往常见的单纯几何形体，把视野转向大自然，制出几可乱真的“像生器”，被誉为“清代第一家”。（图二）



图一 时大彬圈钮壶



图二 陈鸣远 南瓜式壶

清嘉庆道光年间，文人情趣与紫砂壶艺的融合更臻顶峰。“西泠八家”之一的陈曼生（名鸿寿）善书画精篆刻，曾任溧阳知县，以文人身段婀娜于紫砂壶之上，他是第一人，相传他设计了多款壶样并题铭，交由杨彭年等制作，世称“曼生壶”。

说到近代，已故的光素器巨匠顾景舟应是紫砂陶艺家中最大成就的一位，他以师法古人而超越古人的精神动力，毕生钻研，终以作品秀丽多姿而傲视群雄，形成独树一帜的顾氏风格。（图三）

顾景舟不但精于常规砂壶，还偶试袖珍之品，一件仅高4.5厘米的小石瓢壶，嘉德在今春以282万元成交。此壶为传统造型石瓢，但小中见功是其精妙，壶为上等紫泥加黄砂制成，好一个“紫玉金砂”。

“石瓢”最早称为“石铫”。“铫”在《辞海》中释“铫子，一种有柄有流的小烹器”。“铫”从金属器皿变为陶器，最早见于北宋大学士苏轼《试院煎茶》诗：“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苏东坡当时贬官到宜兴蜀山教书，“买田筑室于蜀山南麓”，他发现当地的紫色砂罐煮茶味道好，于是就地取材，模仿金属铫子设计了一把既有流又有梁的砂铫来煮茶，即后人所称的东坡提梁壶。那么紫砂“石铫”何时称“石瓢”了呢？正是顾景舟引用古文“弱水三千，仅取一瓢”，将之改称，从此相沿，均称石瓢。

推广紫砂艺术的功臣罗桂祥。

1979年10月，尚未嗅到改革开放气息的宜兴丁蜀镇，来了位香港老板，他就是“维他奶之父”香港著名实业家罗桂祥博士。

对紫砂收藏独有情钟的罗桂祥在当地仔细考察一番后，直接找到宜兴紫砂工艺厂，说要订购一批紫砂壶参加香港的亚洲艺术节，价格一报出来，让厂里所有人吓了一跳：“原来我们做的壶这么值钱？”类似顾景舟这样前辈的作品，是1000元一把，而类似顾氏门生李昌鸿这

样的作品，也是老师价格的一半，就连一些学徒工的作品，也相当于他们当时一个月的工资。

罗桂祥对宜兴紫砂艺术的贡献很大，不仅显著提高了价格，更要求定制的产品必须遵循古制，在壶里面打上作者的印款，此前30年这里的产品是从不署名的。

1984年，香港茶具文物馆建成，主要藏品均来自；罗桂祥的慷慨捐赠。馆内二楼的“宜兴紫砂器”展览，囊括了明清各家以及现代高手的代表作，首次对方开发就吸引了大批观众。同时，罗桂祥编著了第一部关于宜兴紫砂的英文著作《宜兴紫砂器》。由于他的积极推动和宣传，引发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一波波宜兴紫砂收藏热潮。

后起之秀，紫气东来。

紫砂器从未像今天这般以独立的姿态在拍场上绽放，四五年前，紫砂还是瓷器杂项拍卖图录中最后垫底的零散小物件。近三年来，由于藏家积极寻找新的价值洼地，紫砂拍卖渐成气候，价格扶摇直上，无论是明清还是现代名家制作的紫砂器，均收到追捧。



图三 顾景舟 提璧组壶

2010年春拍，一把创作于1948年的顾景舟制吴湖帆书画“相明石瓢壶”引起藏家的激烈竞价，终以1,232万元让紫砂壶的拍卖成交价突破千万元大关。紧随其后的秋拍，明代时大彬的圈钮壶以1,344万元再次刷新新纪录。

迅速兴起的紫砂拍卖，经过几年的市场铺垫，发展成为新兴的艺术品门类。紫砂壶不断升温的价格，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关注。只可惜现在的不少收藏家，每拍得紫砂佳器或当成祖宗牌位供起，或当成装饰品陈列。器皿因为有用而活着，“用”是器皿的灵魂，譬如购藏紫砂壶后而不用之饮茶那舍本逐末弄巧成拙了。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博物馆考古部主任)



## 江阴博物馆参加 第二届石峁玉器研讨会

2012年7月18日，神木召开第二届石峁玉器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名专家学者就石峁文化，以及石峁玉器、石峁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会议由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云辉主持。翁雪花受邀出席开幕式并参加学术报告会。

(雪花)

# 捏泥问火试新腔

## ——陶瓷印散谈

撰文/蒋瑾琦

陶印的历史可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当时用于制作陶器,打实胎体,或在其上模印纹样的工具——陶拍,即具陶印的性质。

春秋时期,类似陶印的铜印印模、砖、瓦上的文字,图画印模等遗物大量被发现。

秦汉时,陶印与当时极为发达的铜制私印,汉陶印文仍以戳陶为主,文字多为篆隶之间,中段多隶意,汉末也见楷书。

隋唐以后,由于铜、铁、玉、石等金属与硬质材料的耐用,陶印使用渐少,而青瓷日用品因莹洁与玉质感强,加上有众多釉色的装饰,逐渐受到文人雅士的衷爱,瓷印也被文人雅士及书画家追捧。

青瓷以釉色装饰见长,尤以粉青、梅子青、豆青、天青、孔雀蓝、天蓝、鸡血红等釉色著名。“夺

得千峰翠色来”是古代文人对青瓷的赞美,当烧窑的工匠们看到色泽鲜亮,晶莹葱翠感极强的釉色出窑时的喜形于色,人们才真切地看到,触摸到了青玉般的莹润葱翠。

青瓷胎体多为灰白色,少数灰黑色,质地坚实,焙烧温度需1300℃左右,焙烧前可以刻花,装饰,经过500℃~600℃的素烧后,再上釉二次烧成,青瓷印同样需经过这样的过程,不同的是烧制青瓷印需根据各人的爱好,选土、制坯、制钮、刻制等,最后达到完美的境地。

当今陶瓷印在材料的运用上有其独特的一面,善于挖掘陶瓷材料内在的本质美,创造性地运用材料和充分展示材质内涵美来表达创作意念与情感,使材质在火的魅力作用下产生情感升华。





当代篆刻艺术家们在继承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融汇了当代社会的审美情趣,在材质选用,工艺技法,形式语言和个性表现等方面均取得了新的突破,创作出了一批意蕴美与形式美高度统一的篆刻艺术精品,前不久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首届陶瓷印展览即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以陶瓷为载体运用到篆刻艺术中去,且具较大规模的大型主题展,这是破天荒的,也是篆刻艺术发展到今天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的最好体现。

玩陶瓷印二十多年,还真没象今天对陶瓷印那样钟情与痴迷,我曾在宜兴生活了二十多年,最近又到龙泉去了几个月,为的只是能烧制出几方制作精美、釉色晶莹,光泽鲜活的陶瓷印章,当一方好的印坯、素烧、打磨、上釉、入窑后,那份希望与期待便随着窑温的不断升高而愈发显得强烈,看到自己亲手捏制的陶瓷印出窑的瞬间,陶土与心灵的倾注被赋予了生命,让人感悟到远古烧陶人那种平和、自然、玄远与天地自然融会一体的美丽画面。融进了这火与土的灵魂,也有了充满对火与土的畅想。

生活是艺术家创作的源泉,中国陶瓷可比美异域它艺,因为有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熏陶,更有五千年来火与土的层层累聚,生活的积淀与知识的积累是艺术创作的两翼,每当我们静静思索时,感觉到在跳跃,在奔突,陶土、瓷土与火交织成的色流,时而委婉凝练,时而奔放豪迈、涤荡历史长河,洗沥世间人心,仿佛从宋、元凌空奔来,从明时月下流过,跨越出脊,环绕群山,在晨曦中更加绚丽多彩,喷薄出新的生命乐章。

窑火与土色聚会,是心灵的感悟,它被人捏塑造型,幻成画图,启发人性,经过火才会有圣洁的沉淀,是无限的永久向往,火与土的交结,有时狂欢,有时凝练,有时释放,有时徜徉,在它的倩影里光照人寰,让人的思维驰骋宇宙,潜入心灵,直到有一天我会把生命溶入这火与土的色流中去。

(作者: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江阴文博**

# 体验古陶瓷修复

撰文/杨华丽

2012年9月，江阴博物馆对周庄陶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试掘，陶城遗址出土的文物在我馆馆藏藏品中十分有特点。一是陶城遗址就年代跨度上讲，上至商周，下至春秋，时代跨度较长；二是出土文物的种类较多，有玉器、陶器、原始瓷等。这次的陶城遗址钻探和试掘，是第一次对其进行科学考古，也是解决陶城遗址性质的第一次尝试，其意义不言而喻。而田野考古只是科学的第一步，室内整理才是揭开遗址性质的关键，陶器的修复就尤为重要。笔者有幸参与了陶城遗址出土文物的修复工作，于是有了实践与学习的机会，现把我在陶器修复中的一点体会作一梳理总结。

## 一、古陶器的清洗

清洗处理是修复前的第一步，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解除古陶器的表面污垢，便于了解文物的纹饰细节，茬口的比对；二是一旦修复以后再去清洗会很麻烦。

这里谈到的“清洗”，是指技术处理层面的系列工序，而非单纯的水洗或者干洗。古陶瓷传统的清洗技术，曾经是单一的水清洗，进而发展到增加酸性除垢剂来分解阴离子。譬如：用稀盐酸清除石灰质水垢；用硝酸清除石膏质水垢；用氢氟酸分解硅酸盐类顽固的水垢。清洗的目的是彻底清除有害化学元素在陶体结构里的“占位”，解除“占位”防止“析出”，维护文物的物质稳定平衡。简单地说，解除有害化学物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水洗法，二是干洗法。古陶器的水洗法，并非是用一般的自来水去洗涤，而是用去离子的蒸馏

水，或者采用某些化学液体。清洗目的是将古陶表面残留的水垢、泥土、有害物质清洗掉。古文物的干洗法，有些部位异物沉积而产生黑斑线，需特别清洗，根据不同导物用微湿的抹布蘸下盐、小苏打、双氧水等，再通过擦抹等表面处理办法，除去有害物质。

陶城遗址出土的陶片同样也要清洗。遗址试掘共布探沟两条，共分四个地层，出土陶片主要在③层和④层，陶片量较大，但能够修复的不多，仅为20件左右，它的修复对器形的判断，形制的演变，年代的定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无疑十分珍贵。由于陶质的原因，清洗工作也十分复杂，需要十分小心，尤其是泥质灰陶和泥质红陶，烧制温度较低，在清洗过程中容易爆茬，掉渣，对以后的拼接带来难度，无法掌握角度、弧度，以至无法准确复原，甚至无法修复。

因此，清洗工作是后期修复的基础。在对茬拼接前，我们主张做好事先方案，这并非故弄玄虚，而是为了挽救脆弱的文物，并从文物保护理念的角度出发考虑修复。倘若在修复过程中真的出现意外闪失就会导致被修复文物的雪上加霜，这样就与文物修复保护工作的宗旨相左。为了避免意外，我们对待每件文物都像医生术前一样设计方案，并准备好所需的材料和工具，把可能的意外失误消灭在事前的萌芽之中。

## 二、对茬与拼接

在初学陶器修复时，经常会出现“走形”等情况。往往一件陶器在即将完工之时，会发现原本

茬口应当吻合的接口,现在却“涨”或者“扭”出来了,无法保证形体完整,多次修复“错位”,使修复工作失败。古陶器的对茬与拼接是正式粘接之前必须考虑和注意的几个问题。

(1)古陶器修复前需要根据以往的资料和野外考古发掘的现场信息,进行初步判断大至年代,对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物的器形、纹饰、陶质,做到心中有数,才能避免错误出现,要设计预案和解决对策,把破碎的古陶器残片能够顺利地粘接一起,使其复原,那就是我们的基本目的。

(2)粘接错位的预防办法。其做法如下:①对茬残片的画线与编号。较为常用的办法是:在残陶背面用可擦掉痕迹的记号笔,将两片将要对接的茬口画上记号。譬如,与裂纹垂直方向的两片之间并排画上两道斜线,或画上三道斜线,加以区别相互之间的不同残片。当正式对茬粘接时,只有画线对上了,那就意味着残片的对号组合是正确的了。倘若残片细碎,再用简单的画线法就容易造成混乱,特别是脆弱得非常厉害的细小残陶片,根本就无法再用画线法表明对茬接口时,我们采用分区编号的办法解决。粘接工序完成后,一定要把这些笔迹和纸条清除干净。②粘接错位的预防。首先是心中有数,在一个单位的陶片中,就陶质、陶色、纹饰时行初步筛选,然后,将口沿、腰腹、底足三块归类。先要把拟拼接或画线标号的残片分类摆放,按照完整器形的形状分布开放。这样做的目的是综合审视,找出难点。譬如,形态复杂的圆弧或边角的拼接,就比平面拼接难度大些。本着先难后易的原则,先从死角处下手,由小到大,逐渐合拢。其次就是按序组合拼

接后的正式粘接。当胸有成竹之后,就可以动手正式拼接了。

(3)粘接的技术操作程序。这里按正常和非正常两种情况下设计方案。①正常情况下的粘接程序。首先,要把对茬完全吻合的残陶碎片进行粘接。先粘接大面,然后再把碰撞而掉的碎渣也粘接上。当胶接完成后,对准茬口施加压力,防止古陶遇湿而涨。如果每道接缝都涨出一点点的话,那么,最后就会发现涨出许多,结果导致收口对茬无法合拢。②粘接胶水的选择。使用不同的粘接胶水是决定被粘接对象及其材料性质的关键,因为,不同的胶水其性能不一,表现结果自然不同。修复古陶器文物常用的粘接胶水有:环氧树脂类胶粘剂、纤维素胶粘剂、丙稀酸酯聚合剂等等。陶城遗址修复主要采用502粘合剂,固化快,牢度强,但502粘合剂的特性也决定了它的不可逆性,一旦毁之重来,其破坏性不可轻视。我们在陶城陶器修复中,就使用了三种不同胶水。

### 三、修复后的整理

古陶器文物的修复是项技术手法综合的经验积累,也是拟修复文物能否再现昔日辉煌的关键。一般说来,文物的修复不支持其重复性,因此,设计好修复方案就尤为重要。具体修复技法较多,并有大量可以借鉴的经验参考,所以说具体的修复工作中耐心细致是必不可少的。陶城遗址陶器修复我们采用常规的修复方法。

在完成对口拼接,塑形后,在缺口部分使用工业橡皮泥进行塑形,复制出缺口模型,将石膏粉补全,使石膏固定发硬后去模,做细部修饰,最后用细质水磨砂打平,整个修复过程到此结束。

虽是第一次尝试古陶器修复,但古陶瓷修复工作不仅可以学到一门技能,更能体会文物工作的科学严谨,这对古代文化研究,对遗址年代定性,对地方文化遗存的演变,甚至对区域历史遗存脉路、社会形态的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学好古陶器修复能再现历史,展现古陶瓷的艺术魅力,使之发挥更多的社会效益,必将有着积极意义。

(作者:江阴博物馆陈列宣教部)



# 浅析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开发

## ——以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旧址为例

撰文/孙巍涯

从2012年年初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突遭强拆事件，到近期广受争议的鲁迅故居的去留问题，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正与当前社会快速的经济发展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矛盾。化解开发与修缮的“两头难”，已是文物保护绕不过的坎，成为城市发展中考验政府智慧的新命题。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当新事物不停地被生产被利用的同时，旧事物该何去何从，相关部门和单位应该做出更合理的评估和规划，使经济、文化和环境能够做到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而在过程中，名人故居由于其特殊的不可再生性一直处在城市保护规划的边缘地带，除了少数知名度较高的名人故居外，绝大多数的名人故居都由于修复不当或保护不利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因此，如何对名人故居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开发得到了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而本文也将以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旧址为例，浅析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了解保护名人故居的意义何在。

在某种私利驱使下，在很多人眼中，所谓名人故居就是某个名人曾经住过的房子，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此即便新闻大量报道故居被强拆，这人也不会有什么感触。而事实上，名人故居作为珍贵的人文资源，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载体和灵魂所在。它所包涵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名人本身，更是通过居住者的生活轨迹找寻到城市的不断成长

和变迁，给后来人以启发，让人们看到“活着”的历史。游览名人故居早就成为了一种历史传统，远溯宋明清时代，杜甫草堂前往来往往的文人墨客就数不胜数，如今也是当地一个显赫的人文景观。所以我们在倡导保护名人故居的同时更是在倡导保护我们的城市本身，使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融为一体。

其次必须正视目前名人故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主要可以分为这样两种情况：一部分得不到保护，得到重视和保护中的绝大部分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我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名人更是不计其数，但名人故居却在现今处于一个越来越尴尬的位置，在被保护和被拆迁的夹缝中风雨飘摇。很多名人故居被移作他用，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而有一些名人故居则只是在门口加一块说明牌，没有进行修缮、加固，日渐损坏。在这些名人故居之中即便是得到了资金投入，进行了开发经营的也都是门可罗雀，参观人数稀少，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之所以造成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 1、宣传力度不够。

日常生活中，往往老百姓看了标志牌知道这里是名人故居，但不了解这个名人为什么出名，做过什么，有过什么贡献。这样一来大家就没有兴趣去了解名人故居，名人故居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存在的意义就不是很大。这种情况下，

名人故居失去了群众基础，那么保护起来就难度更大了，另外，老百姓对自己家乡的历史文化不了解，也会缺少归属感。

### 2、故居的布展理念陈旧，观赏性不强。

人们在保护名人故居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个误区，就是重物不重人。很多都将名人故居当做古建筑来保护，花大力气翻新、修缮或者重建，而独独忽略了布展这一块，简单的将与名人相关的物品陈列在展柜中，加些文字。但名人故居与古建筑是不同的，古建筑的意义在于建筑本身，而名人故居在于谁曾经在这里居住生活过。故居内的布展如不能生动的展示出名人当时的生活情况、还原历史，只是让游客走马观花的看一下，那么名人故居的教育意义、历史意义都将大打折扣。这是与我们保护名人故居的初衷相悖的。

### 3、资金缺乏。

无论是故居的修缮还是维护，这都需要当地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支持，需要资金的投入。如今很多地方的名人故居由于资金短缺造成配套设施不齐全，缺乏用于文物保护的抽干、制冷设备，致使故居内陈列着的大量名人生平的生活用具或珍贵的文献资料发霉、腐烂，根本没办法对游客进行开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故居的观赏性和旅游收入，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面对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下我将以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旧址为例进行浅析，希望找到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

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旧址位于江阴市人民中路北侧高巷口2号，有近百年的历史，并在2000年9月被公布为江苏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整个建筑群是由江阴著名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吴汀鹭先生于民国六年（1917年）建造，之后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又几经辗转。1937年，“旧址”作为日军驻澄司令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占领，并在1947年底设立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解放战争后期，我地下党曾在此与敌

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之时，成功地策动了江阴要塞国民党官兵起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1949年4月21日，江阴县城解放，“旧址”成为驻城解放军驻地。1949年4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机关在这里召开了成立大会，其后相继驻过海军、陆军部队。后由于部队内部变更，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63680部队使用，这里曾作过办公用房、部队医院、家属工厂等。“旧址”经历如此变革，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具有相当高的文物保护价值和使用价值，因此当它重新修复并开放之后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当地极具特点的景观之一。

对于“旧址”能够较好的保存下来并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 1、政府的积极支持。

自1997年起，江阴市人民政府为了将“旧址”保护起来，几经波折，最终向驻地部队提出以地换地的方式进行产权置换，并于2002年9月达成协议。后“旧址”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交给江阴市文化局管理，政府拨出专项经费，对“旧址”进行了全面的修复。正是我市政府积极的态度和努力的争取，才使得“旧址”能顺利保存下来，而没有如梁林故居那样惨遭拆迁。

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二章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因此想要保护好名人故居，政府首要做到的是即时公布已经被发现的名人故居，挂保护标志牌，并向省级文物部门积极申报，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来时有法可依，有据可循。适当的时候可以成立历史文化名人管理处，协调并指导名人故居的保护利用工作。

#### 2、修旧如旧，因地制宜

近年来，不少名人故居在修缮时进行了不必要的“大修”，虽然看起来焕然一新，却使建筑原本的真实性荡然无存。许多人千辛万苦从推土机保护下的文物，最后不是给“拆没了”，而是给“修没了”，实在令人痛惜扼腕。

文物修缮是一项非常严谨的工作，必须遵循“维修工程应保持其历史风貌，应严格遵循文物修缮‘最少干预’和‘不改变文物原状’等原则”。近年来，不少地方大幅增加文物修缮资金，文物保护工程遍地开花，这本应是千载难逢的佳举，但若是在不当的理念和机制下，文物保护“不改变原状”、“最小干预”的原则将会沦为一纸空文，好心却办了坏事。2000年国家文物局通过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早已规定：“凡是没有重大危险的部分，除日常保养以外不应进行更多的干预”，如果我们在修复名人故居的时候动不动就伤筋动骨，把好端端的老房子老装修拆了重建，就会对文物的历史信息造成损害，更重要的是这些损害都具有不可再生性。

而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旧址在保护之初也遇到了不少修缮方面的问题，首先由于该建筑长年缺少必要的维修和保护，加上自然侵蚀及其他因素，损坏是较为严重的。部分房屋、阳台、楼板都出现了坍塌现象，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木雕装饰、砖雕等也受到了严重的腐损。总体来说，整个建筑群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損。

针对这些问题，江阴市文化局与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了大量的实地现状调查和踏勘，并广泛收集相关资料，经过反复的分析研究和论证，最终制定出一套专业、科学的修复方案。

修缮的过程中施工单位严格遵守有关古建筑修缮的法律法规，认真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古建筑木结构维修与加固技术规范”以及文物建筑维修保护的相关规定，坚持“修旧如旧”、“不改变文物的原貌”的原则。修复时均选用了质地和色泽与原材料相近的材料，施工时采取精工细雕的传统工艺，层

层把关逐项验收，一旦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最终使整座建筑在外觀上焕然一新，并保持与原建筑风格协调。

如此严谨的对名人故居进行修缮才能达到既安全使用，又能开放观赏的目的。

### 3、利用是最好的保护

对于名人故居来说，仅仅将其圈地保护起来还不够，必须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将名人故居之中蕴藏的丰富历史内容宣传出去，并源源不断地为它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真正达到良好保护的效果。

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是原真性，即是要保护原生态的实物和周围环境，尽量让游客完整地观赏到名人当时的生活环境和状态。

其次是特色性，即开掘其名人的杰出成就和文化魅力。

最后是观赏性，即尽量使故居的房屋建筑、周边环境、展品有特点、有故事，能够引人入胜，睹物思人。目前大多数的名人故居由于处于同一地区，属于同一时代，因此无论是从建筑风格上还是内容、陈列上都大同小异，游客看了一两处后就会感觉乏味。因此我们在开发名人故居的时候必须在特色上下工夫。一是陈列内容和展示方式上要有特点，做到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时代感强。二是充分发挥学术研究的带动作用，增强自身的发展后劲。

在开发利用这一点上，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旧址因地制宜，在一系列的规划和前期准备工作之后于2008年建立江阴市名人馆，利用“旧址”建筑分别设立先贤、文化、军政、科技、佛学、实业、教育相关七个展厅，从民间搜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实物，向公众完整的展示了江阴的历史文化名人。

自古以来，江阴名人辈出，如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中国图书馆之父缪荃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现代著名文学家刘半

农，民族音乐家刘天华，中医学家承淡安，“中国机器人之父”、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经济学家吴树青等。晚清以来，在海内外担任高等学校校长的江阴人就有180余名。名人馆对其中的10名最重要人物又特别采用雕塑、实物、场景、多媒体和文字介绍等手段综合展示，增加了观赏的趣味性，让游客能直观的了解到名人的生平事迹和成就。而部分名人的事迹等则采用专题板面展示，还有部分人物则被采用组合版面、列表式文字介绍，虽然简单，可是一目了然。

如今，“旧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投射出其独特的魅力和优势，成为爱国思想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地。每一个展厅虽然面积不大，但浓缩了历史的风云，使每一个参观的游客身临其境，受益匪浅。

名人故居的保护与利用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们应当善于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理解和建设城市。现在，许多江阴市民开始怀着对城市文化的关注之情走进“旧址”，走近名人馆，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而若想要更多人有兴趣走进名人故居，需要创造并形成一种联合发展关系，改变当地所有名人故居“小而散”的状态，确立文化上的整体感，赋予精神上的丰富感，充分彰显其人文景观，完善其文化功能。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形成线状或者带状的旅游发展模式就更好不过，这样既适应了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起到宣传本地人文精神的作用，还能增加名人故居的知名度和收入，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市国民党要塞司令部旧址文保所)

## 刘氏兄弟故居被授予 无锡市第二批社科普及示范基地

2012年11月29日上午，刘氏兄弟故居参加了由无锡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共同主办的第十届学习创新节暨第九届社科普及周开幕式，并作为无锡市第二批社科普及示范基地上台授牌。

刘氏兄弟故居2002年10月22日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自2007年重新开放以来，一直把宣传弘扬刘氏兄弟的业绩和精神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坚持免费开放制度，至今共接待海内外各类观众18万余人次，学生5万余人次。

刘氏兄弟故居始终紧密配合江阴市创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优秀旅游城市的目标，加强自身建设，探索历史渊源，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宣传文物保护，充分发挥了故居的宣传阵地作用，将社科普及的重点放在最前沿，社科知识深入广大市民，为江阴两个文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江小方 王晓娟)



# 浅谈利用多种渠道吸引观众走进博物馆

撰文/周家坤

进入21世纪，博物馆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特别是近几年收藏热的风生水起，各种媒体对博物馆、文物事业报道渐多，网上博物馆越来越受到关注，博物馆事业正在迅猛发展。如何在这种新形势新环境下吸引观众走进博物馆，了解认识博物馆，拉近与博物馆的距离，是博物馆应该努力的方向。博物馆可利用多种渠道引导观众走进并了解博物馆。

## 一、利用博物馆优势，举办精品展览吸引观众

举办临时展览是博物馆吸引观众，提升博物馆品质的手段。为了让广大观众方便地观赏到书画名家的作品，并培育引导江阴书画收藏市场。江阴博物馆于2010年推出了杨永康、虞山正社等名家书画作品展等展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博物馆以此为契机，每年推出“名家走进江阴”系列展览。连续推出了“何鸣先生精品花鸟画展”、“静悟茶禅—李玮紫砂作品展”、“沈克山水画展”、“云峰画苑及江阴美术精品展”等32个展览，特别是由江阴市委宣传部与现代快报于江阴博物馆联合举办“墨彩飞扬——首届江苏艺术名家精品全省巡展暨江苏实力书法家提名展”，吸引了江阴市众多市民和周边城市的书画爱好者前来观赏，涉及到国画、油画、水彩画、紫砂等方面名家好手，精美的作品让观众大饱眼福，许多人在观看展览后留言认为江阴博物馆举办此类展览很有意义，学到了很多书画知识，认识很多书画名家。博物馆除了请名家来办展之外，还



请他们为观众作鉴赏讲座。香港云峰画院郭浩满先生在博物馆举办画展的同时，还举行了《艺术与收藏》讲座，吸引了我市众多的收藏爱好者前来听课，讲课气氛十分热烈，效果良好。此外，通过举办展览，博物馆还收藏了这些名家的作品，丰富了博物馆藏品。系列展览让更多观众定期走进博物馆，扩大了博物馆的影响，提高了博物馆的知名度。

江阴博物馆还利用全国博物馆系统的文物资源优势，举办高档次的文物展览。将其他博物馆文物精品“请进来”举办展览。2011年引进了厦门华侨博物院的“陈嘉庚珍藏外国文物精品展”，展出了83件展品，全部是由陈嘉庚先生亲自征集，以日本和欧洲的瓷器为主，让江阴的观众不出国门就能欣赏不同国家的文物藏品，领略异国文物之美，增加了对外国近代文物的认识，了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审美情趣。此外，江阴博物馆充分利用省文物局博物馆资源共享而举办的“江苏省文物精品巡展”系列，如《大风歌-两汉文明

展》、《锦心神针—苏绣与仿真绣精品文物展》《铁血丹心显风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南社书画展》等精品展览。丰富了江阴博物馆的展览内容,开阔了江阴观众的视野,使博物馆逐渐成为江阴观众了解本地及国内外文物知识的窗口。

## 二、招募志愿者免费讲解,吸引观众走进博物馆

2012年,江阴博物馆与江阴本土知名社会团体---江阴日报城事义工合作,组织了16名义工进行博物馆义务讲解员上岗培训活动,对义工们进行了江阴地方历史文化与江阴博物馆馆史、馆况知识的的培训,通过介绍江阴璀璨的地方史,激发了义工们对祖国灿烂文化以及家乡历史文化的热爱,坚定了他们今后义务为传承文明,传播文明的决心。参加本次培训的义工们普遍文化素养比较高,在培训活动进程中,他们也积极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沟通交流,提出自己的想法与建议。整个培训活动施教方与受训方互动热烈,收获颇丰。博物馆通过吸引高素质社会资源参与博物馆,为我馆服务、宣传,使观众参与进博物馆的工作中去,延伸了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群体,将宣传博物馆的人员扩大到观众中去。

博物馆同时也要提高志愿者讲解的技能,使免费讲解不流于形式。讲解员不仅要扎实地掌握展览的内容,还要善于根据观众对讲解信息反馈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讲解技巧,来实现对讲解现场的有效调控,从而取得最佳的讲解效果。与此同时,还要考虑观众的心理需求,比如:观众的兴趣、观众的需要、观众的情绪、观众的记忆、观众的想象等等。一句热情的问候、一句温馨的提示、一个会心的微笑,让观众带着舒心的情绪走进博物馆。

## 三、充分的发挥博物馆业务优势,积极主动走进学校

2012年,江阴博物馆受江阴老年大学邀请,副研究馆员、副馆长翁雪花每周为广大热爱玉文



化的老年朋友普及玉文化的知识,传播玉文化,极大地提高了老年朋友的学习热情,丰富了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

副研究馆员、科研部主任邬红梅还为江阴南菁高级中学美育课程教授“中国古代陶瓷鉴赏”课。讲授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历史,历代陶瓷的特点及文化、美学含义,使学生们从古代陶瓷中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传统文化的情怀。

## 四、利用网络平台,为观众提供数字化信息

网络已成为观众参与博物馆活动的新途径,也是观众与博物馆交流的新手段。借助网络等数字化传播方式使观众更深入、更广泛的参与博物馆发展,以及监督博物馆社会职能履行状况的意愿和诉求,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职能。网络及微博等数字化传播方式在博物馆系统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博物馆社会环境的积极变化,为博物馆发展奠定更坚实的社会基础。

博物馆面对社会观众参与博物馆发展的热情,面对博物馆传播环境的改变,博物馆工作者需要重新审视博物馆与观众的关系,思考观众在博物馆中的位置与作用,探讨如何在提升社会效益质量的同时,为观众参与博物馆发展提供更有效的途径和方法,让观众在利用博物馆资源、享受博物馆服务的同时,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和支持博物馆的发展。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博物馆办公室主任)

# 孙中山视察长江要塞百年祭

撰文/徐泉法

100年前的1912年10月，孙中山用两周时间视察长江诸要塞。由于在这年9月孙中山接受了袁世凯授予他的“全国铁路督办”职务，因此不少人把孙中山这次视察长江要塞活动看作是沿途宣传他的铁路政策。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评价并不全面，为什么宣传铁路政策一定要去长江要塞宣传呢？本文试图在记述孙中山视察长江要塞的过程中揭示其中的深意，以与关注这一历史事件的学者们一起探讨。

## 一、孙中山为什么要视察长江要塞

1912年8月18日，已辞去临时大总统几个月的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离开上海前去北京。9月9日，袁世凯特授孙中山“全国铁路督办”之职。接着，孙中山就在北京、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从事铁路建设考察活动，10月3日才回到住地上海。就在这时，孙中山接到江西都督李烈钧的电报，热烈邀请孙中山前去南昌视察。

李烈钧对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曾通电反对，预料“袁世凯后必称帝”，因此一直提防着他。现在，孙中山接受袁世凯授予的“全国铁路督办”之职回到上海，李烈钧决定邀请孙中山去南昌，“意在以洪都为大本营”<sup>①</sup>。孙中山对李烈钧是了解的，知道他对袁世凯的基本立场，现在面对李烈钧的电报，去还是不去呢？孙中山果断决定去南昌。一方面，可以沿途宣传自己在全国修筑铁路的计划和主张，到南昌后和李烈钧商量在江西的路政，这是他担任

“全国铁路督办”后名正言顺的事；另一方面，李烈钧对袁世凯的提防与忧虑，决非空穴来风，杞人忧天。孙中山记得他在北京与袁世凯会面，表面上看袁世凯对自己极其恭敬，但内心却还处处设防。9月16日，袁世凯在总统府设宴饯别孙中山，借着酒醉刺探孙中山的意志，问道：“方今革命克告成功，先生奔走数十年之目的已达，中华革命于是告终矣乎？”孙中山听出了袁世凯的弦外之音，回答说：“满清幸已推翻，如云国中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袁世凯闻听此言几近失色。<sup>②</sup>你袁世凯心中坦荡，还害怕人家革命吗？孙中山对李烈钧一向引以为心腹知己，听听他的意见提前做些预防决不是坏事。

孙中山决定乘坐联鲸舰溯江西上前去南昌。这样，沿途要经过数处要塞。他对长江要塞可以说情有独钟。早在这年年初，他到南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即1月12日，就与陆军部总长黄兴在午后一起视察狮子山炮台，并乘联鲸舰巡视停泊在南京附近江面的各艘军舰<sup>③</sup>。2月21日，又乘马视察清凉山炮台和雨花台炮台<sup>④</sup>。关注要塞就是关注军事。孙中山亲自策划与领导过多次武装反抗清政府的起义，深知要塞在军事斗争中的重要地位。他决定利用这次赴南昌之机会，视察长江各地的军事要塞。我们从当年《民立报》报道知道，孙中山计划视察的长江要塞共有11处，即：吴淞、福山、江阴、镇江、南京、芜湖、大通、安庆、马当、湖口、九江等要塞<sup>⑤</sup>。

当时的袁世凯对孙中山南昌之行要视察这么多沿江要塞，有过什么样的想法，笔者至今没有查到这方面的档案资料。一百年后的今天，当历史已经完全冷却，我们又怎么来看孙中山视察长江要塞活动呢？笔者曾看到这样一段论述：“孙中山迫于形势，虽与袁世凯妥协，但也估计到了袁世凯将要发生变故，因此特别强调革命军队的重要。孙中山将同意这种见解的革命党人，一一布置于各军事要塞。”<sup>⑥</sup>这告诉我们，吴淞等11处长江要塞的驻军长官，他们的安置都与孙中山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站在孙中山立场上的革命党人。事实上，1912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控制着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南方数省的武装部队，所以第二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时，这几省的部队先后响应孙中山号召，宣布独立，站在袁世凯的对立面起来革命。因此，1912年10月孙中山借去南昌之机会，沿途视察长江要塞，实际上要与要塞守军将士见见面，鼓鼓气，加强防范，一旦遇变，可以派上用场。这样的动机，在孙中山视察长江要塞时的言行中还可以进一步看出来的。

以上所述是孙中山南昌之行深层次的出发点，当然不能公开宣传和张扬的。他当时的身份是“全国铁路督办”，他也确实有志于在这一领域干出一番事业，那么，也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于是，他请了2个测绘生、3个工程师，并携带了写真机械一起前往。事实上，这5个技术人员一路上尽心尽责，对联鲸舰沿途经历过的大庾岭、庐山、鄱阳湖中的大孤山、小孤山，都有许多照片带回<sup>⑦</sup>。此外，孙中山还携带了马君武、王正廷等随行人员，协助孙中山工作。

## 二、孙中山视察了哪些长江要塞

1912年10月18日中午12时，孙中山乘坐联鲸舰离开上海，溯江上驶，踏上了他为期14天的南昌之行。

按照原定计划，孙中山此行要视察的第一

处炮台是吴淞炮台，第二处炮台是福山炮台。但是，联鲸舰没有在吴淞炮台附近靠岸，这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百年之谜。据笔者推测，孙中山当年居住上海，要去吴淞炮台并非难事，而这次南昌之行时间紧迫，就留待下次再来吧。大约在孙中山南昌之行结束回到上海不久的某一天，孙中山乘坐上海路局特备的“花车”，早上8时就到了炮台湾车站，再步行1公里，就到达炮台，看过南北两台的炮操，再到各处视察，连同吃中饭共用去6个小时，然后又步行回到车站<sup>⑧</sup>。孙中山计划中要视察的福山炮台，他也没有上岸视察，当年《民立报》在报道中记下了“道经狼福小作勾留”<sup>⑨</sup>8个字，大意是说孙中山乘坐的联鲸舰在经过南通江边的狼山炮台和常熟江边的福山炮台时，只停留不长时间，站在军舰的甲板上观察了一番。由于取消了视察吴淞、福山炮台的计划，江阴黄山炮台成了孙中山这次视察长江要塞的第一站，在孙中山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

黄山炮台台官和江阴县民政长是事前就接到孙中山要来视察的通知，因此在10月19日午后，就与江阴商会总理、国民党江阴支部理事长等一起早早地等候在黄山港口迎接孙中山的到来。下午2时，联鲸舰靠近黄山港，黄山炮台鸣炮21响以示致敬。孙中山和随行人员马君武在台官和民政长的陪同下，先登上西山视察。西山是黄山的一个山头，有半个山头嵌入江流之中，致使这里的江面仅有1.25公里宽。山头上建有一座炮台，居高临下虎视江面，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塞地形特征。孙中山走近西山炮台，台上安装一尊18寸口径的大炮，子弹重达800磅。几十名炮兵当着孙中山的面，敏捷地装弹、瞄准、放射，孙中山详细询问了射击中的一些细节，回答都让他很满意。接着，孙中山又登上东山视察炮台。东山也是黄山的一个山头，也有半个山头伸进长江里，与西山遥遥相对，中间只隔着一个小石湾。孙中山站在东山之巅，从随员马君武手里接过望远镜观

察江山形势，神情凝重而专注<sup>⑩</sup>。以前，他听过军界人士谈过江阴黄山重要地形，现在亲到实地视察，有了更深的体会。七天后他在南昌演讲时说：“江阴、镇江等处炮台极有力量，为南京最重要门户。”<sup>⑪</sup>孙中山在东山、西山炮台视察长达3个小时，才整装下山，进城发表演讲，晚上9时许回到舰上，鼓轮继续西上。

孙中山视察长江要塞第二站是镇江诸炮台。10月20日早上6时，联鲸舰抵达京口，停泊江心。驻镇江16师官兵在江边列队欢迎，五色旌旗，映日鲜明，停泊江面上的几艘军舰也都挂满了彩旗，鸣炮致敬。16师师长顾忠琛、旅长张伟齐、赵念伯、县长张翼云及各营官、各炮台军士、各界代表依次到联鲸舰中谒见孙中山。接见仪式结束后，孙中山在长江要塞总司令洪承点陪同下，攀登至象山视察炮台。当年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当先生到象山时，炮台台上军乐大作，守台弁兵排列队伍，荷戈立正恭迎如仪。”<sup>⑫</sup>接着，孙中山又依次视察了焦山炮台、零山炮台、圌山炮台。除焦山座落江中外，其余象山、零山、圌山都在长江南岸，诸山都建有炮台，加上在江之对岸都天庙也建有炮台，合称为镇江要塞，对保卫南京有着举足轻重的份量。孙中山在舰上简单地吃了中饭，又命联鲸舰驶向北岸，上岸查阅都天庙炮台。从早上6时，直至下午2时才结束炮台视察，共用了足足8个小时，是这次南昌之行视察长江要塞花费时间最长的一次。下午，孙中山又在镇江广肇公所公开演讲，这在后面还要说到。

孙中山这次视察长江要塞的第三站是南京幕府山炮台和狮子山炮台。幕府山和狮子山分别坐落于南京城的北端和西北端，都耸立于长江之畔。狮子山炮台在这年1月12日，孙中山和黄兴已经登山视察过，这次他还准备再去一次。10月21日下午，孙中山乘坐的联鲸舰抵达南京，城内驻军3师、7师官兵及各界民众站在江边迎接。登岸后，在长江要塞总司令洪承点陪同下，乘坐马车前往幕府山炮台和狮子山炮台视察，

检阅兵操<sup>⑬</sup>。第二天上午10时，孙中山前往三牌楼第一舞台参加南京国民党支部、两广同乡会、铁道协会联合举办的欢迎会，孙中山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下午3时，乘舰踏上新的行程<sup>⑭</sup>。

按照原定计划，孙中山接下来要依次视察芜湖、大通、安庆、马当、湖口、九江等各要塞炮台，因在南京起程时，忽然接到江西萍乡煤矿急电催请速往，于是孙中山改变了行程计划，取消了视察大通、马当炮台的安排，而安庆、九江两地，孙中山虽然都上岸作了演讲等活动，但在当年诸报报道中，都没有视察当地炮台的记载。孙中山离开南京先后登岸视察炮台的共有两站，一站是湖口炮台，时间是10月24日早上，另一站是芜湖要塞，时间是10月30日下午。湖口炮台共有东、西两座，都建在平地上，东炮台位于著名风景区石钟山之东100多米的地方，西炮台位于江中梅家洲东端，两炮台都向北面向长江，中间夹着鄱阳湖出口遥遥相对。由于当年报道没有留下详实文字，只有简短的一句话：“孙先生到赣时，先赴湖口阅视炮台”<sup>⑮</sup>为此笔者推测，正因为湖口炮台处于平地，不用登山，孙中山在10月24日早上军舰经过湖口时，腾出少许时间阅视了湖口炮台。而视察芜湖要塞，则是孙中山结束南昌之行回沪途中，在10月30日上午参加芜湖各界代表欢迎会并演说结束后，在下午3时“仍登联鲸舰，开往东西梁山观阅炮台。”<sup>⑯</sup>东、西梁山位于芜湖城北15公里的地方，这里的一段长江呈南北走向，东梁山在长江东岸，西梁山在长江西岸，都耸立江边，两山对峙，地形极为险要。孙中山能够登上东、西梁山视察炮台，足可以看出，这两处炮台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孙中山南昌之行，在14天行程中，先后登上黄山、象山、焦山、零山、圌山、幕府山、狮子山、东梁山、西梁山等9座山，视察江阴黄山炮台等12处炮台，这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新编地方志上都有记载，在《孙中山史事详录》

(1911~1913)、《孙中山年谱长编》等著作中，甚至还能看到当年各家新闻媒体的第一手资料，这对我们研究孙中山视察长江要塞提供了许多便利。但是，很少有文章探索孙中山为什么这样做，甚至认为他每到一个地方，看看名胜古迹，只是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笔者认为，如果从单一的登山看炮台而言，自然很难发现孙中山深埋心中的秘密，但是从整个行程的活动安排来看，不难看出孙中山这样做决非为游山玩水，而是有着重要的目的，以笔者分析，至少有以下两点：

第一，孙中山密切关心着日后的政治动向。虽然他把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自己接受了一个“全国铁路督办”的职位，从表面上看，也着实尽心做着宣传和筹划工作，但是，袁世凯会不会脱离民主共和的轨道，他心中并没有绝对的把握。日后如果政治方向出现变化，必然会在军事上有所动作，长江沿岸的这些军队，这些永久性军事设施，虽然说当时还都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掌握之中，但他也决不能高枕无忧，必须和军队保持密切的联系，对长江两岸地形和炮台等军事设施熟记于心中，以备不时之需。

第二，孙中山留心着首都南迁后南京的防守大事。在把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明确提出首都必须建在南京。这自然对革命党人有利而对袁世凯所不利的结果。阴险狡猾的袁世凯要弄了许多手法，孙中山才被迫答应首都暂时设在北京。但是，孙中山依然坚持首都南迁的主张，这可以从1912年10月26日在南昌演说迁都问题看出来<sup>⑩</sup>。在孙中山长远计划中，国民政府首都总有一天要从北京迁到南京来。因此，南京的军事防卫问题在他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次视察长江要塞，也都从保卫南京的角度出发的，在南京，视察了该城北翼的幕府山、狮子山炮台，在南京以东，视察了江阴、镇江诸炮台，在南京以西，视察了安徽芜湖东、西梁山炮台和江

西湖口炮台。在以前孙中山研究中，对他这次视察长江要塞活动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或许被他在铁路建设上的热情所遮盖了，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 三、孙中山沿途演讲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

孙中山南昌之行，从10月18日开始，到10月31日结束，在14天中，共到过江阴、镇江、南京、安庆、九江、南昌、芜湖等7个城市（县城），除视察沿江炮台花去大量时间外，其余就是演讲，这既是近距离接触各界人士的极好时机，又是宣传孙中山政治主张和经济建设思路的重要机会，因此，孙中山顾不上旅途辛苦和登山视察炮台的疲劳，凡到一个城市（县城），都应邀参加演说活动，有的城市甚至安排数场演说，据笔者根据当年《民立报》、《民权报》、《申报》、《时报》等报道，至少演说了12场。每场演说，短则几十分钟，长的则达二三小时，如在江阴、南京各演说1小时，在安庆演说2小时，在镇江演说长达3小时。到会听演说的人，除在宴会、国民党支部会议上听众较少外，在公众场合演说，听众都在数千人以上，如在江阴演说，听众4000人，在南京和芜湖演说，听众各达10000人。当年报纸报道说，在江阴，“到会人数几及四千，场中布置虽简，秩序井然，实为江阴空前之盛举”。<sup>⑪</sup>在芜湖，“各界来宾赴会者约以万计，场为之满，途为之塞，盖三尺童子无不以一瞻先生丰采为荣者。”<sup>⑫</sup>这些情景，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民众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推翻专制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拥护，反映了孙中山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崇高威望。

现在，让我们来逐一认识孙中山在12场演说中表达的政治主张和经济建设思路：

第一，呼吁每一个中国人要有主人翁意识。10月19日下午5时，孙中山视察黄山炮台结束后，被邀请进城演讲。这是孙中山在南昌之行的12场演说中第一次当众演说。孙中山首先论

述的是国民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我中华民国人民，已从奴隶的地位变做主人的地位”，做主人要“有主人的资格，有主人的学问，有主人的度量”，要尽主人的义务，即“全国人民多应当兵，多应纳税。”<sup>⑨</sup>孙中山希望与会者经常到乡间宣讲国民权利与义务的道理。10月30日在芜湖演说，又一次说到“现在君主专制既已推翻，凡我同胞，均从奴隶跃处主人翁之地位”，“既处于主人翁之地位，则当把从前之奴隶性质，尽数抛却，各具一种爱国心，将国家一切事件，群策群力，尽心办理，万不能再视国家事为份外事。”<sup>⑩</sup>呼吁每一个中国公民振作起来，关心国家大事，把中国的事尽心尽责地做好，这既是孙中山的一贯思想，也是这次长江沿岸城市演说的一个重要观点，无论是100年来，还是以后的许多个100年，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在中国人民心中已经产生和还将继续产生重大的作用，这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第二，主张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修筑铁路。孙中山在江阴的演说，主要劝导江阴人民修筑一条公路，与已经修筑铁路的城市连接起来，这要比另造一条铁路合算和省钱。至于修筑公路的钱从哪里来，孙中山的想法是：“关系一块地方的，就要本地人民担负了。”<sup>⑪</sup>如果说修筑一条几十公里的公路所需要的经费地方还有可能承受的话，那么，在全国修筑铁路，其庞大的费用从哪里来呢？我们从孙中山在南京的演说中找到了答案：“兄弟因此担任铁路一事，愿以十年为期，建造全国二十万里铁道，以促实业之发达。……欲求速效，则惟有借用外国资本，聘请外国人材，故兄弟主张此铁道政策，采取开放门户主义。”<sup>⑫</sup>在安庆演说时，对“开放门户主义”有了更具体的阐述：“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凡是我们的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用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

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sup>⑬</sup>孙中山主张实行开放门户政策修筑中国铁路，这是他的大胆创新，尽管在当时无法真正实行，而他宏伟的铁路计划也因政局的变动而全部落空，但是，孙中山思想的先行性和对中国经济建设积极探索的精神，即使10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知到他的不朽价值和灼灼光芒来。

第三，鼓吹迁都主张。10月26日，孙中山在国民党江西支部召开的全体职员谈话会上，应邀发表迁都演说。孙中山在演说中坦诚地说，前些时候，关于中央政府都城南北问题，他是“极力主张迁都南京，不赞成北京”，他认为“南京握全国之中，长江流域界于十八省之间，南京为长江之要地，交通便利”，“南京据长江之险”，又有江阴、镇江炮台的防卫，这要比上海安全，“上海虽好，犹嫌在偏，如果战事，必难保全”。“武昌地点虽亦适中”，但从防卫而言，南京更为巩固。孙中山还明确告诉诸人，“现在北京仍是临时都城，中国惟临时二字为最危险。”他认为“北京地势军港，自经庚子兵燹之后，大沽口、山海关等处均无炮台，且中国兵不能到该处，惟外国兵士能到。且外国所设炮台，距北京总统府、财政部弹子可及。”<sup>⑭</sup>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袁世凯盘踞北京是很不放心的。以前有人认为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位袁世凯、自己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以后，已经完全信任袁世凯，这样的认识或许并不符合孙中山当时的思想。

孙中山南昌之行的12场演说，当年的《民立报》、《民权报》、《申报》、《时报》等各有侧重报道。其中，孙中山10月19日晚上在江阴桐梓堂发表的第一场演说，由于参予接待孙中山的章砚春、曹一尘等人的当场记录，整理后经孙中山过目，同意投寄上海《民立报》，《民立报》以《在江阴各界欢迎会的演说》为题全文发表，得以完整保存下来。10月26日晚上在南昌国民党江西支部全体职员谈话会上关于演

说迁都问题的内容，《时报》以《孙中山在赣演说迁都》为题全文发表。这两篇完整的演说词为我们研究孙中山当时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 四、孙中山视察长江要塞产生的深远影响

孙中山为期14天的南昌之行，其中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视察沿途长江要塞及演说活动中，为此广泛接触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政界要人、驻防长江要塞官兵及各界民众，传播了他的政治主张、经济建设政策与军队建设思想，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即使100年后的今天，仍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首先，孙中山与长江要塞驻军的亲密接触，为二次革命打下了基础。孙中山在视察长江12处炮台的过程中，迎来送往的都是要塞驻军，孙中山对军队的重视，对军人的尊重，对军事设施的关注，沿途官兵都亲自感受到这位前临时大总统带给他们的关怀与温暖，在前清时期，他们何曾看到过军政界高层的好脸色？10月20日，孙中山乘坐的联鲸舰到达镇江时，镇江的军政界官员包括“各营官、各炮台员弁”都到舰中拜见，孙中山热情地招待茶水，一一亲切接见，这让官兵们十分满足。10月26日早晨，孙中山在南昌骑马赴城外大校场阅兵，对官兵们说：“前清稗政甚多，军队因之起义，共和乃以告成，虽文明尚在幼稚，能以国家为前提，必成强国，以后存亡关系，专靠我军担任。”<sup>⑧</sup>孙中山在演说中又把世界武力竞争形势明确告诉部队官兵：“现在世界各国，均从事扩张军备，进步一日千里。处今之世，有武力之国家则隆隆烈烈，进于一等之地位，无武力之国家，必至于灭亡。”<sup>⑨</sup>官兵们听到孙中山如此肯定军队价值的演说，当即“鼓掌如雷，欢呼共和先觉万岁！”<sup>⑩</sup>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0月27日孙中山白天诸多活动结束后，“晚与李烈钧密商要政多时。”<sup>⑪</sup>两人密商的内容当年报道未曾透露，笔者推测或许是在密商如何“以洪

都为大本营”的军政大事。在民国初年，南方数省特别是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军队官兵立场都站在革命党人一边，这次孙中山视察沿江要塞，进一步巩固了与军队的密切关系，因此第二年7月爆发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时，上述诸省军队特别是江西首先积极响应，沿江诸炮台都宣布独立，把枪口对准袁世凯指挥的北方军队。究其原因，这与孙中山视察长江要塞不无关系。

其次，孙中山与沿江民众亲密接触，在提高人民觉悟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从当年的各报报道中，可以看出孙中山有主动接近民众的意识，所到各地，虽有部队保护，但并不戒备森严，允许群众自由接近甚至直接聆听他的演说。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往前推10个月，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凡是出行，哪一个不是前呼后拥，军警林立，群众根本无法接近他们。这让民众从中感悟到孙中山浓烈的亲民意识，自然与他亲近起来，他宣讲的道理，也就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特别是孙中山对人民的尊重以及主张的人民主权思想，沿江人民更是亲身感受得到的，因此倍感亲切和快慰。10月20日，孙中山视察镇江各炮台，为了不让附近民众因炮台演放巨炮受到惊恐，事前让县长张翼云通知民众，各区区长安排人员“肩牌鸣锣”，以致家喻户晓。10月30日孙中山在芜湖演讲，强调指出：“现在君主专制既已推翻，凡我同胞，均从奴隶跃处主人翁之地位，则一切可以自由，对于国家一切事件，亦有主权矣。”<sup>⑫</sup>在场民众，或许平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思想上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震动。在同场演说中，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民之于国为最大之要塞”思想，动员民众“共济时艰”。<sup>⑬</sup>这样富含哲学思想的话，无论在当时，还是100年后的今天，都像珠宝般闪烁着光彩。

再次，孙中山刻苦耐劳、节约俭朴的品质让沿江人民深受感动。视察沿江炮台，登山爬坡十分费力，可是孙中山却不怕劳苦，常常一天数小时在野外攀登，不肯歇息。10月19日视

察江阴东山、西山炮台，在山上足足逗留3个小时，进城后已是傍晚7时，却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只吃了几个馒头、烧饼充饥，又立即开始演讲，直到9时才结束回舰<sup>②</sup>。在镇江视察5处炮台，其中4处在山上，一处还在长江北岸，孙中山共用了8个小时才结束视察活动，进城后又接连3个小时的演讲<sup>③</sup>。在南昌3天，孙中山每天都要演讲，因此“喉舌干燥”，又患上了感冒，只得请刚从北京到南昌的张继代表演说<sup>④</sup>。在回沪途中，孙中山还坚持在芜湖上岸，发表演说，结束时已经下午3时，还登上东、西梁山视察炮台<sup>⑤</sup>。这样的工作密度与强度，即使年轻人也受不了。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孙中山乘舰溯江西上，沿途都不住宾馆，而是住宿于舰上，一是节约经费，减少地方政府的负担，二是节省时间，睡眠时军舰照样行驶。即使到了目的地南昌，三天也都住宿于百花洲行辕，而非豪华宾馆。更让人感动的是，跟随孙中山的随员，并不跟着孙中山一起接受地方宴请，而是在舰上自办膳食：“闻先生异常朴俭，不尚奢华，所有随员等膳食均一概自备。”<sup>⑥</sup>联想到眼下公款吃喝之风愈演愈烈，参加吃喝的人员愈来愈多，投放吃喝的成本愈来愈高，常能看到天价公款吃喝的报道，这与100年前孙中山让随员在舰上自己解决吃饭相比，真让人感到汗颜！

孙中山视察长江要塞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当年的部分炮台如东、西梁山炮台、湖口炮台连痕迹都已荡然无存，圌山、焦山炮台也只剩下当年用三七土堆筑起来的炮台轮廓。但是，这些往事并不会跟随炮台的消失而遗忘。我们记住历史，历史也给了我们丰厚的回报。我们有理由相信，孙中山在江边留下的足迹，还会百世长存，他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功勋，必将千秋传颂。

## 注释：

①李烈钧著：《自传》，收录于《李烈钧集》（下册）第812页

- 至865页，中华书局1996年6月出版；  
②《孙中山轶事集》第179页，这一段对话收录于《孙中山史事详录》第41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③《民立报》1912年1月13日报道；  
④《民立报》1912年2月22日报道；  
⑤《民立报》1912年10月19日报道；  
⑥宋斐夫、涂绍钧、吕芳文著：《林伯渠》，收录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4卷第1页至8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  
⑦《天铎报》1912年11月2日报道；  
⑧周南陔：《中山先生检阅吴淞炮台的那一天》，刊于1956年11月12日《新民报》晚刊第6版；  
⑨⑩《民立报》1912年10月24日报道；  
⑪《时报》1912年11月1日报道；  
⑫《民立报》1912年10月22日报道；  
⑬《民权报》1912年10月25日报道；  
⑭《申报》1912年10月24日报道；  
⑮《民权报》1912年10月31日报道；  
⑯《民立报》1912年11月3日报道；  
⑰⑲《时报》1912年12月1日报道：《孙中山在赣演说迁都》；  
⑱《民立报》1912年10月24日报道：《孙先生西行记》；  
⑲《民立报》1912年11月3日报道；  
⑳《民立报》1912年10月24、25、26日报道；  
㉑㉒《民立报》1912年11月3日报道；  
㉓《申报》1912年10月24日报道；  
㉔《民立报》1912年10月27、28日报道；  
㉕《申报》1912年10月27日报道；  
㉖㉗《申报》1912年11月2日报道；  
㉘《申报》1912年11月2、3日报道；  
㉙㉚《民立报》1912年11月3日报道；  
㉛章砚春：《孙中山先生莅澄记》，刊于1962年3月内部发行的《江阴文史资料》第一辑；  
㉜《民立报》1912年10月22、24报道、《申报》1912年10月23日报道；  
㉝《申报》1912年11月3日报道；  
㉞《民立报》1912年11月3日报道；  
㉟《民立报》1912年10月24日报道。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史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 不朽声音越百年

## ——纪念孙中山先生莅澄演讲 100 周年

撰文/汉竹

一百年前的1912年10月19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来到江阴，查阅黄山炮台。受地方人士之邀，在城内城隍庙西厅桐梓堂发表演讲，向民众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大家同心协力，做地球上第一等强国。他那“叫全国的文明从江阴发起”的铿锵有力的话语，跨越百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江阴人前赴后继，用自己勤劳和智慧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文明之歌。

孙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朝廷腐败，国家任人宰割的时代。中国向何处去，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所探索的道路。

1879年6月，孙中山先生随母亲投奔哥哥孙眉到了美国檀香山读书。“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产生了“慕西之心，穷天地之想”的心境，认为中国的出路非此不通。1894年夏天，孙中山北上天津，投书李鸿章，提出以西方国家为楷模，实行改革，遭到拒绝。接着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遭失败，使他彻底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决心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为中国人民寻求一条光明之路。

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取得武昌起义的胜利，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共和。1912年，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清帝退位后，又辞去临时大总统。他没有像一些革命党人那样“功成身退”，而是全身心致力于早年实业建设、创建文明社会的伟大理想。他不辞辛劳，赴全国各地演讲，宣传民生。他在江阴的



重建中山公园的桐梓堂

演讲，正是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当时的思想意识和伟大抱负。

孙中山先生实业建国的宣讲，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登高一呼的作用。全国各地掀起筑铁路、铺公路、建码头、办实业的高潮。因为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个国家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就江阴而言，在孙中山先生的激励之下，吴汀鹭、钱以湘等一批有识之士，兴办纺织业、开设轮船、汽车航行业，修筑锡澄公路。以实际行动努力实践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号召。

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中国便陷入军阀割据的战乱时代。直到孙中山先生1925年病逝，他想用十年时间，在全国修筑20万里铁路的宏伟计划也未能实现。地处兵家必争之地、军事要塞的江阴，更是首当其冲，社会动荡，百姓深遭战火涂炭，孙中山先生的“叫全国的文明从江阴发起”也就无从谈起。

事实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的殷切期望才有可能实现。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下，江阴人民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争创一流，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成为全国的百强县（市）的排头兵，而且在社会文化事业、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果。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等近百个国家级荣誉，华西村则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享誉国内外。

如今的江阴，不仅有四通八达堪称“模范马路”的高速公路和徐霞客大道这样的景观大道，雄伟的长江大桥飞架南北，使昔日的长江天堑变成通途，而且有了江阴人民一百年前梦寐以求的铁路。所有这一切，若孙中山先生地下有知，当为江阴人民创造的文明之花笑九泉。

我们坚信，再过100年的时间也就是到公元2112年，孙中山先生莅澄演讲200周年的时候，江



1936年由砺实、南菁两校学生捐建的孙中山先生纪念塔

阴会更加美好。繁荣富强的中国，早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孙中山“叫全国的文明从江阴发起”的演讲是江阴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将世世代代铭记在心。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博物馆原馆长）

（上接第48页）中山先生的演说历时一个多小时，他反复开导，极富鼓动性，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当场有薛晓升、向宾枫、郑志先、曹一尘迅笔作记录，怕有遗漏，联合对照，再由薛晓升总其成。随后呈由中山先生亲自校阅一过，并由薛晓升连夜用铁笔誊写付印，共二纸。翌日，邮寄各大报，皆全文登出。本县亦广为分发。后收录在《孙中山全集》中。

中山先生演讲毕，即由民政长洪钟在县署内设便宴，请章际治、吴汀鹭、祝丹卿等地方人士作陪，招待孙中山先生和马君武一行。晚10时登原舰离江阴西上去镇江。事后，钱伯钧、章砚春到苏州开会，国民党支部长陈陶怡转述中山先生回去后的话，说：“江阴人不铺张，不浪费，最为合意。”

自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视察江阴后，江阴民众以巨大的热情，响应中山先生关于造公路“叫全国的文明从江阴发起”的号召，即由邑人郑立

三等发起成立县道局，拟定修筑澄锡、澄武、澄琴三条公路计划，于民国4年，先行由工程师梅成章率队，着手对澄锡公路路基进行测量工作。但因军阀混战，时局不靖，阻力重重。直至民国16年（1927）北伐战争胜利后才正式开始动工，到民国22年（1933）相继筑成了澄锡、镇澄、澄巫等三条公路。物换星移，江山换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江阴经济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1999年，就在当年中山先生视察的西山炮台旧址附近，“一桥飞架南北”，江阴长江公路大桥作为联结黑龙江同江至海南三亚国道沿海主干线的纽带胜利竣工，继而新（沂）长（兴）铁路、沪宁高速铁路的江阴段建成，江阴成了大江南北重要交通枢纽和对外开放门户。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预言终于实现了！

江阴文博

（作者：已故原江阴市文化局调研员）

# 孙中山视察江阴

撰文/程以正

民国元年(1912)10月下旬,宁(南京)沪(上海)各大报纸争相以显著版面报导一则消息:孙中山先生莅江阴视察黄山炮台,并在江阴各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当时,辛亥革命刚过一周年,孙中山先生因南北和议告成,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慨然被迫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于袁世凯。他为了发展实业,致力于中国富强,提出20年内修筑20万里铁道的恢宏计划,因而有这次视察长江沿线之行。他是从10月18日由上海乘坐联鲸号军舰首先视察吴淞口炮台而后溯江西上,在19日抵达江阴的。

江阴是长江南岸的滨江城市,在历史上就是对外通商口岸和兵家必争之地。江阴黄山炮台始建于明代中后期,入清后得到不断增修。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后得到了大规模的拓建,它主要依托江阴江岸的黄山、君山、长山,其辖区还包括常熟的福山、对岸南通的狼山、靖江的七圩港等(简称五山一港)均筑有炮台,引进新式大炮、快炮,构成了被称为长江第二道门户、闻名中外的江阴要塞。孙中山先生的密友、镇江人赵声(伯先)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日本结识黄兴后归国,先任三江高等师范学堂教员,三十一年任南洋新军督练公所参谋官,因出色的军事才能,被派往江阴任驻防黄山炮台的新军南洋第九镇三十三标(团)二营管带,不久升为标统。他秘密在新军士兵中宣传革命,为两江总督端方发觉而出走广州,任香港同盟会长。根据中山先生指示与黄兴领导了两次广州起义(第二次即为著名的

黄花岗之役),失败后不久病死于香港。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即授予赵声“上将军”的封号。江阴在辛亥革命时由同盟会分部领导,不费一枪一弹,于11月8日宣布光复。要塞炮台南北两岸官兵2000余名,加上江防营三营,工程水雷营一营和长江水师官兵合计五千余众,接受革命党人的劝说,站到新成立的江阴军政分府一边。这次,孙中山先生特把视察江阴列为他视察长江沿线之行的第二个目的地。

10月19日下午2时许,联鲸号军舰从下游鼓浪而来,进入黄山港江滨,鸣笛停泊,孙中山先生随即由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的老同盟会会员马君武陪同离舰登岸,热情地向前来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黄山炮台官兵排列江干,鸣炮21响致敬。时任江阴县知事洪钟、警务科长陆宸卿、前太史章际治、商会总理吴汀鹭及刚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江阴分部的理事长祝丹卿、副理事长钱伯钧、章砚春暨地方士绅列队欢迎。由祝丹卿为领衔,递呈关于江阴至无锡建筑铁路的说帖,并面请中山先生进城演讲,得到允诺。接着,孙中山先生一行由台官、民政长等导引登上西山炮台。西山又称小角山,是黄山诸峰向江中延伸最突出的一个山峰,它与靖江的孤山相对峙,江面最狭处仅1.25公里。西山之巅筑有顶圆式新台一座,置800磅子后膛大炮1门,口径12寸,长30尺,重52吨,射程1万码,可以旋击江面各个目标,是江阴炮台威力最大的炮之一。另外在小角山腰、小角山嘴和临水的大小石湾,多层次筑有明

暗炮台，配置各种火力。中山先生在西山炮台前，仔细观摩大炮，详加询问，台官一一作答，并当场由数十名炮兵操作实弹演习，装弹、瞄准、放射，动作极其敏捷，都击中了预定的目标。中山先生颇为满意，然后在数十名宪兵紧随护卫下，沿着山梁往东山参观。东山炮台亦称黄山大台，筑有顶圆式炮台一座，配置的大炮与西山炮台完全一样。他举步健捷，神采奕奕，从随行的马君武手里接过望远镜，站在东山之颠的炮台高处，观察滔滔东去的江水和鳞次栉比的江阴古城，兴致很高。在山上历3个小时，稍事休息后，即由民政长陪同下山入江阴城。

黄山距江阴城廂5里许，因此时江阴还没有通汽车，得知中山先生平素不愿乘坐人力车，不得已借用两顶蓝呢大轿代步。六时许，以军乐为前导，由驻澄宪兵队长谢碧梧率领全部宪兵将孙中山、马君武护送，从北门入城，路经县前街、西横街、西大街转司马街，进入大庙巷，直抵城隍庙西厅。民众得悉中山先生到江阴城，争先恐后，夹道欢迎，大家对这位推翻满清专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革命先行者非常崇敬，都以一睹风采为荣。以致万人空巷，道路阻塞，真是盛况空前。

欢迎会场设在城隍庙西厅桐梓堂，取其高深广大，中庭亦宽敞，能容纳很多人。因筹备欢迎时间仓促，会场上仅用柏枝扎成“欢迎”二字。中山先生和马君武下轿后，即由洪钟、陆宸卿、章际治、祝丹卿、吴汀鹭等陪同，步入欢迎会场，转至休息室。因已过晚饭时间，随即送上土制点心两色，一是馒头，时价每件小钱七文；一是黄烧饼，每件仅值小钱二文。中山先生很高兴地每种品尝两件。江阴城像这千载难逢、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而供应经费此区区，恐从来所没有的。此后，江阴老百姓就称桶炉上烘的黄烧饼为“中山饼”。

其时，江阴各界欢迎人士已齐集会场，各校师生列队在前，偌大的西厅桐梓堂及庭前广场挤满了四千余人。看到中山先生登上讲台南向坐，全场掌声雷动。他当时46岁，中等身材，穿深褐色

西装，短发、唇髭，面容丰腴，神采奕奕；马君武身着西装，佩望远镜，坐在台下最前一座面东。台前为记录台，薛晓升、向宾枫、郑志先、曹一尘等四人任记录。江阴各界欢迎会由钱伯钧主持，有向宾枫代表国民党分部预为拟好的欢迎词，由章砚春朗读，在社会党代表致词毕，中山先生起立微笑点头，随即精神饱满地发表讲演。首先，中山先生指出：“今年是民国成立的第一年，我们推翻了专制政府，改建了共和民国。从前是皇帝在上，人民在下，现在我中华民国人民，已从奴隶的地位变做主人的地位，就应该以主人自居。但是我们做主人翁的，要晓得做主人有主人的资格，有主人的学问，有主人的度量。”在简述国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后，他强调“现在民国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做下去，就可以做地球上第一等强国”。

中山先生知道江阴各界有要求从江阴到横林筑铁路的想法，于是在演讲中重点谈了有关筑路问题，他精辟指出：筑路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以江阴来说，应该先建马路（即公路），办好汽车运输事业，连接邻县的火车，这样既节约人力、财力，又易收到实效。他反复开导，特举例说：“因为铁路的建筑，沪宁路办法，每里须四万元，而马路的建筑只须几千元。比方江阴要造的路，不过四五十里，来往的人又不很多，若是通了火车，每天开车两次，那火车公司就要赔本。反不如造一条很大的马路，开自动车（即汽车），每点钟都可以行走。”他语重心长说：“铁路为国家的交通，为几千里路的交通”。“倘若要造铁路，即使建成，亦须加造马路，有了马路，火车方能发达。所以要中国交通上便利，须从造马路做起”。他断言：“一个国家文明的起点，全在国民知道修路。若到文明大发达的时候，必然全国人民都知道修路。”在中山先生结束演说的时候，殷切地期望：“诸君既要想法替江阴的交通生色，不如筑一条大马路，给大家做个榜样，叫全国的文明从江阴发起！”这实际也是给江阴的文明建设规划了蓝图。

（下转第46页）

编者按：江阴古称“暨阳”，盖因境内有暨阳湖，而暨阳湖乃是芙蓉湖（又称上湖、三山湖、射贵湖）之支湖。古时于暨阳湖之北岸建乡治、县治，皆以湖之名命名。由于年代相去久远，对于暨阳县治具体地址，旧志一说在长寿莫城，一说在杨舍。今本刊发表徐祖白先生《关于暨阳县治历史纷争之我见》，又，要考证暨阳县治所在，还必须先找到暨阳湖，故又将宋炳良先生相关文章刊登于后，请广大读者积极参与争鸣。

# 关于暨阳县治历史纷争之我见

撰文/徐祖白

暨阳县是在西晋太康二年（281）设置的江南古邑，距今已有1731周年。暨阳县治即县署所在地究竟在哪里，对于这一问题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同见解。根据旧志记载，多数倾向于暨阳县治是在古镇杨舍，但也有人提出是在江阴长寿以南的莫城。深入探究这一历史悬案的来龙去脉，认真辨析争议双方的是非曲直，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地情文化，理清杨舍历史底蕴，增强爱国爱乡情感，繁荣地方文化建设，具有一定意义。

## 一、现存最早的江阴旧志《黄志》明确记载：暨阳县治在今杨舍镇。

根据1992年11月出版的《江阴市志》记载，从宋代至民国的近千年（960~1949）中，江阴县共编修了18部县志，其中3部编修于宋代，8部编修于明代，4部编修于清代，3部编修于民国。由于岁月磨蚀，3部宋志均已散佚，后人已经无从查考。8部明志中，洪武至弘治早期（1391~1494）之间编修的四部县志亦已失传，至今未见着落。现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江阴旧志，是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由知县黄傅主修的《江阴县志》，为手抄本，史称《黄志》。至明正德十五年（1520），《黄志》由知县王泮刊印。但是，刊印本亦已散佚，而今手抄本珍藏于上海图书馆。

海图书馆。

翻阅《黄志》卷一《制治?官治》读者可以看到这部志书对暨阳县治的详尽记载：

“暨阳县治在今杨舍镇，盖置县而建治于此，非复秦汉以来旧乡境矣！”又载：“宋志云：旧唐书地理志‘江阴、暨阳、利城三县属常州’，今利城在江阴之西，则暨阳当在江阴之东。父老言杨舍旧尝为县，利城、杨舍去江阴东西道里适等，则暨阳当在杨舍。宋去古未远，父老之言要为不诬。参以南沙盐署证之，杨舍为暨阳旧县治也！”

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黄志》肯定杨舍为暨阳县治，主要依据有三：一是宋志的记载，二是父老的口碑，三是有南沙盐署佐证。后人可以想见，《黄志》编修时，宋志当未散佚，属编修依据之一，否则不可能如此言之凿凿。《黄志》所提到的南沙盐署设置于东汉，是管理沿江沿海地区军事经济的官署，首长称都尉，是相当于郡府级别的管理机关。南沙在杨舍以东以南包括今塘桥、凤凰以及常熟福山在内的广大地区，是暨阳县的组成部分之一。

## 二、清乾隆印行的《江阴县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暨阳县治在长寿以南莫城。

在《黄志》问世246年以后，江阴知县蔡澍

于清乾隆九年（1744）编修的《江阴县志》印行，这部乾隆志史称《蔡志》。《蔡志》对暨阳县治所在地提出不同意见，其卷二《建置》中称：

“太康二年，分无锡、毗陵置暨阳县，建治县境内近无锡之莫城，江阴之为县始此。”又称：“莫城在县东南三十里长寿镇南，周遭约三里许，垒土为城，四门规制犹存。”

《蔡志》提出暨阳县治在莫城而在杨舍，其主要依据是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太平寰宇记》是古代重要地理学著作，由北宋乐史编修。该书在卷九十二中曾作如下记述：

“古暨阳城在县东四十里，汉时莫宠所筑，捍海贼翟马，因名莫城。唐武德三年，暨阳立县，并入江阴有莫城乡。”

按照《蔡志》的观点，莫城靠近无锡，地理位置适中，又有汉代古城作为依托，故莫城成为古邑暨阳县的县治是理所当然的。

### 三、集古代旧志之大成的清光绪《卢志》，再次肯定暨阳县治在杨舍。

清光绪四年（1878），集历代江阴旧志之大成的光绪《江阴县志》问世。这部志书是历经三任知县卢思诚、沈伟田、冯寿境编修磨砺而成，主纂者是晚清著名学者季念治。因发起修志的是第一任知县卢思诚，故史称《卢志》。纂修者注意到《黄志》与《蔡志》之间的分歧意见，经推敲再三，在卷一《建置·官署》的正文中，再一次明确记载：

“暨阳县署在今杨舍镇，盖置县而建治于此，非复秦汉以来旧乡境矣。宋齐皆因之。”

《卢志》不仅全文抄录了《黄志》的观点，后面还加上一句“宋齐皆因之”，即杨舍不仅在晋代是暨阳县治，而且在后来的南北朝时期的南宋、南齐，仍然是暨阳县治。“因之”是因袭相承的意思。

《卢志》还对为何采用《黄志》的观点而不采用《蔡志》的观点，专门写了一段附注，作

出说明：

“暨阳旧治，《黄志》谓在杨舍，《蔡志》谓在莫城，未知孰是。然黄志在蔡志前二百五十余年，较为近古，今从之。”

也就是说，《黄志》比《蔡志》早“二百五十余年”（实际上是早246年），且《蔡志》并没有拿出扎实可靠的理由来推翻《黄志》的观点，因此《卢志》理所当然采用《黄志》的说法，将暨阳县治认定在杨舍镇。

另外，《卢志》卷三十《识余》中还有记载：“杨舍为暨阳古城，废址复筑万历年间。”通观《卢志》全书可知，纂修者是立足于杨舍镇乃是暨阳县治这一观点，来贯穿全书加以记述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黄志》、《蔡志》还是《卢志》，在论述暨阳县治的时候，因限于历史条件，都仅仅是从古籍上寻找依据，均没有拿出实证，即缺乏过硬的历史文物包括出土文物依据，来证实暨阳县治之所在，这也是关于暨阳县治历史纷争延绵不断难以彻底解决的根本原因。

### 四、如何鉴别《太平寰宇记》关于暨阳县治的记述。

《黄志》、《卢志》和《蔡志》关于暨阳县治的历史纷争，其焦点之一是如何理解《太平寰宇记》的一段话。《太平寰宇记》是历史上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大凡地方志书纂修者都要阅读并参考其中的相关内容。《黄志》和《卢志》的纂修者不会没有看到《太平寰宇记》的记述，但是在如何理解的问题上与《蔡志》产生明显分歧。

实际上，我们只要仔细阅读和梳理《太平寰宇记》有关莫城的记述内容，就可以知道《蔡志》的观点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我们如果仔细分析《太平寰宇记》关于暨阳古城的那段话，可以梳理出三个要点：一是暨阳古城的建造年代是汉代，而不是在晋代；二是城池的功能主

要是防御海贼翟马，而不是用作县城的城池；三是莫城的城墙是用泥土堆垒起来的，至清乾隆时其四个城门规制犹存。

既然莫城的城池是建造于暨阳县建县之前，功能也不是用作娴熟的防护城墙，而是为防御海贼而筑，那么将莫城定为暨阳县的县治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这也正是历代大多数旧志没有将暨阳县治定在莫城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江阴境内的土城不止莫城一处，有的土城保护的很好，有的早已在岁月流逝中坍塌。尽管莫城的四门在清乾隆年间“规制犹存”，但并不能以此证明莫城便是古暨阳县治。

### 五、后人关于暨阳县治的考证与辨析。

按照历史考古学的观点，认定暨阳县治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历史文物。由于古暨阳县的设置距今已有1700多年，它在历史上也只存在了600多年，并在1000多年前的初唐时期已经并入江阴县而销声匿迹，因此要寻找暨阳县的地面上历史文物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唯一的希望是能否从地底下挖掘出与暨阳县治相关的出土文物。

近年来，张家港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杨舍地区发现了不少汉晋以来的文物遗迹。去年的暨阳论坛，缪自强和宋炳良两位先生均以论文专述了杨舍地区古代的遗迹遗存。文章如数家珍，列举了两晋以前许多极其珍贵的出土文物，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早在秦汉和两晋时期，杨舍地区就已经是经济社会较为繁荣和发达的地区。再进一步考察为什么汉代盐铁塘会一直开凿到杨舍的理由，得出的结论是：早在汉晋时期，杨舍地区就已经是一个经济繁荣、商贾云集、农耕文化发达和人口稠密的居住之地，这也是西晋二年（281）在设置暨阳县时，为什么会将县治这一重要机构设置在杨舍的重要物质和社会基础。

另外，从清代至民国，江南地区不少文人学者对古暨阳县和杨舍镇写下不少诗篇，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大多数学者是倾向于杨舍是古暨阳县治的观点。

在清代，最著名的是清嘉庆年间探花赵翼的诗作。他在寓居杨舍期间，曾写下近百首吟咏杨舍民俗风情的诗，诸如“暨阳城外皆洪流，尚是江尾已海头”、“暨阳城下小舟开，正值村村放早梅”、“东去相传多古迹，暨阳城控海为门”等等。在赵翼眼中，暨阳即是杨舍，杨舍即是暨阳。

在近代，代表人物是金武祥（1841~1924），金武祥是江阴璜土人，学问精湛，著作等身。尤以咏家乡山川、人文古迹、风土人情、地方掌故见长。他在《江阴竹枝词》中有一首专门吟咏杨舍的诗：

堡城杨舍峙东隅，万卷书楼绘有图。

镇志居然资考证，暨阳旧治暨阳湖。

他在诗后还专门做出附注，表明自己对杨舍的认识：

杨舍距县东50里，为晋至初唐暨阳县旧治。江阴湖当在其南，杨舍志有暨阳湖考。明嘉靖时因备倭建堡城。国朝嘉道间，叶氏藏书甚富，有静观楼绘图微诗。光绪癸未集字印杨舍堡城志十四卷，亦叶氏所纂辑也。

这里顺便说起，1987年江阴市出版《江阴地名录》时，同样采用了《黄志》的说法，指出暨阳县的县治在杨舍。而到了1992年，《江阴市志》出版时，却采用了《蔡志》的说法，将暨阳县治定在莫城，但又在页下加注：“旧志一说在杨舍。”这说明关于暨阳县治的历史纷争至今尚未结束，除非能够拿出直接证明县治所在地的实物依据。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讨论和文物考古的逐步深入，这场历史纷争终究会有真正水落石出的一天。

江阴文博

（作者：张家港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 古暨阳湖考

撰文/宋炳良

史书记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延陵乡改置毗陵县（现常州）。在县东置乡，因境内有暨阳湖而名暨阳乡。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又在暨阳乡的基础上划入沙中和无锡一部分置暨阳县。从暨阳乡到暨阳县，从沧海变桑田的沙洲；从农耕文明的沙洲县到现代文明的张家港市，从探索她发展巨变的密码，到现在挖掘研究弘扬暨阳文化，都离不开暨阳二字的原点——古老且已经消失的暨阳湖。细读史书，一千年来，历代郡、县志的编修者和历史爱好者都在考证、寻找暨阳湖。

为了对暨阳湖的考证和探索，我阅读参考了多部史书和历史图集，拟对历史上诗人吟唱暨阳湖的所在地；今人对暨阳湖的诠释作一评说，并对暨阳湖的探索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以求方家。

## 一、元代诗人陈樵见过暨阳湖吗？

江阴市志（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暨阳文苑（201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均刊有元代诗人陈樵题名为《暨阳湖》的一首诗：白浪浮天雪作堆，羞将俗客洗尘埃；月从水底沉钩去，船似鸥边泛叶来。野屋有篱编白荻，渔矶无席藉苍苔；功曹吟苦多诗渴，拟借平湖作酒杯。这首诗前六句是写景，字里行间看不出与其它江南的湖有什么不同之处，最后二句只是诗人夸张浪漫和抒情。诗的出在哪里呢？查光绪《江阴县志》卷二十七，有《分送李仲常江阴知

事三首》。李仲常，浙江金华人，和陈樵是同乡、朋友。李在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至正年间担任江阴县知事。第二首诗为《钓台》，明代《嘉靖江阴县志》载：钓台在县东二十里，《风土记》云：（《风土记》是西晋周处所编记述地方风俗的名著——笔者注）姜太公钓鱼之所在，今为钓台村。第三首为《翠光亭》，《毗陵成化志》载：翠光亭在君山。如不身临其境，是写不出“亭前练水细为萦，亭上君山玉作屏”诗句的。陈樵（公元1278—1365）是元季人，李仲常在江阴当知事，邀请陈樵到江阴小住游玩也在情理之中。但元季暨阳湖还在吗？翻开《成化毗陵志》卷十六；江阴县记述：暨阳湖在县东十五里，熙宁间（公元1068—1077）已湮废，今皆莫详其所。既然在北宋暨阳湖已经湮废，那么陈樵在哪个湖坐船游玩呢？细看毗陵志和多部明清两代江阴县志知道：李仲常任江阴知事期间，江阴西南的月城、桐岐和武进县的芙蓉，无锡县的玉祁、前洲一带有一个很大的湖“芙蓉湖”。芙蓉湖古称“上湖”、“射贵湖”，入无锡地所称“无锡湖”，在江阴境内又称三山湖（马家湖），原水域面积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唐代陆羽曾这样描写道：惠山东北九里上湖，南控长洲，东峒江阴，北掩晋陵，苍苍渺渺。唐代诗人李绅还留下一组且望芙蓉湖的诗篇：水宽山远烟岚迥，柳岸萦回在碧流；逐波云彩参差远，背日岚光隐见深。

《明成化毗陵志》离元末李仲常任职江阴相

距一百二十五年，对于前一百多年的历史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何况是在成化以前江阴历史上还修过洪武志、永乐志、天顺志，修志者是不会遗漏元末还存在的暨阳湖，但每部志书均“莫详其所”，结论是：陈樵坐船游玩的湖，应为芙蓉湖在江阴境内的支湖——马家湖无疑，他之所以题名为暨阳湖，是诗人怀古而发。他这一发不要紧，误导以后不少人认为元代暨阳湖还存在。

## 二、暨阳湖在北澗、南澗、顾山、常熟吗？

近年来我市编写出版了多种普及宣传张家港历史文化的书籍。对于宣传张家港市悠久的历史，方便我们研究暨阳文化很有必要。但对暨阳文化的原点——暨阳湖的诠释、注解均采用了清代《杨舍堡城志稿》作者叶长令《暨阳湖考附》一说。细读叶长令的文章，再结合史书研究觉得是他一家之言，他只是提出自己的一个看法，他也很谦虚：“夫立于千数百年之下，而追溯千百数年之上遗迹，苟有一知半解，勿可默也。爰为讨论之，以俟来者”。

**立论一：**乃近志引《宋志》云：湖在县东十五里。窃谓“十五”当作“五十”其误倒之，或由宋志，抑由引者均不可知。经查多部江阴县志和毗陵郡志对暨阳湖的记载是一致的：“县东十五里”。如果一部志书记错有可能，且多部志书记述均一致，误倒之说不能立论。

**立论二：**若易为五十里，则正在今杨舍之南。北澗、南澗、顾山镇及常熟界袤延二十余里，港汊纷歧，水流平广而清深，湖在此似无可疑。翻开《江阴嘉靖县志》卷首有《宋志全境图》，杨舍之南北澗方向标有胥湖。看比例胥湖是一个小湖，该志卷三《山川篇》记载：胥湖宋志云在县东，旧经云伍子胥入吴到此击剑而歌，湖在胥歌村因名。时间进入到一九九二年，江阴市志出版，在地质地貌篇，现代科学把江阴地貌分类。北澗、长泾、顾山等乡镇属高亢平原，面积300多平方公里，高程在5米以

上，典型土种为黄白土和黄泥土。而上节提到的马家湖地处月城、青阳、桐岐、马镇等乡镇原为芙蓉湖一部，面积200多平方公里，高程1.5—2米，为典型的湖相沉积圩区平原，由沉积淤泥而成，典型土种为竖门乌山土。（详见《江阴市志》129页）查《北澗镇志》：早在唐宋时期，今北澗镇大部份属于东舜乡，当时就有了村落北角墅，与相隔十里的南角墅分别为东舜乡的南北两端，所以以角相称。这一带河渠纵横，应天河、东新河、谷渎港、南长河等水系交汇其间。古时由于水利设施不完善，遇到雨季泄水不畅竟成泽国，北澗得名与水患有一定关系。

**立论三：**县在湖之北故曰暨阳。其实史书上已有记述：因乡境有暨阳湖，才名暨阳乡。暨阳县是置暨阳乡后四百多年的事情了。

早在一百三十多年前，叶长令先生就探索暨阳湖，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比如地面高程的测量；土质分类等方法来分析湖址远不及当今先进。但他的一家之言被我们现代人广泛应用。打开网页：暨阳湖在北澗、南澗、顾山无疑。是否缺少了对历史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呢？暨阳湖是江阴境内的一个湖，相对大湖来讲它是个小湖，所以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没有记载。

## 三、暨阳湖是芙蓉湖的支湖

暨阳湖已消失殊一千多年了，它的湖址在哪里？现存对暨阳湖最早最完整且文字最多的记载是《成化毗陵志》：“暨阳湖在县东十五里，又有螺洲在县界，其状如螺，熙宁间已湮废，今皆莫详其所”。根据县东十五里且有湖的记载，可以有以下几种情况：1、江阴县治东十五里，正如叶先生所言，东侧为三官镇，东南则为云亭镇，皆在诸山间，似无地可容是湖；2、古暨阳县治东十五里有两个可能，杨舍东十五里为长江古江岸；长寿东十五里为华士镇和新桥镇，史书上没有湖的记载，且江阴市志把

两镇划属高亢平原；3、吉利城县治东十五里为申港镇，同样无湖；4、是不是毗陵县东十五里呢？查成化毗陵志：芙蓉湖在县东五十五里，有湖但明显距离不对。细看常州、江阴、无锡三地大比例地图，现武进芙蓉镇往东即是江阴县界，往南不远和无锡县界相连。细读成化毗陵志对暨阳湖的记述，面对“在县界”这三个字，突然有所启发，是不是在县界东十五里呢？东县界之东十五里是扬子江古岸，西县界东十五里即为芙蓉湖延伸在江阴境内的部分时名三山湖的遗址，（明代又名马家湖）且和无锡县相邻是县界。

三山湖和暨阳湖是什么关系呢？由此我查阅了无锡和武进方面的一些史料。据无锡市史书记载：芙蓉湖在无锡境内过去有十多个湖泊组成。经过围湖造田，现在无锡称芙蓉圩为西湖（玉祁一带），杨家圩为东湖（前洲一带）两地原为一湖。常州和江阴境内，芙蓉湖也有多处相连。对于江南境内这个仅次于太湖的湖泊，从春秋时期就开始治理芙蓉湖，他在无锡、

武进、江阴等地开凿多条河浦，便于灌溉和运输，汉晋至北宋有过多次围湖造田活动。由于河道的开通，芙蓉湖分支的多个湖泊呈时湖时田的状态，加上人为的造田，所以史书载暨阳湖“熙宁年间已湮废”。和芙蓉湖的历史变迁相吻合。

明宣德年间，江南巡抚周忱立足全局开河泄水，筑坝挡水，修圩围田。凡辟出芙蓉湖田三万六千亩划归武进、无锡两邑，马家湖田七千三百亩属江阴。《光绪江阴县志》芙蓉湖基本消失，但它的支湖在以后又被相继围田，无锡境内直到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围垦完毕。

芙蓉湖消失了，在无锡、常州留下了许多如芙蓉镇、蓉湖庄、莲蓉门等地名。由于暨阳湖、暨阳乡、暨阳县的悠久历史，在江阴和张家港杨舍一带带有暨阳二字的地名广泛流传至今。

江阴文博

（作者：张家港市地方志爱好者）

## 江阴博物馆获中国自然博物馆协会优秀工作者

12月，江阴博物馆接到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发来的通知，根据《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优秀集体及个人评选表彰办法》，由协会评选领导小组研究，并经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会通过，江阴博物馆科研部符蕴被评为“2012年度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优秀工作者”。符蕴作为江阴博物馆自然标本类藏品的主要专业人员，一直承担着标本的养护及对馆藏自然标本的研究工作。多次为市民提供自然标本的相关资料查询，并免费为市民提供自然标本知识的咨询及标本的鉴定，为馆内人员进行科普培训的讲座，认真钻研业务知识，积极撰写论文，有效地宣传和传播了科普知识。

（红梅）



# 范仲淹景祐兴学与江阴重修文庙

撰文/贡振亚

说起范仲淹，很多人会想到他的《岳阳楼记》，同样会有很多人知道他的《严先生祠堂记》。如今，岳阳楼和严子陵祠都因为范仲淹的千古文章而名闻天下。然而，范仲淹为江阴文庙撰写的《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一文却知者寥寥，江阴文庙也没有因为这篇文章而拥有与岳阳楼和严子陵祠相同的威名——但是他们同样见证着一段意义非凡的历史。

## 一、范仲淹兴学

气势恢宏的《岳阳楼记》，写于北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年间。虽然这是一篇应滕子京之邀为岳阳楼重修所写，但实际上可以视为范仲淹对“庆历新政”的一次总结，也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情怀的一种抒发。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奉诏入京，出任参知政事，建议十事（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以谋改革。这次革新，得到了宋仁宗的支持，也得到了富弼、欧阳修等人的协助，“庆历新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虽然庆历新政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就草草收场，但他的影响还是深远的。特别是在此期间掀起的“庆历兴学”，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中国古代的学校，有官学、私学之分。官学主要有两个级别。

一、国学。也称国子学、国子监、太学等，是中

央的最高学府。

二、府学、州学、县学。即各级地方上的学校。

庆历新政期间，宋仁宗下诏兴学：“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这次自上而下的兴学起到了空前的盛况——“由是学校之设遍天下（马端临语）。”庆历以前州县学校很少，庆历以后“州郡不置学者鲜矣”。有人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就是指庆历兴学说的。庆历兴学对于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范仲淹之所以敢于在庆历新政期间，大张旗鼓地兴学，并取得全面成功，这与他在景祐年间在苏州兴学积累的经验是密不可分的。

景祐元年（1034）下半年，范仲淹便奉命移知苏州，在苏州一年多的岁月内给故乡桑梓之地留下了不少政绩，最为后世所传颂的，是他关心苏州的教育事业，在南园购地创立了府学。南园本是五代钱元璿的别墅，后又为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所筑。利用南园的一隅，范仲淹原先想建造私宅，后来请人看风水，风水师告诉他，在这里居住的家族，其后代必然通过读书而发达。范仲淹考虑到“吾家有其贵，敦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我的家族自然有其应有的尊贵，如果让天下的读书人都在这里接受教育，让他们一起发达，那样的尊贵才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当即决定——舍私宅、办公学——这就是著名的苏州府学，现在的苏州文庙与苏州高中的前身。景祐兴学由此展开，地方办学由此发端。

景祐兴学虽然比不上庆历兴学的影响之大，

但他是由范仲淹亲自操持的，工作更为细致，持续时间也更为久远。可以说，景祐兴学是庆历兴学的前奏，正式因为范仲淹在景祐兴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才使得庆历兴学能够如此顺利地取得全面的成功。

## 二、范宗古重建江阴文庙

根据光绪《江阴县志》的记载，江阴在景祐年间，也有兴学的举措：“军故无学，初建庙于观风门外，学者肄习其中，后知军范宗古以邻郡狱，卜千军治之东南（原注：景祐三年，范文正祀之）。”

范宗古《宋史》无传，生平事迹不详。但在《志》篇中有“仁宗天圣四年……详定知广安军范宗古奏”，由此可知，范宗古在江阴卸任后，又曾担任过广安（今四川广安）知军。另据光绪《江阴县志·职官表》记载，范宗古为山西高平人。

熟悉范仲淹的人应该知道，范仲淹撰文，经常署名“高平范仲淹”；同僚常称范仲淹为“高平”、“高平公”；范仲淹的学生又自称“高平门下”，并因此形成一个学术流派——高平学派。应该说“高平”与范仲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范仲淹后人范祥科考证，与范家有关的以“高平”命名的地方历史上曾有七处：宁夏固原县，史称“高平郡”，是范姓祖籍；山西高平市是范仲淹续妻曹氏家乡；山东昌邑县，西晋时曾称“高平郡”，范姓祖先曾避难于此；山东邹平县，古称“高平县”，范仲淹继父朱文翰曾在这里为官；江苏苏州市“高平里”，是范仲淹父亲范墉出生地；河北正定曲阳桥乡高平村是范仲淹母子出生地；河南伊川县“高平陵”，是范仲淹母子墓地；而范仲淹母子共同出生地、范仲淹父母结婚地则是河北正定高平村。

无论如何，范仲淹与范宗古份属同宗，又都和山西高平有联系，两个人的关系还有可能很亲近。如此说来，范宗古请求范仲淹写一篇《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也在情理之中了。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范仲淹在苏州兴学、范宗古在江阴兴学，前赴后继，无论是在行动上，还是在精神上，

都是吻合的。

根据《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的记载，江阴原有文庙，庙址在观风门（江阴城南城门）外，士子都在那里学习。当时江阴的行政建置为“军”（略相当于今天的省辖市），知军范宗古到任后，认为文庙与监狱相邻，有辱斯文，于是请来风水先生，重新找了一块宝地，将文庙迁往军治（市政府）的东南侧。

范仲淹对范宗古赞赏有加，原文曰：“成均博士范公宗古之守江阴也，谨明诚，挺至诚，黠豺狼之凶，礼刍荛之善。废典皆举，积诉咸辨。清风以下，人则笑歌；阳春之来，物自鼓舞。”成均博士即国子监教官，由此可知范宗古与范仲淹一样，也是一个博学鸿儒。

范宗古在景祐三年重建江阴文庙兴学的善举，得到的当时以及后世的肯定与赞誉。范仲淹的《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首开风气，其后的历代《江阴军志》、《江阴县志》，以及《绍定重修学记》、《重建明伦堂记》等，都不断地提及范宗古，将他作为江阴文化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将他在景祐重建江阴文庙的善举作为一件重要事件。

## 三、《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的风格

《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未见于明代刊行的《范文正公集》，但再历代《江阴军志》、《江阴县志》中都有收录，新近出版的《范仲淹全集》也收录了这篇文章。虽然还有人怀疑此文并非出自范仲淹之手，但也拿不出足够的证据证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仍从其旧，认范仲淹创作《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为真实，分析此文的风格以及范仲淹的情怀。

对比范仲淹先生的另外两篇名篇《岳阳楼记》和《严先生祠堂记》，从文章风格上看，都与《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有相通之处。

比如说，《岳阳楼记》开篇即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

王庙记》也记述范宗古守江阴事，并在最后交代“命仲淹书之以识其实”。

再比如，为了描述严子陵与光武帝的德行，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用《易经》的爻辞来说明问题：“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而在《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的开篇，更是大量化用了《易经》、《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的内容：“吾夫子之道也，用则行，而天下治；舍则藏，而天下乱。得其门者，若登其泰山；涉其流者，若示诸泗渎，钴仰何待，隆喊以时。得者得之，失者失之，譬覆载之仁，无待于报，照临之明，不求其助，荡荡乎唯道为大，如斯而已者也。若夫袞其服，庙其神，岂吾圣之心哉？盖后之明王，尊道贵德而不敢臣，故奉之以王礼，享之于太学，昭斯文之宗焉，仍命五等咸得祀之。”范仲淹所创立的高平学派治学泛通“六经”，尤重于易学。《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的开篇，确实有范仲淹行文的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和《岳阳楼记》都创作于范仲淹失意之时。纵观范仲淹一生，应该说是几度沉浮。

《岳阳楼记》创作于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庆历五年，范仲淹被贬那州，是年冬，范仲淹因年迈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欧阳修贬去滁州，滕宗谅（即滕子京）贬在岳州，尹洙则流窜筠州。范仲淹与滕子京是同科进士，还是一起为庆历新政尽心尽力的同僚，又一同被贬。所以，范仲淹创作《岳阳楼记》时，实际上寄托了无限的深情。一句“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意味深远：一方面是在为滕子

京的被贬辩白，当然也是为自己辩白；一方面则告诉他，滕子京是在干出一番成绩之后才“重修岳阳楼”的，堵住了悠悠之口。

相对而言，范仲淹在创作《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时要平和得多。景祐三年，范仲淹因上书言事被贬饶州，因为范仲淹几起几落，所以这次到都门外送行的亲朋，已寥寥无几。但正直的王质，却扶病载酒而来，并称许“范君此行，尤为光耀！”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经三次光耀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品吧！”如果说，范仲淹创作《岳阳楼记》多少还抱着“同病相怜”的怨气的话，那么他创作《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时，更多的是“同气相求”的和气。不难想象，当范仲淹知道范宗古在江阴兴学，并取得成绩时的喜悦，并取得成绩时的喜悦。因为他知道，在地方政府兴学，还有人与他唱和。

南怀瑾先生在《原本大学微言》中称“范仲淹是真正的儒宗儒行”。他提拔课富弼、石介、狄青等能臣良将，奖掖了张载等大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言传诵千古。岳阳楼、严子陵祠都因为他的妙手文章而被天下人所熟知。他为江阴文庙重建而撰写的《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同样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以礼治天下”的儒家思想。这篇文采斐然的文章，足以将江阴文庙提升到与岳阳楼、严子陵祠等量齐观的知名度。

**江阴文博**

#### 主要参考资料：

- [1]廖志豪：《范仲淹与兴学育才》
- [2]赵统：《江阴书院史话》，黄山书社
- [3]徐华根：《江上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江阴文庙）

# 徐霞客的“溯江纪源”与江阴人的实验精神

撰文/徐敏

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概论》在介绍《治国学之方法》时，提出“辨书籍底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底变迁”、“辨文学应用”五项。其中，“明地理”和“知古今人情底变迁”两项，在《徐霞客游记》都有体现。

章太炎先生说：“近顷所谓地理，包含地质、地文、地志三项，原须专门研究的。中国本来的地理，算不得独立的科学，只不过做别几种史、经底助手，也没曾研究到地质、地文。”我想，如果章太炎先生细读过《徐霞客游记》，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徐霞客游记》在地质、地文、地志上都有贡献，并且功勋卓著。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上超越前人的贡献，特别是关于喀斯特地貌的详细记述和探索，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关于长江源头，因为在《尚书·禹贡》中有“岷山导江”的一说，所以长期以来，一直以岷江为长江源头。后世很多著作如郦道元的《水经注》都支持此说。但是徐霞客在广泛阅读地理著作之后，却对此产生了怀疑。何以解惑？他不是坐在书斋里，捧来一大堆地理书籍对比阅读，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而是身体力行，逆流而上，亲自探寻长江源头。通过长期、广泛、深入的实地勘察，证实长江源头并非岷江，拉开了探索长江源头的序幕。徐霞客将他的勘探和考证长江源头的过程记录成洋洋万言的《溯江纪源》（一作《江源考》），可惜原本已失，所幸在冯士仁编定的《崇祯江阴县志》中节录了《溯江纪源》中的千余字，使我们可以管窥一二。

徐霞客“溯江纪源”一事体现出来的实验精神，既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明末科技兴盛，《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也是江阴人的一大特征。江阴人治学、办事，最重实验。徐霞客是一例，曹颖甫又是一例。

曹颖甫是清末民初的经方大师。经方医学是最正宗、最纯粹的中医。因为西医的传入，近代中医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医界全力迎战，其态度大致有三种：其一、以章太炎为例，主张废除中医里的玄说，以照顾西方人的接受能力；其二、以丁甘仁为例，主张道、术并用，以照顾普通人的接受能力；其三、以曹颖甫为例，主张回归本原，以经方实验证明中医的精妙。章氏、丁氏的努力可以理解，而曹氏的坚守尤其难能可贵。曹颖甫的坚持为他赢得了普遍尊重：在医学临水上，他往往手到病除，人称“曹一贴”；在医学教育上，他培养了一大批名医，为中医的大发展积蓄了力量。因为古今度量衡的变化，中医用药的计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曹颖甫通过一例例鲜活的医案证明，最佳用量是将《伤寒论》中一两用作现在的一钱，这与章太炎通过出土的五铢钱考证的结果完全吻合——曹颖甫的实验与章太炎的考证相互印证，共同解开了中药计量的千古谜团。

江阴人的实验精神还可以举刘氏三兄弟的例子。刘半农在留学法国期间，利用西方公认的科学体系和科学实验来研究中国的声韵学，找出平上去入的内在规律，从而证实（下转第63页）

# 乡情·旱情·疫情

## ——读《爱吾庐诗钞》 睹绝人寰惨象

撰文/刘湘和

江阴晚清诗人金武祥，有首七绝：“昭明锦带顾山陲，访古偏同访友迟。最喜神交有张子，采将红豆寄相思。”诗中提到的张子是谁？诗在注释中点明：“江阴东乡顾山，旧有昭明太子读书楼，复建锦带书院，因太子有十二锦带书也。楼旁古红豆一株，枯而复苏，豆色赤若大红，豆圆而扁，惟不常结，遂不易得。张少泉大令居华士，与余诗函往返，屡拟往访未果，尝得红豆寄赠，并侑以诗云。”看到注解，诗情也明了了。“张子”即张少泉，华士人，作过县令（大令），他俩的关系为“神交”，老朋友啊！张少泉曾以红豆寄赠。从张少泉寄给金武祥的诗中可知：“怀君十载晤君迟，劳我心旌夜夜驰。好借良朋当儿女，一双红豆寄相思。”张少泉怀念金武祥之心切从“劳我心旌夜夜驰”句可知，以红豆寄相思，红豆本是相思子。该诗的题为《以红豆四颗送金滩生同转赋以媵之》，金滩生即金武祥，滩生为武祥的字。张少泉寄赠四颗红豆并赋了一首诗。两人虽同在一县，但相距甚远，一个在江阴西乡璜土，一个在江阴东乡华士，那时因交通不便，所以很难见面。两人曾在书信中商量好，要结伴去顾山访古红豆，终未能成行。从金武祥的诗中只知张少泉为华士人，官居大令，但对他的其他情况一概不知。这次有位朋友送我一册张少泉的《爱吾庐诗钞》（复印件），江阴市中医学会又提供我从张少泉家谱上查阅到的资料，我才了解了大概。

张洵佳，字少泉，号瑞生，江阴华士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卒于民国十一年壬



戌（1922），享年77岁。而金武祥生于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卒于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享年83岁。金武祥比张少泉年长四岁，均生活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张少泉并非出生医学世家。他早年攻读儒学，经考试入选国子监。他虽入仕作官（县令），然而，他却博览众多医书，特别擅长中医内科。他是位自学成材的中医。张少泉平生爱才如命，诲人不倦，先后掌教游梁、信陵、梁丰等书院，及门受业者尤多。后又去河南商丘徐府授课。徐世昌、徐世光兄弟俩均出其门下。徐世昌待询佳公能尽弟子（学生）之谊，公暮年退居华士，每逢冬季，徐必寄赠吉林人参及鹿茸等补品。当他得知张少泉病逝的消息后，特派人送来一方匾额，上书“江藩师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其侄儿张宗耀随叔父攻读中医内科（张少泉未有儿子，收侄为后）。张宗耀的儿子张慕候为第三代传人。我市人民医院的张鍊（1943-2005）继承张氏百年秘传，为第四代传人。以后无人学医，到此断代。我从《江阴文史资料》第五辑由叶云峰先生写的

《华士名医张少泉轶事两则》中知道，张少泉是位名医，“在文学之外，兼长医术，医名与文名独步中州”。他在河南上蔡任知县后不久弃仕，在河南、京师一带悬壶行医，以医名著称。晚年退归故里，继续从医，并收授门徒。《爱吾庐诗钞》竟有六人为之作序，首序由金武祥作，序中写到：“君以优行举贡，出宰各邑，循绩卓然，中外大僚多门下士。”张少泉以优贡生入仕，赴各县上任，成绩卓著，中外不少大官僚都出于他的门下。他在自己诗的注释中也提到：“余亦由朝考得知县，捧檄中州。”中州，即河南。清光绪翰林徐世昌就是他的学生，徐世昌为《诗钞》作序于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06），自称“门下士徐世昌”。徐世昌兄徐世光

也为之作序。另有自称愚弟柳堂者，于宣统二年庚戌二月二日（1910）为《诗钞》作序，序中提及“常闻江阴张少泉先生者，以优贡知县来豫制义，为一时冠，从而问业者踵相接，先生亦乐不为疲，时复流览光景，制为诗歌，以抒写性情，若无意于官者，心服其人不忘嗣，其权宁陵、权陈留、又权上蔡，所至皆以经术饰吏……”这段序白告诉我们，张少泉以优贡选拔为知县，来到豫（河南）任上，名重一时，所以到他门下受业的人接踵而来，张少泉也很乐意接受，经常与门人“流览光景”，创作诗歌，抒发性情。不热衷于当官者，对他心悦诚服，继承他的学业。他在河南宁陵、陈留、上蔡诸县任县令时，不以权贵压人，而是以“经术”服人。他在河南各地宦官十八年，与当地百姓的关系“民情水乳融”。《五十书怀》诗写到“俗吏何尝无傲骨，好官原不在多钱。须知成败非人力，看我撑持十八年。”他当官十八年，不为攒钱，不做贪官，“两袖清风双鬓槁，一身官辙历西东。”清官做到双鬓枯槁，足印

踏遍各地，为民“振策”。很可惜的是，像他这样一位人才，却生长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末年，清政权摇摇欲坠，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能振得了“策”吗？所以他在任上期间十分凄苦，诗中写到：“知是儒官今已误，茫茫宦海苦无边。”另有一首诗写到：“生长江南三十年，虽然贫贱也神仙。花飞草长春三月，买到黄金值几千。”可见他对家乡的留恋，对自己宦海生涯的厌倦。他在《续伤春词》中写到一位十七岁的杨家小女子，嫁他作妾，并跟他学诗词，“拍红牙”，哪知中秋赏月“忽气急痰涌而卒”，张少泉万分悲痛，感慨地规劝道：“他生弗再侍乌纱”，如果有来生，不要再嫁给当官的了，可见他对官场的厌恶。

那么张少泉的医术如何？无论是《江阴文史资料》，还是《江阴杏林春秋》，均专门写及张少泉是位名医，但笔墨甚少。纵览诗钞，内中有几处提到行医的事。有位名肖遇春的门生为《诗钞》作的序中提到：“夫子尤擅和缓术，从不用峻剂，而活人殊多。”夫子即少泉，他为人诊病，擅于用和缓之方，从不用苛刻严厉的药剂，所以救活了许多病人。他在《原韵再寄》诗注释中写到“小渔与余同习医，而家寒相等。”他与家乡的小渔同时学医。《阅医经自嘲》也有记载：“偶然涉猎到轩岐，十载虚名动众知。采得古方三百个，阿娇无子竟难治。”此诗证明他是学医的，但他行医“偶然涉猎”。他采得众多古医方，要使无生育能力的女子能生育，却无方可施。一首《鹅湖纪事示子随子告别》诗中就明白地证明他的医术还比较高明的。无锡太守邀他去游惠山，结果太守患病，“须臾奉出主人命，不暇看山且看病。主人病象究如何，道是缠绵一月多。良朋错当良医待，要依一帖清凉散。急从夹袋觅参苓，一夕酣眠病转轻。”太守与他是故交，生病一月余，把他看作良医，他从随时都带在身边的布袋里拿出药丸，太守服后酣睡，第二天醒来病就减轻了许多，足见他是位手到病除的名医了。

张少泉由于长期在外作官，虽有医名，但因平时以宦胜医，所以他未能列入龙砂八大医家之例。



由于他生活在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他的仕途也是不顺畅不得意的，清廷未泯他就归里了。

### 乡 情

他的《沧海归帆集》的首篇“八月二十六日挈全眷南归口中占”诗：“从此逍遥别有天，一鞭径指暮云边。身回故国三千里，梦醒黄粱十八年。儿女团圆新眷属，簪缨摆脱小神仙。鬓毛渐落乡音改，笑诵唐人老大篇。”他在外作官十八年，今朝回归故乡，摆脱作官时的繁文缛节，一身轻松，胜似小神仙，所以他的心情十分欢畅，在大梁做官好似黄粱一梦。又有《客还乡》一诗：“松榆秋老客还乡，定有儿童就讯忙。相见相亲疑梦寐，已亡骨肉感参商。不羈马足悬崖勒，大好鲈腮信口尝。白发青山仍旧识，较他后起问名强。”道出了他准备归乡时的悬念心情。这里的“客”就是他本人。他的人还未踏上归途，就想象归家时见到乡亲们的情景：把松榆比足自己，到了秋老(年老)才回乡。村里的儿童看见他，就会问这是谁啊？“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亲朋好友相见如在梦里一般，谈到以前村里的人，有的已经亡故离世了，不免心生伤感，觉得很不是滋味。所以他感到早点回故乡犹如悬崖勒马，回头得早，家乡的美味佳肴还来及亲口品尝，白发老人和横卧在村北的青山依旧认识，心里感觉踏实。《九月十一日偕王慰三章彦芳王倬臣赴荡口舟中联句》一诗，写到他舟行之乐：“橹声欸乃杂渔歌，已渡长泾十里河。星斗夜寒人意静，霜天月淡雁行过。舟经蠡湖遥闻柝，路近鹅湖捷似梭。料有故人悬榻待，清樽情话乐如何。”他乘船去无锡荡口拜访故友，橹声欸乃，渔歌阵阵，星斗夜寒，淡月霜天，途经长泾北湖，舟近蠡园，待听远处传来敲更声，想到故人悬榻，清樽情话，故乡的秋夜有多么的恬静啊！当他们回华士时，又作一首《偕慰三归舟联句》：“归途缓缓夜凉天，明月清风载满船。溪水平摇双桨活，渔村微露一灯圆。秋心絮诉莎鸡冷，霜气肥蒸稻蟹鲜。如此烟波无限好，尽教收拾到吟笺。”九月十一日同王慰三、章彦芳、王倬臣三人赴荡口，

这次与王慰三两人归家，待觉一路上心旷神怡，渔火点点，正值稻熟蟹肥的江南美好时光，尽叫这美景跃然笺上。他在大梁作官有这么尽兴的时候吗？一首《华士祝枝词》道出了他的心情：“十里横塘九曲湾，龙山才过又龟山。苏州路远常州近，吃着江潮语带蛮。”“棉花织布胜绵绸，江北人来市上收。有女家家勤早起，机中忘却未梳头。”“高乡最怕旱成灾，水种虽多未肯开。(塘河蓄水，俗称水种)耘罢稻田新得雨，人人吃酒上街来。”龙砂山，乌龟山在华士周庄境内。华士周庄北临长江，人们喝的是长江潮涨潮落的江水，所以江阴人的语气不像苏州人那样糯，比较生硬，“蛮语”，如问你“什么东西？”江阴人就说“吃刀啦？”那时江阴农家东乡一带都有家织布，还未有洋布入市。他写到华士姑娘很勤劳，早起织布忘记梳头，这种家家织布，户户机杼声的景象解放初期仍然到处可见。华士山脚下的田块称为高乡田，最怕干旱年。待到秧苗插满田时，正当黄霉天，雨水足，农人上街吃酒来了，此情此景似活现在我的眼前，年少时常遇到此种情况。《壬寅夏令纪事后歌》写到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江阴华士旱灾，诗记曰：“吾乡地势高，水田连山麓，不畏大雨霖，但畏骄阳曝。今年交夏令，雨仅沾霖霖。秧针初插时，秧水已不足。尚有未耕田，专待雨如瀑。何期一月来，痴龙竟藏伏。青苗萎欲死，水田干成陆。即欲播杂种，亦视土膏沃。霖雨既愆期，安望种能熟。似此荒象成，争相县官告，县官摇手言，报灾君且莫。国债急如火，更比骄阳酷。杂税且加赢，正赋乌能缩。急将夏税完，免与施敲扑。君国不暇顾，何暇顾民瘼。施赈官无钱，平籴倉尤谷。转瞬开冬漕，尔再毋轻渎。乡民闻此言，齐声同一哭。”这首五言长律把光绪二十八年，江阴、华士一带旱灾年分农田无法下种，杂粮也难以弥补的灾情荒象表达了出来。霖霖，小雨，仅下了几滴小雨。向县官求援，县官非但不救民之急，反而要征“夏税”，而且还要加杂税，真是苛政猛于虎。皇帝自顾不暇，那可能来顾老百姓的死活呢！清朝末年，政府腐败，再加之灾荒频发，导致了辛亥

革命的暴发。在他的《论古上集》中写到出生江阴长泾的东林党人缪昌期：“明季(明朝末年)缪文贞(缪昌期谥文贞)，住居吾邑东。相去二十里，穆然仰清风。当其逮讯时，慷慨气何雄。铜仗敲骨碎(上刑)，火炼灼身红。诬赃三千两，五日征比凶，磁锋刺溃肉，惨与忠悯同。殮屍十指墮，掬置两袖中。云是劾奸疏，疏草出自公。助恶许显纯，因之毙孤忠。逆阉不足责，天启何昏蒙。”诗作表明了作者的政治态度，揭露了明末阉党罗织罪名，迫害东林党人的丑恶嘴脸，也展示了缪文贞备受酷刑慷慨对薄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还有出生明末江阴北固赤岸的李应昇，也在诗作中称其为“磊落气如虹”、“烈烈有英风”的江阴籍的忠臣。他对江阴其他方面的人物也有诗载，从诗作中窥见了他的正义感和对史料的熟稔程度。

### 旱 情

《诗钞》“游梁集”中有一首“流民图”的长律，极其深刻地揭露了清末河南灾情的满目疮痍、惨不忍睹的景象：“一望平原白骨枯，苍苍何虐民何辜。不死刀兵死亢旱，百万生灵存者罕。我今涉笔声泪俱，以诗代作流民图。”开首就见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到处皆白骨露于野，几百万生灵存者无几，原因在于“亢旱”，即遇到大旱年景。作者作此诗时，声泪俱下。“流民”，逃难之民也。接着诗写到：“中州三年不得雨，沟浍成蹊田坼土。嗷嗷万姓渐啼饥，始质钗簪继典衣。”三年不下雨，沟渠田地干裂，三年无收成，可见旱情之严重。百姓开始时把首饰典当，后来把衣服典当。“奸商得计据垄断，以一博十利尤称。三间老屋砍作薪，欲炊不炊卖与邻。东簷蹲踞西簷宿，生怕人慎不敢哭。”奸商乘机博利，以一搏十。拆除老屋的木头当柴卖，无房居住，只得东躲西藏，怕被人慎怪还不敢哭。“泥萍和水抟为粮，阿母未食儿先尝。老树苍根锉作屑，干咽不饱肠先裂。”断绝粮食后以泥中的草、老树根锉屑后作粮，这样的“粮”怎么咽得下，硬是咽进肚里消化不了，肠裂寸断。“携锄白昼掘亲茔，细检枯骨搜遗簪，一日一日日难度，从

此骨肉不相顾。你鬻儿兮夫卖妻，苟延残喘忘惨悽。惟有孝子与节妇，以死相从不相负，夫也饿倒阿爷亡，朝投池兮夕悬梁。”灾情的惨象越来越严重，到了卖女卖妻的地步。只有孝子节妇以死相从，出现了丈夫饿倒，阿爷死亡，早上投河夜晚悬梁的惨状。这还不算，诗还继续叙写人吃人的残酷情状：“最惨尤有沟中瘠，待毙荆桧气未绝，村头饿汉趋来前，见之色然流馋涎。舁归宰剥充饥外，留取余骸入市卖。入市卖令人不知，索值较贱且食之。”人将断气而气未绝，骨瘦如荆桧，有人将这种仅剩一口气的活人抬回去宰杀，当牲畜一样煮熟吃，吃剩的入市卖。此种惨象读来心呕，心酸，心悸。人吃人的事发生在清末旱灾三年的河南并不为奇。据《炎黄春秋》记载，在三年自然灾害严重时，甘肃一带也发生此事。“我昔奉使洛阳路，道旁饿殍千百数。淋漓碧血洒斜阳，郁蒸秽气绞人肠。”张少泉因公差去河南洛阳，一路上看到饿殍千百，碧血淋漓，被斜阳薰蒸后的一股秽气浸入鼻孔，人闻到后，肠像被绞断一样难受。惨象之烈，毛骨悚然。“至今恻恻惨魂魄，其余一一目中遇。莫谓虚言无足据。流民之图若是夫，彼肉食者知之乎。”作者最后申明，他所描绘的流民图绝无虚假，此种人食人的惨象亲眼目睹。

这幅“流民图”，作者以一声长叹“吁嗟呼”开头，以“知者之乎”结尾，可知其感慨之深，从中也悟出一个道理：每个朝代的末年，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再加以灾荒连年，政府又无力回天，这个朝政必然离灭亡不远了。旧政的腐朽为新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而新政的建立是在旧政腐败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这是历史前进的必然规律。

### 疫 情

清朝末年，龙砂大疫。张少泉退官还乡后，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华士一带的瘟疫，记下了这一幕惨状，甚具历史价值。此诗题为《龙砂大疫谣》。龙山和砂山即华士周庄一带，发生了瘟疫，瘟疫严重到何等程度，作者对此以歌谣的形式记录了下来。

“妖云黑眚空中过，疫鬼披发当门坐。一家疫

死两三人，竟有全家剩一个。一个买棺出外走，皇皇然如丧家狗。家中死人无人守，涕泣请邻人，邻人尽摇手。”疫情严重到全家人只死剩一个，这一个上街买棺，家里的死人无人守，请隔壁的邻居帮助看守，邻居直摇手。因为这是流行疫病，唯恐传染，所以直摇手。“东家买棺，西家买棺，郊衢杂遯买已完。急觅一棺到家殓，尸虫出户人人见。草草藏形，棺薄如翅，鲍鱼之肆有余腥。”因死人之多，棺材买到缺货，又因天气炎热，在外觅棺的时间长，到家时尸体已经腐烂，尸虫爬到门外。用芦帘草草裹尸，其腐烂散发出来的气味真像鲍鱼店里烂鱼的鱼腥味。“亲友避面呼不应，其有贫者不能殓。则裹以草，具代以门。殓于田，田有黍，殓于山，山有主，仓猝之间无葬地。累累野厝同抛弃，三伏暑，六月天，残骸腐骯蒸毒烟，淫霖恶血迸流泉。饮之者立毙，触之者立颠。因之疫气传染广大而无边。”有的尸体死无葬身之地，只能将一具具腐尸抛在野外，无人收管，恶血淋漓，毒气漫延。喝到流进井里的水，立即死亡，碰到毒气者立即疯颠。瘟疫一时传染得如此严重，怎么办呢？“有父老疾首蹙额而相告，曰疫深矣，若之何？盍申醮祀，驱邪魔，钟鼓备阵牲礼其罗，斋戒沐浴祷尔于上下，神只谓：可以消疹疠，迓祥和，岂知迪吉者少，而遘凶者多。”有几位上了年纪的父老乡亲，目睹惨状，想用打醮的办法来驱除邪魔，那里知道参与的人少，遇到凶恶的人多。无人站出来为驱除邪魔做些好事。作者叹道：“吁嗟乎，自古天

心多慈厚，我有心香大如帛，夜夜焚香礼北斗，亟拯疮痍登仁寿，千叩首万叩首。”作者在无奈之下，也只得祈求上天保佑了，“夜夜焚香”、“亟拯疮痍”。可以说是无奈之下的悲凉之举。他虽有医术，却无回天之力。记下这段疫情，了解清末龙砂地区疫病流行的惨状，极具有史意义。关于瘟疫的情况，还有诗作写到一家灭门的，这里不再赘述了。

从以上叙写的乡情、旱情、疫情的诗作中，既了解到清末社会的动荡局面，也了解到张少泉的粗略人生经历。他的《诗钞》共分“篋馀集”、“游梁集”、“归帆集”、“归田集”以及论史上下卷。正如金武祥在序中概括的：“稿分篋馀集一卷，则少年时里门酬唱及经历浩劫所寄慨也；游梁集一卷，则远宦中州敷陈政事、登眺名迹所托兴也；归帆集一卷，则乐赋遂初而复流连于去思也；归田集篇什尤夥中有论史上下卷，则独具才识，援古论今，以诗为史，其他怀人感旧，触绪成吟，与香山放翁神似。”金武祥把每一集概括出中心内容，最后对张少泉的诗结论出一个总的印象：“与香山放翁神似。”香山即香山居士，放翁，即白乐天，就是说与白居易的诗有神似之处。白居易的诗揭露社会矛盾，抨击历史时弊，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张少泉的诗在当时是有一定影响并具有高超境界的，因未被收录进四库全书而流传不广，所以就不能与金武祥相比了。

**江阴文博**

(作者：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化干部)

(上接第 58 页) 平上去入的分类是符合科学规律的，并因此完成了博士论文：《汉语字声调实验录提要》。刘半农此举并非附和西方科学，而是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合理性谋求旁证。此后，他又完成了《四声实验录》等重要学术作品，这些著作无不体现了刘半农的实验精神。此外，刘氏兄弟改良二胡、琵琶等民乐的做法，也是实验精神的体现。刘半农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明代的朱载堉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十二平均律（新法密律）的伟人，而十二平均律正是现代音乐正是现代国

际音乐中通用的标准。刘天华在刘半农研究的基础上，先后改良了二胡、琵琶等传统乐器，使之符合十二平均律的标准，为民乐的现代化、国际化奠定了铺平了道路。

徐霞客的溯江纪源体现了江阴人的实验精神，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也是江阴人的宝贵财富，值得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国学研究学者)

# 秦望山名称考说

撰文/陈锡良

江阴市月城与南闸交界有座弯弯似龙的秦望山。传说秦始皇骑着青龙途经这里，被南闸。月城6个“桩”（村庄）绊住走不动了，秦始皇猛抽两鞭，变成了头坳、二坳。另有传说秦始皇命大力神从四川把峨耳山搬到这里来填海，秦始皇登上峨耳山，就改名为秦望山。且以未登之前叫峨耳山，神话传说都说到秦始皇登过峨耳山而得名秦望山。那末历史上秦始皇到底是否登过峨耳山呢？我说，肯定登过。

威震天下的秦始皇根据地在陕西，比起老家的秦岭以及出巡游历过的五岳等名山，江南平川低丘峨耳山根本无法相比，那么秦始皇为什么会登临江阴这座小山呢？说起来有五大背景。

第一大背景：有时间、空间登过。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从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210年11年间，先后出巡五次。前四次主要东巡中原齐鲁，第五次，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先南下再北上。公元前210年新年初（十月一日为秦朝新年开始）开始南下，先到今湖北的云梦泽，又到今湖南的九嶷山祭虞舜，然后顺江东下，经过南京、丹阳，向南入钱塘江，到会稽（今浙江绍兴），登上会稽山祭大禹、望大海（与水有关），会稽山改名秦望山。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写：“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随后，司马迁不惜笔墨，录下石刻全文，289个字。接下来写了非常简洁又非常关键的一句，简洁到把千里返程北

上仅用14个字概括：“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

14字的意思是：秦始皇从会稽返程北上，经过原来的吴国属地，从长江上乘船东下到东海，在海上折而向北到山东琅琊台。14字中最关键的是“过吴，从江乘渡”6个字。

秦始皇怎样“过吴”的呢？我大胆判断（见自绘的《秦始皇第五次东巡“过吴”路线示意图》）：秦始皇从钱塘江口出发，在海上乘船沿着东海岸边过吴的。因为，现在的上海市、太仓市、昆山市、常熟市大部分陆地在当时都是浅海。如常熟古名海虞，《吴地记》称“以其东临沧海故也。”江阴当时也是临海的，江阴古名暨阳，有能看到太阳出海的意思。

这幅“过吴”路线示意图中，红虚线表示沿海沿江路线，浅绿色表示2200多年前还是可以航船的浅海。秦始皇海上“过吴”中，上岸登了四座山：第一是钱塘江北畔、今海盐海边的一座山，得名秦望山（现秦山核电站就在此）。第二是现上海金山区沿海的一座山（可能是海岛），得名秦望山。第三是现江苏昆山市千灯沿海的一座山（可能是海岛），得名秦望山。吴王梦寿时曾在此山设烽火台，以防海盗袭击，说明就在海边。第四就是江阴的峨耳山，得名秦望山。峨耳山虽然离东海相对要远些，但是离长江很近，当时不过10多里。现靖江市南半部当时还是长江（明朝前期还称水沙相间的马驮沙），江面远比现在开阔，而且长江向东不远

就是入海处。秦始皇船队就沿着常熟、江阴东面沿海处进入长江，秦始皇在江上能清楚地看到峨耳山，上岸登上了峨耳山。秦始皇登山后，回到长江乘大船，很快出海——完全符合司马迁所写“从江乘渡”路线。出海后扬帆北上，直达山东黄海的岛屿琅琊山。

江阴秦望山，就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亦可称东巡）后得名的。这次南巡后，也就是秦始皇死的这年，有六座山得名秦望山。秦始皇登吴中五山，只是小小插曲，无关大雅，所以善用密不通风、疏可走马笔法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省略不记了。但这事对地方官民来说是大事，故把五山更名为秦望山，以志纪念。

第二大背景：秦始皇崇尚水。

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时期，其中战国时齐人邹衍是一位阴阳五行学说的集大成者。秦国灭掉6国（都属于周朝）后，秦始皇接受并推行邹衍的“五德始终”方家学说，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德行学说，朝代必然更迭的理论。邹衍奏道：周朝属火德，秦国属水德，秦国取代周朝，就是水克火，奉天承运，符合天意。于是秦始皇崇敬水德，称自己的王朝是水运王朝，颁布一系列属于水德、水运的政令。

金木水火土，配白青黑红黄五色。水色黑，于是秦朝服装崇尚黑色，不仅皇帝服、百官服是黑色，就是黎民百姓服装也是黑色。旗帜也是黑色。宋代袁默诗《秦望山》中的“自矜功德愚黔黎”中的“黔”，就是黑色；“黔黎”，就是指穿黑衣服的黎民百姓。

在乾坤坎离巽震艮兑八卦中，分别代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火是阳，水是阴，八卦中最大的阳卦是乾卦，最大的阴卦是坤卦。坤卦卦象六排，每排两短线，六排就是六爻，从下往上分别是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上六，都是阴爻，都是以六为代表。水运、水德王朝以六为吉数。于是秦始皇规定冠冕高为六寸，车宽六尺，皇帝出行驾六马，全国划分为六六三十六郡。水主阴，阴主刑杀，所以秦始

皇用刑严酷，反对施行仁政。

秦始皇对水情有独钟，在东海边登山都是看水观海。在会稽登山，祭治水的大禹，同时观海（实际上是泱泱杭州湾），在钱塘江畔登山，观杭州湾、东海。在上海、昆山登山，观东海。在江阴登山，看芙蓉湖、马家湖、长江、东海。在山东烟台琅琊台，观黄海、渤海。

第三大背景：秦始皇痴迷长生不老，寻求长生不老仙药。

秦始皇出巡有三大原因。一是“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史记·秦始皇本纪》）。二是“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史记·李斯列传》）。主要目的为游山玩水，特别是大湖大海。三是寻仙山，寻仙人，寻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5次出巡临海，都与求仙有密切关系。他首次出巡到山东，封禅泰山，到海上琅琊台观苍海（与信水有关）。齐人徐福吃透

秦始皇第五次东巡“过吴”路线示意图

说明：红虚线表示沿江沿海路线，淡绿色表示2200多年前还是浅海



皇帝信奉方家仙道之心，上奏海中有神仙居住的仙山，有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药。秦始皇大喜，相信亲眼目睹的海市蜃楼就是仙境，自己看得见却上不去，于是派遣徐福出海寻仙。徐福后来谎称寻仙受阻，礼物不够，秦始皇再命徐福带3000童男童女及百工出海寻求仙药。可是徐福一去不复返，使得秦始皇非常焦躁。后来秦始皇第4次出巡中遇上了张良行刺的大事。此后数年，秦始皇惊得不敢出巡，但是梦求长生不死、就是被刺杀了也不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组织了第5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南巡。这在这年，由于10个月的奔波劳累，秦始皇死在沙丘（河北巨鹿），为求长生不死而竟然死在求仙道上。这实在是一大悲剧。

**第四大背景：**江阴秦望山是水中之山，是湖岛。

证据一，志书上有记载。清代光绪《江阴县志·山川江湖》（见图）：“芙蓉湖距邑南境三十里，以湖水绕三山下，名三山湖，又名射贵湖。地隶无锡、阳湖两邑。其东壤属江阴者，则马家湖也，隶于青阳、夏城、黄桥三镇之间，

与芙蓉湖接壤，中界一塍。前代时澄波千顷，葭荻丛生，固汪洋一大渚泽也。明宣德时巡抚周文襄塞湖为田，筑土为堤……”文中所述“以湖水绕三山下”是关键一句。“三山”即秦望山、观山、白石山三座独立不相连而又相邻的山。当时的芙蓉湖（包括马家湖），是江南仅次于太湖的大湖。还有一个史料可以说明是湖区。吴季札为避王位而躬耕在舜过山（观山向北延伸的支脉）下，死后葬舜过山旁的小岛上。有小岛，说明那里是湖。锡澄运河东面的花山不在湖区，地势高，周围是陆地。包括要塞、峭壁、云亭、三官一带基本是陆地。这可以用花山东北侧的余城遗址来证明。先民筑城，既要临水又要择高地，以免洪水冲击。临江的花山、君山、黄山，定山，长山、蟠龙山等都在陆地上，唯独秦望山、观山、白石山为湖中之岛，水中之山。

证据二，秦望山等三山周围地下有大量泥炭，山脚有大量贝壳化石。翻阅现代的《武进县志》、《无锡市志》、《江阴市志》、《南闸镇志》、《月城志》土壤分布，地下有大面积的乌山土（又称黑泥、乌泥、泥炭），涉及三县，包括三山周围在内（具体数据不作细述）。乌山土密集处古代是芙蓉湖、马家湖。正像煤炭、石油是由远古森林、动物、微生物变成一样，黑泥是由远古茂密的芦苇、灌木变成，而芦苇是长在湖里的，灌木长在湖边的。我老家离秦望山三四里，“文革”中和社员一起在农田里挖过黑泥，挖下一米，即有厚厚的一层黑泥，可分辨出是芦苇，还挖到树干。黑泥切块晒干后当柴烧，有一股淡淡的臭味。我还见过秦望山脚下有大量螺蛳壳、蚬壳化石。这是湖中遗物。

**第五大背景：**秦始皇唯我独尊，自称“祖龙”。

秦王嬴政想方设法把自己神化为至大、至高、至尊、至圣的天下第一人。并吞六国后，召集群臣商议帝号，群臣说，“皇”是天人之称，“帝”是天的称号，于是他把两字合起来



称“皇帝”，而以前只有“黄帝”。他要把“皇帝”世世代代传下去，他是第一个皇帝，就称“始皇帝”。秦始皇独称“朕”。朕是第一人称，本来人人可用，嬴政当上始皇帝后，就只准他一人自称了；后来听了阴阳家说神仙是真人，他又自称“真人”，放弃称“朕”。这些说明他绝对迷信，又说明他要树立绝对权威。在先秦，龙是传说中无所不能的神物，自古以来成为华夏民族憧憬征服大自然的图腾。于是，秦始皇就以龙的化身自居，秦朝的百姓就称秦始皇为“祖龙”。《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临死以前，民间流传“今年祖龙死”。秦始皇忌讳“死”，听了很不高兴。实际上他龙的意识非常强烈。他对有“龙”、有“王气”的地方，就讨厌，想方设法去镇压。

综合上述五大背景，秦始皇登临峨耳山就顺利成章了。

且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到浙江后出钱塘江沿着海岸线北上，经过现海盐、上海、昆山来到江阴境内，看到峨耳山，树林郁郁葱葱，逶迤起伏，四面环水，活像一条在大水中昂首遨游的青龙。崇水信仙的秦始皇，强烈地联想起海中有仙山、派遣徐福求仙的往事，仙山似乎就在眼前。而徐福带了3000童男童女和百工入海寻仙，竟然泥牛入海无消息，强烈的求仙求药的夙愿还没有实现的焦躁在煎熬着，他要登山观水。要登山还有一个心理因素，他要以自己这条“真龙”来镇压眼前这条“青龙”。并不因为他是“龙”，就亲近其他的“龙”，龙只能一条，他要上去践踏，煞一煞眼前这条龙的“王气”。秦始皇煞“王气”是大有前因的。这次秦始皇南巡会稽途中，到过金陵（现南京），卜官说金陵有“王气”，今后说不定

要出皇帝，秦始皇就下令把金陵改为“秣陵”。秣者，喂马之草料也。他又来到会稽郡云阳县（今镇江丹阳），卜官望云，说这里有“王气”，秦始皇下旨先破坏风水，派“赭徒”（穿红色囚衣的罪人，地名“丹徒”也与此有关）凿开境内的北岗山，把直线的驿道变成弯曲道路，把云阳改名曲阿。秦始皇在句容登过一座小山，得名秦望山。秦始皇出游中类似破“王气”的记载还有不少。所以《史记·高祖本记》写：“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秦始皇心理是复杂的，他既崇水信仙药，他喜爱眼前的湖岛，以便登山观海，盼望仙山仙药；又不满意眼前的“龙山”，他要登山破“王气”。

秦始皇登上峨耳山，西南望泱泱芙蓉湖，北看浩浩长江，还可能极目看江北高邮，那里是儿子子婴的封地，但看不到，太远了。东眺茫茫东海口。秦始皇登山之后，离山到江边乘船，入海向山东而去。从此，秦始皇登临峨耳山的故事，就成了史家的素材，百姓的传说。

如果峨耳山不是湖中山，只是和附近的花山、亭山等山一样在陆地上，就擦肩而过了。我得出结论，秦始皇到过江阴，秦始皇痴迷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崇水，相信湖海中有仙山，峨耳山是湖岛，这是登临峨耳山环环相扣的原因。千年以后，暨阳湖消失了，芙蓉湖、马家湖不断淤积，改造成河道农田，秦望山成了陆地上普通一山。秦始皇登临秦望山，成为江阴古老的无字历史。

秦始皇走了，秦望山热闹起来了。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市文联原副主席）

# 柳宝诒与致和堂膏滋药

撰文/王晓燕

在江阴名人馆中有个医药厅，走进医药厅，可以看见装饰得古色古香的药柜，厅中间还有一位年近半百的老人塑像，手执毛笔，伏案书写，似乎在开着方子，这位就是我们的晚清名医柳宝诒。

江阴的中医药有着悠久的历史，名医辈出，到了魏晋时期就有了治病的记载，唐代起设置医学博士“掌疗治病”，从此以后，医学和保健逐步迈进了繁荣时期。明清时期，江阴的中医学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在吴中地区温病学派崛起形成的同时，江阴出现了驰誉全国的著名医师，“儒医”和“世医”并驾齐驱数百年之久，柳宝诒是杰出代表。

柳宝诒，字谷孙，号冠群，又号惜余主人，江阴周庄人，晚清著名中医学家。《江阴县志》

称其“为人和厚好学，能文工书，尤长于医”。同治四年（1865），柳宝诒考中第一名秀才，以优贡入京，因见清廷腐败，无意于仕途，遂归里研究医道，不久便名闻远近，在江阴、无锡、常熟、苏州一带颇有盛誉。他一生著作甚丰，门人众多。著作有《素问说意》、《温热逢源》、《惜余医案》、《柳选四家医案》等十二种。由于柳宝诒医术高明，济世有方，“柳致和堂”盛极一时，在当时中医药界“南有庆余堂，北有同仁堂，中有致和堂”之誉。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大多缺乏运动，身体有时会处于亚健康状态，中医对治疗亚健康很有研究，用中医饮食调理就可以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对症施治，食到病除，所以以往多为中老年人追捧的中医调理，如今确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

中医养生讲究四时阴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时值秋冬之际，正是进补的好时机。我们民间“冬令进补，来春打虎”之说，三九严冬进补，正是一年中阴气极盛而阳气始生的转折点。冬令进补大多采用膏滋药，即所称的“膏方”。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膏方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由柳宝诒创设的“柳致和堂”膏滋药的特色是膏方因人而异。一是选用古代经典方、陈方，特别是柳宝诒所著的



《柳致和堂丸散膏丹释义》的经典处方，适当加以调整充实，具有卓著的效果。二是绝大多数为当代名中医经过诊断开出的处方，膏方的配药、用量严格按照进补者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补者所在地区、年龄、体质及病情等不同情况合理配制。膏方用药地道，精益求精，采用上等药材，杜绝以次充好。不少药材直接从产地购进，确保药材纯真。在用药分量上做到足斤足量，保证有足够的药效。严把清理、清洗关，精心泡制成饮片，确保膏滋药用药优质洁净。三是严格采用传统的工艺流程，膏方的制作要经过药料浸泡、煎煮、浓缩、收膏、存放等几道特定的程序和严格的操作过程，原料加工采用传统工艺，不添加任何化学成分，操作全凭经验掌握。每道制作过程都由经验丰富的老医师严格检查监督，确保膏滋药的质量，因此经历百余年时间的洗礼，柳氏膏滋药的制作工艺并没有消失，反而生命力日显蓬勃。

致和堂的滋补药酒五加皮酒、玫瑰酒曾于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银奖。如今江阴致和堂膏滋药制作方法已于2010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柳宝诒创设的“柳致和堂”膏滋药的特色之一是膏方用药地道，精益求精，采用上等药材，因此为了使用更好的地道药材以及精湛膏方制作技艺，2011年8月20日下午，致和堂膏滋药制作技艺与东阿阿胶炼制技艺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姻，双非遗双品牌进行合作，为弘扬中医药，服务大众健康又迈出了一大步。

现在，位于江阴市名人馆对面的致和堂，因其百年名药镇店之宝“柳致和堂膏滋药”而闻名遐迩，每天都在上演和传承着国粹中医不老的故事。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国民党要塞司令部旧址文保所)

(上接第 71 页) 禁演徭戏、禁宰耕牛、禁放高利贷公告。会后，各区、乡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利用庙会、演戏等散发传单，宣传共产党政治主张。

3月下旬孙选在江阴砺实中学举办农民讲习所，培训农运骨干。参加者有茅学勤、朱松寿、葛怀德、王曾涛、梅光迪、柳畅如、蒋翼成、范克强、郁祖葆等40人。

4月1日，三甲里农民协会成立，孙选宣布柳畅如任会长。

4月15日，后滕节场，孙选会长和秘书徐江萍参加，后滕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上，秘书徐江萍宣布由茅学勤任会长。

是旬，孙选、蒋名珍、汪善德3人组成“办理周案委员会”，逮捕周水平要犯，查封沙文明等33名地主劣绅财产和对县议员追究法办。

4月16日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阴国民党右派开始“清党”，农民协会被封闭，农民自卫军被解放，农民骨干茅学勤、徐江萍、黄学书、高镜明等被捕。（后被徐鸿英保释，其中徐江萍高镜明与徐鸿英是亲戚）

10月23日孙选在无锡通惠路73号举行秘密会议，不幸被警探包围，与会人员全部被捕，遭严刑拷打，坚贞不屈，11月13日惨遭杀害于无锡南校场，年仅31岁。家中5间草屋被烧毁，其老父亲悲痛惊恐而死。

以上资料参考2011年8月江阴市史志办公室出版的《中共江阴历史大事记》、张家港市瞿涌晨先生提供的资料及2011年内部出版的《江阴市军事志》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市云亭中学原校长  
张家港市金港镇镇政府退休干部)

# 孙逊群（孙选）年谱

撰文/江沙 瞿涌晨

孙逊群（1896—1927）又名孙选，化名王津民，江阴中兴镇（今属张家港市金港镇）人。是中国共产党在江阴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江阴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无锡县委书记。

民国三年（1914）夏毕业于江阴甲种师范讲习所（江阴县立师范前身，校址在南菁中学东积谷仓内），秋季同殷念乔到留彩桥小学任教。

民国四年（1915）春在留彩桥小学执教的孙逊群与同学殷念乔去三甲里育德学堂任教。

是年秋，学生数增至一倍，校舍不足，孙逊群带领学生打碎庵里泥菩萨扩大教室（清除城隍殿、关帝殿、观音殿）。

民国五年（1916）三甲里育德学堂更名为大南乡第二国民小学。校长殷念乔，孙逊群任美术、体育、音乐教师。

是年夏，镇基督讲堂传教士污蔑三甲里屠户蒋某行窃，传教士煽动地方上层人士责罚蒋某，蒋求学校老师。孙逊群不服，在王记茶店里与劣绅辩驳，赢得了官司。

是年秋后，江阴田赋局派人下乡收税，在老新田蒋家用大斗量米，村民不服，请求学校孙逊群老师来评理。此时有一位农民说了句气愤的话，被税警掀了一枪托，孙逊群以此为由，叫大家不缴税，若要收税先要向这位农民赔礼道歉，而且只能用公平秤。收税者被迫顺从孙逊群的意见。农民拍手称快，称他是学校里的“包黑子”（孙是黑皮肤）

民国六年（1917）大南乡第二国民小学增设高小班。学校创作校歌，殷念乔作词，孙逊群谱曲。

民国七年（1918）三甲里蒋星光小学毕业成绩很好，欲上初中，但家里无钱，想向东南学社（资助贫寒学子上学的组织）贷款，但掌握学社大权的财主社董，借口无钱回绝了蒋星光的家长，而另一位七房庄富户吴某反倒贷到了款。这件事惊动了孙逊群老师，他与袁家桥校长徐鸿英、港口小学校长范克强等联名上书江阴县教育局、县政府，经过一番斗争，贫苦子弟也可贷款读初中了。

民国八年（1919）5月4日，北平掀起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6月初大南乡国民第二小学在殷念乔和孙逊群组织下会同袁家桥、占文桥、后门、祖先堂等小学上街游行声援“五四”运动，并宣传抵制日货。

9月上旬孙逊群会同占文桥、袁家桥、港上和巫山小学爱国老师，成立抵制日货稽查队，左臂上戴上红袖章，在凤起亭路口、巫山港口、袁家桥渡、占文桥东横河要道口，检查日货，防止小商贩挑着洋油、洋皂、洋火、洋纱等流入集市，号召百姓：“不做亡国奴，不用东洋货。”

是年冬，孙逊群带领进步青年柳畅如、范克强、蒋翼之、郁祖葆、郁咏堂、瞿尔耆和回乡探亲的刘天华、刘半农在三甲里小学操场上演出活报剧——“活捉螳螂。”

民国九年（1920）农历三月初，孙逊群在君巫路凤起亭和以张家港截得火油59箱，洋纱166卷，洋货、火柴，将其当众烧毁。参加的有占文桥、翁不匡、缪明芝、方国堂、沈彩宝、黄祥郎、陆胖郎、陆尔康、陆掌林、肖一鸣、冯汝福、陈楚书、夏汝郎、王医生、范志强、柳畅如、徐金林等30多人。

民国十一年（1922）袁家桥小学校长徐鸿英，三甲里小学校长殷念乔出钱购得《新青年》和《向导》等进步书籍，以孙逊群为召集人，组织传阅，组成“星光读书社”。

民国十二年（1923）孙逊群将其所在三甲里为总社，西五节桥、猛将堂、护漕港、后塍、袁家桥、占文桥、张家港、王家埭街、仓库桥、石碑等地设分社。进步青年60余人参加读书社这一活动，并排文明戏。

民国十三年（1924）孙逊群等将揭露“同喜社”骗局的署名油印传单在江阴城内和各集镇上张贴。

是年江阴励实中学教师堵铁君、留彩桥小学教师陆尔康、三甲里小学殷念乔、孙逊群成立互济会（实则是青年同志会），是江阴地区最早的互助商业组织（以商业性的互助筹款，来搞革命的文化活动）。

民国十四年（1925）5月孙逊群参加中国共产党，5月16日中共江阴支部在云亭小学建立，后孙选（同月入党时间孙逊群改成此名）。属中共上海地委外埠10个支部之一。

六月共青团中央委员肖楚女来云亭小学会晤孙选，检查部署共青团的组织发展工作。

6月7日，孙选会同江阴各界代表5000人，在城中体育场公祭五卅惨案烈士，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分别进行罢工、罢课、罢市和游行示威。

7月孙选为筹集资金，托徐鸿英、陆尔康到王家埭街、占文桥镇、张家港集市码头开设米行13家，旅馆8家，糟坊11家。以此为掩护地下工作和解决革命工作资金来源，并一举成功。

8月孙选与周水平、徐鸿英、陆尔康等组织“星社”，刊印《星光》旬刊，宣传革命思想，第一期发表了《敬祝世界无产阶级万岁》。周水平拟稿，徐鸿英负责印刷，孙选、陆尔康负责发送。不久与各小学青年校长、教师和医生组成东南乡学界联合会，清理东南乡学社账户并予以公布，深得社会各界赞同。

民国十五年（1926）

3月16日孙选向中共上海区委方面报告《关于江阴之政治、农民、工人教育及学生状况》。

4月中共江阴独立支部在云亭小学成立，孙选任书记。

是月孙选由中共上海区委推荐至广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9月11日结业，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返回江阴组建农民协会，推进农民运动。

12月孙选与陈叔璇、王永根等组建江阴县农民协会，孙选任会长，徐江萍任秘书。

冬，中共上海区委派赵体贤（原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中共党员谢松元，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到江阴与孙选等会和，开展农民运动。

民国十六年（1927）

2月16日，中共江浙区委将无锡、江阴、常州、苏州等地党组织合并组建无锡地委，张佐臣任书记。同时成立江浙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孙选为委员。

是月，孙选以农运骨干为主组成江阴农民自卫军。

是月，孙选指派王家埭街的陈楚书、夏汝郎、冯汝福等到张家港警察所收缴枪支弹药，一举成功。

3月19日孙选领导江阴农民自卫军收缴城区4个警察分驻所及乡镇土豪劣绅的武器，释放狱中无辜群众，驱逐军阀残余势力。

3月23日，江阴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君山大校场召开，孙选任会长。会上以协会名义发布禁止赌博、禁吸鸦片、（下转第69页）

# 浅议江阴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结构及建筑特色

撰文/祝君凯



图一 江阴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平面图



图二 北大街

江阴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江阴古城的北部，东起同兴里、西至闸桥河、南至澄江路、北至光孝后巷，面积约3.69公顷，这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战国春申君黄歇在其附近开凿水利工程“黄田港”以来，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宋代，江阴黄田港就建有市舶司，日本、朝鲜商船时有抵达，清末民初，长江轮船在此设码头。从此，黄田港遂发展成为长江下游地区重要的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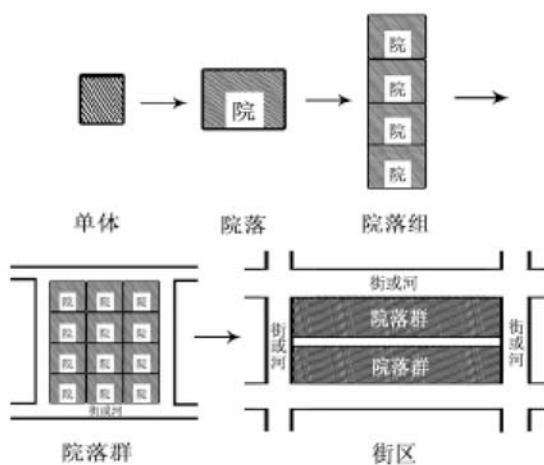
集散地，连接黄田港与城区的北大街，也逐渐成为盛极一时的商业中心（图一）。

## 一、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格局

如今的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原有风貌保存基本完好。街区内光孝坊巷、北大街、君山巷等传统历史街巷，布局完整，脉络清晰。横向呈弧形的北大街与纵向的光孝坊巷、君山巷相互交错，形成两个节点。这种弧形的街道不仅顺应了“街曲则财聚”的说法，而且还打破了直街一眼见底的单调，增强了街景的变化节奏。北大街（图二）全长约300米，宽6米左右，两侧建筑多属江南旧式民居，多个院落空间层层串联，大小不一，形式多样。南侧沿闸桥河而建的民居，也是以河道为走向，形成“水—房—路”前街后河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是人们长期在生活中适应自然所产生的结果。

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构成空间可以分为五个等级——单体，院落，院落组，院落群，街区。“单体”即“间”，是构成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最基本的单位。无论是住宅、商店还是寺院皆由其构成，“间”在进深和开间上可以发生变化，但矩形的空间模式一般不会发生改变。院落：由单体“间”经过转换组合而成，一般“间”旋转90°后，形成“厢”空间，“间”与“厢”围合形成“院落”。院落组：当宅院空间不足以满足人们生活和功能的需求时，便采用宅院按轴线纵向套接的方式形成“院落组”。院落群：由多个“院落组”平行构成，一

般其前后为街空间,左右为巷空间。街区:由多个“院落群”构成,当其组成区域达到一定范围以后就形成“街区”。例如整个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就是由光孝坊、北大街、同兴里、缪家场等几个“院落群”组合构成的。它通过以“院落群”为代表的“块面”空间,以街、巷为代表的“线”型空间和以古井、水埠、街巷节点等独立“单体”为代表的“点”状空间。“点”、“线”、“面”这三种形态空间,通过由小到大的有机组合,在平面上不断向四周延伸,最后形成一个整体。同时,每个空间元素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依附和被依附关系(图三)。



图三 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构成

## 二、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建筑院落的平面布局

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建筑院落布局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 1、“一落多进”的择中型布局

“一落多进”中的“落”通常是指由单数“间”横向连成的建筑单体,“进”则是纵向串联的数量。这种多进沿纵深对称的串联布置方式,是我国传统庭院式组群中最基本的布局方式之一。每个组合纵向排列,多进组合叠加形成院落组。在每进建筑的中间都留有一个独立的天井,以利于天然采光和通风。例如:同兴里17号、同兴里29号都采用了“一落多进”对称式的平面布局。同兴里17号为三间两进,同兴里29号为三间三进,在每进之间都有一天井,用以通风采光。

### 2、“三间两厢”的天井式布局

“三间两厢”又称“三合天井院”,即在三开间正房的两次间前加对称的、面向天井院的两厢房,形成“三合天井院”,俗称“三间两厢”。正房对面为围墙或前座院落的后墙,形成三面有建筑,一面为墙体围合的天井院落,具有较强的内聚性。如果从空中鸟瞰,好像一颗方印。所以,又被戏谑地叫做“一颗印”。这种院落形式是组成江南传统民居建筑中最普遍的院落形式。如北大街117号和同兴里10号的第三进都采用了“三间两厢”式的平面布局,特别是同兴里10号,它不仅在第三进采用了“三间两厢”式的平面布局,而且还将前两进相结合,组合成为“一落多进”式的对称平面布局(图四)。



图四 北大街同兴里

### 3、自然型不规则布局

民居在建造过程中经常会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制约和限制,许多自然的、人为的因素都可能使建筑无法采用十分对称、规整的平面布局<sup>①</sup>。

## 三、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结构特点

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古建筑大都建于清代,一般采用“前店后坊”式的建筑格局,这些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的建筑与街面相结合,形成一道独特的空间景观。据资料记载,以前江阴北大街和北外同兴里民居多建有石库门、封火墙。一些家底较为殷实的人家住宅大抵为平房二至四进,每进三至五间。第一进通常较为一般,屋檐高九尺,黑漆大门,门前有台阶数级;第二进为正



图五 砖石混砌墙



图六 砖瓦垒砌的镂空墙



图七 山墙上的铁扒锔

厅，敞三间，这里是主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内部装饰和陈设都十分讲究，非常气派；第三进通常为卧室<sup>②</sup>。

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古建筑大都采用穿斗式和抬梁式相结合的梁架结构形式。这是一套简洁而又合理的建造技术，它把穿斗式构架体系和抬梁式构架体系的优点有机的结合起来，互为补充。因穿斗式木构架用料小，整体性强，但柱

子排列密，只有当室内空间尺度不大时才能使用，将每一根柱子都落到地上，进一步增强了房屋的整体抗震性能。而抬梁式木构架采用跨度较大的梁，这样就可以减少柱子的数量，取得室内较大的空间。建造时一般先从地面立起木柱，在柱子上架设横向的梁枋，再在这些梁枋上铺设屋顶，所有房屋顶部的重量都由梁枋传到柱子上，再经柱子传到地面，所以整个屋顶重量完全由屋架承担，而柱子之间的墙壁只起到填充作用，不起结构性的承重作用。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古建筑厅堂“正贴”一般采用抬梁式做法，前单步，后双步，在前后两“金柱”间用“五架梁”，其上立一对“童柱”承“三架梁”，其上再立“脊瓜柱”，“瓜柱”圆形，上细下粗，而“边贴”大都采用穿斗式或“中柱”落地的做法，以柱子直接承檩，外围用砖或石块砌筑（图五）。底部50公分为“实砌墙”，其上是“空斗墙”，墙面粉刷白色。部分建筑的外围院墙上还用砖瓦垒砌成镂空墙（图六）。有些民居在山墙和每根山柱之间施两到三个“铁扒锔”（图七），使墙柱牢固结合在一起，具有良好的抗震作用。这里的古建筑屋顶一般多为硬山式。檩上架椽，椽上铺“望砖”盖灰瓦或芦席上抹泥盖灰瓦，灰瓦一般做成“阴阳合瓦”式，即以同样大小的青瓦分别作“底瓦”与“盖瓦”。室内地面铺青砖，起到防潮的作用。房屋内檐与室内因使用目的的不同，分别用隔扇门窗、板壁自由分隔，窗格图案以“亚字”、“海棠”、“冰纹”为多。

北大街两侧古建筑的大门极少向正南开启，这有多种原因。中国古代人造房，必须先看方向的利与不利，然后择定吉日方能动土。不论宅基地如何千差万别，住宅的主体必须朝着吉方，而宅的主体朝向，体现在大门的朝向上。因此，门的朝向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因为门通出入，是“气”口，风水学上最为讲究的便是“气”，这里的古建筑大门极少向正南开启，这正是受风水观念的强大制约。偶尔有些民居受到宅基地的局限，不得不朝南开设大门时，主人也要让它向西或向东偏一偏。对于这种现象有多种说法，有来自于

制度、风水、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从封建制度角度来看，在封建社会中许多事物都有尊卑之分，连区分方向的东南西北也不例外，古代把南向称为至尊，宫殿庙宇可以朝正南、帝王宝座也是坐北朝南，叫作“南面称孤”。正因为南向如此尊荣，所以民间造房，谁也不敢取子午线的正南方向开设大门，都得偏西偏东，免得犯讳而获罪<sup>③</sup>。

街区内有些建筑墙院的左侧还设有一个边门，这就是备弄的入口。备弄又称“夹弄”或“避弄”，也有叫“陪弄”。弄堂狭长，宽度最多为1米，狭窄处不足0.8米。从入门第一进一直贯穿到最后一进院落，高耸的垣墙夹着曲折的街巷，形成曲径通幽之感，尽管弄堂狭长幽暗，但通风很好，举步其中，如入迷宫。以前大户人家除了逢年过节等重要日子走正门外，平常一般不走正门，都走备弄，因此每进房屋都有一侧门与备弄相通。人来客往或私情密事皆由备弄出入，大家互不干扰。备弄的另一作用是将建筑群之间相互隔离，使之形成各自独立的单位，以防止房屋不慎失火后的火势蔓延，起到了防火的作用。直到解放后房改，住户情况发生变迁，一户大宅变成几户人家居住，备弄因此成为宅内住户的公共通道（图八）。

#### 四、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内的代表性建筑

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内存有两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一些文物控保点。钱土纱业公所、武庙和北大街79号就是该地区众多古建筑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钱土纱业公所于2008年由政府通过房产权置换的方式收归国有后出资维修。北大街79号是由私人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修缮，堪称江阴多元化方式保护古建筑的又一成功实例。

钱土纱业公所始建于清代，重建于民国，是一座融合了三合院布局、传统式梁柱结构和西方装饰的二层楼房。该建筑座西朝东，面阔五间外带两侧厢楼，硬山顶，砖木结构。廊有翻轩，枋下柱间施挂落，方木柱，正方磉石上立方形石鼓墩为础。门窗上均有雕花，建有石库门（图九）。建筑



图八 备弄



图九 石库门

面积302平方米，土地面积168.6平方米。钱土纱业公所是江阴市区域内现存为数不多的工商遗产。清末民初一批有识之士在江阴创办实

业，公所就是由三个老板合伙开设的经营纱、鸦片、盐等商品的场所。当时他们看中了黄田港独特的水路优势，沿河建设了这一公所，禁烟令公布后，改称“钱纱”公所。日军占领江阴期间，为侦缉队员居住。解放后李涤生在此开设了综合医院诊所。建国后房产收归国有，一直作为民居。2008年底澄江街道通过房产权置换，对房屋进行维修。2009年被江阴市政府公布为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图十)。



图十 钱土纱业公所

武庙始建于光绪六年，坐南朝北，为当时驻江阴水师祭祀历代武人名将之地。平时为水师办公之所，冬防时又为水陆会哨之处。现存大门、正殿、配殿及东庑，建筑面积298平方米，占地面积400平方米。硬山顶，斗拱飞檐，正殿为抬梁式，面阔五间，约18.25米，进深七檩，高5.80米。1992年9月公布为江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大街79号建于清代，原为祠堂，后由陆士清先生出资购得，并按原样进行维修。该楼为砖木结构，大门朝东，共有三间两层，带有一天井，雕花窗，枋下柱间施挂落，正方磉石上立圆形石鼓墩为础，室内用板壁做隔断(图十一)。



图十一 北大街 79 号

### 五、结语

江阴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不仅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信息资源，更是江阴社会历史经济发展的见证物。作为乡土文化的载体，它为人们提供了观赏和科考的价值，同时还唤起人们对历史和乡土文化的热爱，是研究江阴地方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随着“八里沿江、十里运河”、“滨江花园城市”等开发建设的不断推进，江阴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将借助这一发展的大好时机，结合自身特点，打造出一个新的文人景观。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这颗明珠一定会如凤凰一样浴火重生，继续其历史的辉煌。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博物馆陈列宣教部主管)

### 注释：

- ①章大为：无锡传统民居的现状与特色，第13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暨无锡传统建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
- ②沈俊鸿：江阴风情民俗，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 ③沈嘉允：江南大宅南浔遗韵，浙江摄影出版社，2006年。

# 古刹钟声·悟空寺

撰文/贡金城

今青阳镇悟空村有座六朝古刹悟空寺，宋时建有泗州大圣舍利塔，2003年考古发掘地宫完好无损，僧伽舍利依旧晶莹灵动，实为至宝。天圣初著名书法家蔡襄在此闭门读书，临别之时题诗留念，这是墨宝。皆足以书，以留后世。

## 一、六朝古刹鸟空啼

明嘉靖《江阴县志》云：“悟空寺，梁吴才舍宅建为招隐院，南唐保大间重建钟楼，宋太平兴国五年赐今额。”这座六朝古刹距今已近一千五百年了，虽然是由富民住宅改建而成，却是钟楼殿阁，一应俱全，足见梁武帝建立江阴郡之时，江阴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人心向善，一片繁荣和谐。到了五代南唐之时，中主李璟接位之后称为保大元年(943)，到了公元958年，降于后周，废除保大年号，并自称国主，所以“南唐保大间”相当于公元944到958年。这期间重建了钟楼。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朝廷下令改称悟空寺。真宗景德三年(1006)，僧人应云与行者沈惟素募建泗州大圣舍利塔。仁宗天圣初(1023-1032)蔡襄寄寓悟空寺读书迎考。临行题诗壁间，《久寓悟空刹，行而书之》。

元末，本寺兵废。明洪武十三年(1380)重建，隆庆间(1567~1572)重修。清嘉庆七年(1802)再修，薛梦魁撰《重修悟空寺碑记》，云：“东控三十三山半之香山，西引万兵千顷湖水。”还说“悟空塔影”是青阳八景之一。道光八年(1828)大火，殿门俱毁，次年重建。咸丰兵灾(1860)，寺废塔毁。

民国十三年(1924)，大圣塔完全坍倒，仅剩塔基。十六年，曾用废屋创设江阴县立悟空师范学堂。

在《宋志全境》上，江阴军东南有个凤戈乡，乡有悟空寺与华塘塔。乡领三个都，悟空村属于十九都。其时凤戈村十九都与青旸乡隔河相望。到了清代，悟空村改属青旸镇，今称青阳镇。其地甚古，悟空村有三国孙吴大将凌统之墓，东有锡澄之间的古驿道，西有南楼遗址。

清代和民国期间，寺前广场上有节场，每年四月初八，热闹非常，尤其是种鸡生意，最为兴隆。

## 二、泗州大圣舍利塔

泗州大圣又称僧伽大师，唐时西域人，地在碎叶河畔，今为吉尔吉斯国地。高宗之时僧徒岸木叉、俨惠等来大唐宏扬佛法，曾到长安、洛阳等地行化，后来经常在吴楚间，手执杨枝、锡杖，身披袈裟，到处募缘。人们问道：“大师何姓？”答曰：“我姓何。”问道：“大师何国人氏？”答曰：“我是何国人。”到了泗州(今盱眙县，而州城已沉入洪泽湖底)后，发愿募建佛寺一座，就有居士货跋舍宅建寺。大师却说：“此处本是佛寺，如若不信，掘地便知。”果然不错，竟而掘得香积寺碑一座和然灯如来金佛像一尊，为齐朝(479~501)李龙建所创建。大师则说，此金佛是普光王也，于是新建寺名普光王寺。

景龙元年(707)，中宗请大师入京，亲笔御书“普光王”三字于其驻锡之地，因为祈雨有灵异，

赐号“普照觉明大师”。景龙四年(710)三月二日，圆寂于长安荐福寺。皇帝下旨就地塑像建塔，但是忽闻秽气满城，皇帝就在像前，许他魂归泗州。说也稀奇，随即不但秽气全无，而且香气满城，于是派灵輿将大师肉身恭送回泗州普光王寺。中宗怀念大师，问道：“僧伽何人？”答曰：“观音菩萨化身也。”因而人们就称之为泗州大圣。僖宗时，还曾以骨塑像，并赐谥“真相”。

唐时，将临淮郡地的西部分置泗州，治于盱眙县。德宗贞元间（785~804）和穆宗长庆二年（822）二度被灾，因而寺废塔毁，但是“惟伽遗形，俨如无损”。

常州一带，对大圣甚为敬重。唐时，大师曾经驻锡于州东二里处的国祥寺，见殿宇破旧，行将毁坏，就将所穿内衣留于梁上，自行他处化度，以后此衣常有异香。日久寺毁，到了五代南唐保大间(943~958)，在天宁寺建造了一座普照王塔以珍藏僧伽衲衣。另外，在常州所属的无锡县也有两处六朝古刹有僧伽古迹。普宁禅院为僧伽留笠之所，南禅寺有僧伽留锡塔，这便是妙光塔。

常州天宁寺附近，另有一所六朝古刹建元院，据说是齐高帝所创，唐代已成巨刹，宋改名为太平兴国禅寺。在宋太宗景德三年(1006)，其寺僧善聰，获得僧伽舍利子以后，转赠江阴军悟空寺，由僧应云和行者沈惟素募建宝塔“以充供养”。宝塔为八角形，下建地宫石室，并由银瓶盛贮舍利子。善聰亲自监察督建，并在石函盖板上刻有铭文如下：

“常州太平兴国寺僧善聰，伏睹江阴军江阴县悟空院僧应云，同行者沈惟素，募缘四众建造泗州大圣宝塔。以善聰收得众舍利，特制石函、银瓶盛贮，安藏于塔下，永充供养。大宋景德三年岁次丙午，正月日记。”

其中，“募缘四众”，指佛家所说的发起众、当机众、影响众和结缘众，合称四众。意即由悟空寺僧应云，以及行者沈惟素向四众募缘建成此舍利宝塔。

公元2003年冬，由南京博物院与江阴博物馆

联合发掘了悟空寺塔的地宫，获得了丰富而且保存完好的大圣遗物。如附图所示，有塔基、石匣、铭文、银瓶、瓷钵、舍利子，金指、银龙、水晶球等物，件件皆珍。特别是数十颗舍利，七彩晶莹、光亮圆润，宛如新珠，实属珍宝。（图片见《江阴文博》2004/1，封一、封二、封四）

### 三、蔡襄留题悟空院

北宋著名书法家蔡襄，字君谟，原籍福建泉州仙游，天圣八年(1030)进士，年仅十九岁。历官馆阁校勘、谏官、知制诰权知开封府、以端明殿大学士知杭州。卒谥忠惠，著有《蔡忠惠集》和《茶录》、《荔枝谱》等书。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合称“苏黄米蔡四大家”。东坡誉之为“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其草书龙飞凤舞，可爱而不可学，被称为“飞白”。写汉代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则清壮顿挫，有闺房之雅，米芾称其犹如绰约少女。其楷书却又端劲高古，被誉为“书中之龙”。如《万安桥记》，雄伟遒劲，与桥争胜。为欧阳修所撰《相州昼锦堂记》，更是精美绝伦，犹如“百衲碑”。其书风之严谨，功夫之深厚，尤足称道。因为每一个字他要写上数十遍，直到自觉满意为止。但又不逢迎权贵，风格极高。所以他的留题《久寓悟空古刹，行而书之》，实为墨宝。诗云：

寂寂精庐切半空，古原高下稻花中。  
莲趺披素轻云梵，花萼雕红细雨宫。  
孤鹤睡迷千树月，断蝉吟绕五更风。  
心靡尺组遥相谢，归马南蹄疾似蓬。

天圣初年，青春年少的诗人寄居在悟空寺埋头攻读，以图仕进。住了多时，考试在即，急欲赶回福建泉州府仙游老家参加解试(考举人)，临别之际，在壁上留下了这首诗。第一、二句描述读书精庐的位置，第三、四句写佛寺，第五、六句写环境，第七、八句写当时的心境。“寂寂精庐切半空”，原来诗人就在新建的宝塔中读书，寂静极了，确是读书好地方。“古原高下稻花中”，六朝以来，江阴城南，芙蓉湖之北的原野，始终是稻花芬芳，鼓励着士子勤学苦练。多年来心系仕途，科考

在即,不得不告辞精庐,快马加鞭,回乡应试。借此机会,题诗致谢,以表寸心。

诗人官运亨通,中举、进士,当京官。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他的堂房妻舅葛密的耳朵里。葛密到寺内一看,蔡襄留题还在,而且还用碧纱笼罩着,加以保护。并且嘱咐葛密,请代向蔡襄致意,欢迎再来游赏。因而葛密写了一首七绝,寄给蔡襄。诗云:“昔年诗板著禅宫,笔力遒劲墨采丰。不日三阶平国政,空僧留待碧纱笼。”蔡襄则回赠诗《复葛通议·并序》。蔡襄另有诗《五月宿江阴军葛公绰草堂》。

葛密之子书思,有诗《宿悟空院》,诗云:“高枕僧房夜漏深,经窗俄见月华浸。抗尘走俗成何事,问道参禅徒在心。智镜直须真里照,机锋莫向句中寻。悟空不见悟空者,漫对寒灯拥鼻吟。”书思是宋时有名的孝子,谥曰清孝,在江阴军学宫和青旸乡都建有专祠,称清孝公祠。书思进士以后调任建德县主簿,因为其父曾经蒙受冤狱,就请求辞官回里奉养父亲,达十余年。父逝以后,又在家丁忧多年,方才再去做官,所以官阶不高,但是孝名很大。由于在家时间较多,所以对佛学颇有钻研。

元代江阴布衣诗人缪鉴,字君宝,号苔石,有诗《题悟空寺》,“不到招提二十霜,眼明还识鲁灵光。云餐已供伊浦塞,风铎犹传替戾冈。新寺金汤化远,旧家王谢燕飞忙。行人指点簪犀地,十里春风土尚香。”诗人著有《效颦集》,陆文圭为之跋,说道:“澄江自有苔石,始有诗人。”

#### 四、青旸葛氏善缘深

俗话说:“积善之家有余庆”,青旸葛氏不仅是诗书传家,江阴科举第一,而且还是信佛从善,积德之家。不仅借精舍作为读书之处,也从高僧经楼参研佛学,广结善缘。

葛密之兄葛官,比蔡襄还早十八年进士,官至太子宾客、工部侍郎,著有《青阳集》,有诗《赠倚公大师》。诗云:

多年乞食王城往,杖锡今日旧隐村。  
千古有名笺御集,一生披紫异常恩。  
影堂拂曙炉烟袅,经阁祛尘篆字昏。  
济济生徒同听法,天花飘落道弥尊。

倚公是谁,虽然无考,然而诗人分明指出,这是一位昔日云游四方,今日归隐古寺,曾得皇家御赏,身披紫袈的高僧。佛堂、经阁,香烟缭绕,济济生徒,聆听佛法,香花四散,吾道惟尊。

葛官之妻孙四娘子,笃信佛教,在其墓中竟有十一部佛经,诸如《佛说观世音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金光明经》、《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等,装帧精美,保存完好。其中观音经和金刚经都是葛官之叔祖葛诱以巨资雕版印发并广泛施舍的。其中观音经一藏,竟有五千零四十八卷。时年七十二岁,印发大量佛经,以求广结善缘,消灾灭病,延年益寿。经末注明“将仕郎试江阴军助教葛诱雕版印刷。大中祥符六年癸丑岁九月日记。”这位从九品衔的教授厅学官的职务是试用助教,也是一位虔诚的信心弟子。

**江阴文博**

(作者:上海电力学院退休副教授)

# 漫话夏港万安桥

撰文/陆云湘



新万安桥 (金晓峰 摄)

今年,笔者先后四次赴夏港镇参观修缮后的万安桥和景区内的各个景点,踏勘古桥石级并民间走访寻问,拜访了文化服务中心袁主任,喜获夏港的“三亲”史料《夏港记忆》一书和《万安桥重修碑记》、《孝子牌坊重修记》打印资料,弄清了吴孝子牌坊始建地点和迁移过程。根据实地考察、走访所闻、史料记载,整理成本文,对夏港万安桥作一粗略概述。

## 一、万安桥始建年代与历经沧桑

万安桥,又名延陵桥,也俗称夏港桥。该桥座落在夏港镇老街古道的东首,东西走向,横跨在南北走向的夏港河上,这座桥始建于南宋绍定元年戊子(1228),为知县林庚所建,曾被江洪冲毁;明永乐三年乙酉(1405),分贤周道通复建木桥,亦被江洪所毁;直至明隆庆庚年(1570),分贤吴宏学辈改建石桥,因资金匮乏倡捐筹资,于是年八月动工,历两年终成。县令刘守泰题名“延陵

桥”。因桥原为古石,易为天候风化,力求稳固,清顺治十四年丁酉(1617),由乡贤缪宏倡捐,易石大修,改成三孔石拱桥,桥身系花冈岩铺砌而成,为冀“万事安涌”定名“万安桥”。道光二十八年,乡贤吴凌云、朱显扬捐款复修,更换受损之石桥,石栏,并刻石纪念。

自此,桥镇江洪,桥面东西,乡民方便,然而时至日寇侵华,灾及夏港,丁酉桥栏被毁。五年后,保袒康、匡跃文发起重修,将桥拱立面石栏(亦称望柱),以砖重砌,并勒二人姓名于栏柱而置栏板中央以纪,“文革”中,为愚人所凿。

该桥因年久失修,拱券变形,桥体松动,有的面石移位,不时有倾斜倒塌的危险。桥的东西两孔,垃圾堆积,渐为陆地,游民不时栖居。据文物管理部门勘测,桥长50.7米,中孔跨径12.8,高7.6米,顶宽4.5米,桥左右石柱,又称拱柱,也称望柱,计24根,石阶共82级,其中东坡38级,西坡44级,该桥1978年9月公布江阴县级文保单位。

2011年经夏港街道办公室党政部门研究,为改善社区生态环境,提高文明品味,把修缮万安桥,并开放人文景观,拓宽夏港河,加砌河岸石驳为重点,投资1亿多元。主要工程项目:其一,古桥修缮,原则上修旧如旧,保持原貌;桥面石级按两岸地平设置,东坡保持三十八级,西坡减缩一级,为四十三级,桥面左右拱板,按原样维修,桥头增建莲花望柱;桥面中央左右拱柱上原刻字样,拓印重锡;桥下拱券石,石块均要补全,各个环节不得走样。其二,拓宽河道,建造驳石,该港全程三

里有余,北至长江港口。南至璜塘河畔,为使两岸的稳固性和长久性,加砌石。古桥近处南至澄常公路大桥,北至相等的距离建一座仿古石拱桥,以此作为景区的河岸段,建石驳加沿柱,设行人通道,西岸并建错落有致的水上观看平台。东岸建水上长廊、亭阁、并植紫竹观赏带。其三,古桥东首设广场,原孝子牌坊移位,并加保存;新建一座仿造孝子牌坊、新建民间传说“弃官寻母”、“卖身葬父”等大型砖雕壁廊。另外还建一座大型碑刻,正面刻有《夏港万安桥重修记》,反面刻有《重修吴孝子牌坊记》。署名江阴市夏港街道办事处立。

如今,万安桥景区建设项目即将全部就绪,万安桥桥体依然线条分明、风格如旧,堪称旧貌新姿。该桥为全市始建年代较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大型石拱桥。

## 二、万安桥与吴孝子牌坊

万安桥东端约三米有余,竖立着一座孝子牌坊,该坊为石质,年代久远。据明代嘉靖年间县志载:吴孝子叫吴凤,是明代皇帝敕封的孝子。吴凤是个文盲,以卖糖果杂物为生,早上吴凤出大钱卖饼,不用卖者找零,揣在怀里,急速而归,问其原因,吴凤回答:“饼要热的给母亲吃,这样做很习惯了”。另有一天他在卖杂物,一个小青年寻衅作恶,强行抢夺他的杂物,吴凤不与他计较。当场有人讽刺他没有用,太懦弱了,吴凤却说:“假如我与他计较,必然引起争吵,争吵中也必然骂到我父母,我不因这件事使父母被人家骂”。后来母亲因病去世,吴凤给母亲买了白身棺材,还借了钱为母亲买了寿服,将母亲入殓安葬。吴凤靠起早贪黑给人家当佣工偿还借款。母亲安葬后,已过做“七”的时日,吴凤还在墓前放上洗脸用的盆和布,再进饼,跪拜,请母亲进食,就像母亲平时在家里一样,因为母亲生前有个习惯,不洗脸时不吃饭的。吴凤还砍了树枝做房,居住在墓前守护,凄惨号哭,整整十二年。当地人把吴凤的这样事迹报告官方,经核查后,上报朝廷,朝廷发诏

书,旌表吴凤为孝子。吴凤死后,在他墓前建了一座孝子牌坊,同时还安放了一块下马石,并有皇上所书的“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字迹。

这座牌坊“文革”中差一点被破坏掉。原来的图像,上面是大禹治水,下层是二龙戏珠、鲤鱼跳龙门,中间一层“旌表吴孝子复顺化乡”的字样,如今将原坊移至桥对直偏南,方向向北,以示原物保护,2003年列为市级文保单位。同时又在万安桥桥头附近重新建了一座孝子牌坊,中间的字样尚未复原,古桥和牌坊均以新碑铭文。

## 三、万安桥与近代名人吴文藻

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1901年出生于江阴夏港万安桥东首偏南约300米夏东的一隅。他自幼懂事,理解他父亲的心愿,经常由父母带领他踏级登桥,放眼晴空,开阔他的胸怀。5岁时在本乡受启蒙教育,几乎天天要走过万安桥,稍长以后就读于江阴学府南菁书院。1917年赴美留学,进入学院社会系,获得博士学位,尚未公布学位时他就回到祖国,后来成为我国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奠基人,中国著名的“吴文藻人类学奖”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我国著名的学者费孝通、林耀华等均曾师从吴文藻先生。它是我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中国化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与冰心结缘相爱,开始于1923年2月8日,两人同去赴美留学乘坐远洋油轮“约克逊”号船上相逢,从而拉开了他们俩交往的序幕。1929年吴文藻回家,得到冰心父母同意,两人在北京(今北大)的临湖轩举行婚礼,同年暑假他俩由北京回江阴省亲,家人按江南水乡的习俗亦为他们举行隆重的婚礼,今洞房依存,修缮后即为吴文藻与冰心的故居,又作为纪念馆。

冰心曾为建造好的夏港文化中心题词,亦曾为江阴刘氏三兄弟故居修缮开放撰写专题文章。吴文藻夫妇均具有海外留学赤子情怀和为国家复兴繁荣敬业奉献精神,他们的辉煌业绩,必将永远激励着家乡人民。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原文化局文化科科长)

# 江阴姓氏源流考略(+)

撰文/刁文伟

## 孙 氏

孙姓的来源有些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其一为“妫”姓说,是舜的后代,西周初分封时周武王将长女嫁给了舜的后代妫满,分封到河南淮阳一带,建立了陈国,因此妫满又称陈胡公,是陈姓的鼻祖。由陈胡公开始,经十代的传承,陈国发生了内乱,公子陈完逃至齐国避难,改姓田,称田完,田完五世孙田书在伐莒国战役中立下战功,被齐景公封至乐安并赐姓孙氏。这支孙氏与陈、田两姓同源。其二为“姬”姓说,是黄帝的后代,传至周文王时,周文王第八子卫康叔建立卫国传八世为卫武公姬和,那时已进入春秋的纪年,西周已灭亡,卫武公子姬惠孙,惠孙之子姬耳。姬耳之子姬乙,字武仲,由他开始以祖父的字为姓,这就是姬姓孙氏的来源。其三为“芈”姓说,同样出自黄帝后裔。芈姓为先周时期南方楚国的国姓,薳茹敖(字孙叔)任楚国令尹时,为一代名相,其子从父字为氏称孙氏,孙叔敖成为这支孙姓的始祖。此外孙姓还另有多种源头:如荀子后人;比干之后;夏侯婴之后;以及少数民族中的孙姓、赐姓和改姓等,在此不再赘述了。笔者翻阅诸多孙氏宗谱,宗谱中对孙姓的来源也是着重介绍所归纳的三方面,其它也只是一笔带过。江阴的孙姓人口,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为总数在1-2万之间,下面就江阴现在所了解的孙氏各支作一下梳理和解读:

### 一.澄江孙氏

澄江孙氏有三支,源头也各不相同。

1.《澄江孙氏宗谱》四卷,首末各一卷,上海图书馆藏,清·咸丰六年(1856)木活字本,4册,孙有谷纂修。书签题:“孙氏族谱”,堂号为“富春堂”。始迁祖孙湘,明季避兵乱由镇江迁江阴。由于原谱笔者无法查阅,故该支孙氏的具体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但从其宗谱的规模来看,规模不是很大,地域性极强,暂且称之为“澄江湘派孙氏”。

2.《澄江孙氏宗谱》六卷,江阴九如堂藏(照片)



《澄江孙氏宗谱》扉页

一),民国十年(1921)木活字本,3册,孙茂才等纂修。书签题:“孙氏宗谱”,堂号为“富春堂”。始祖为常州探花孙慎行,本籍为武进阳湖,明万历年期间其长子仕元迁居至江阴大岸村(今璜土乡西贯行政村)。家谱序言为金武祥所撰,其序言曰:“……始迁祖及今垂三百余年,欲建立支祠并修支谱,以丁稀费绌议而未果。迨经咸丰庚申兵燹,族人流离失所,迄今五十余年……”。这支孙氏迁至江阴至今已有四百年了。但此前从未修过祠堂,修过家谱,又经战乱,因此人口规模不是很大,地域性很强,暂称之为“澄江大岸孙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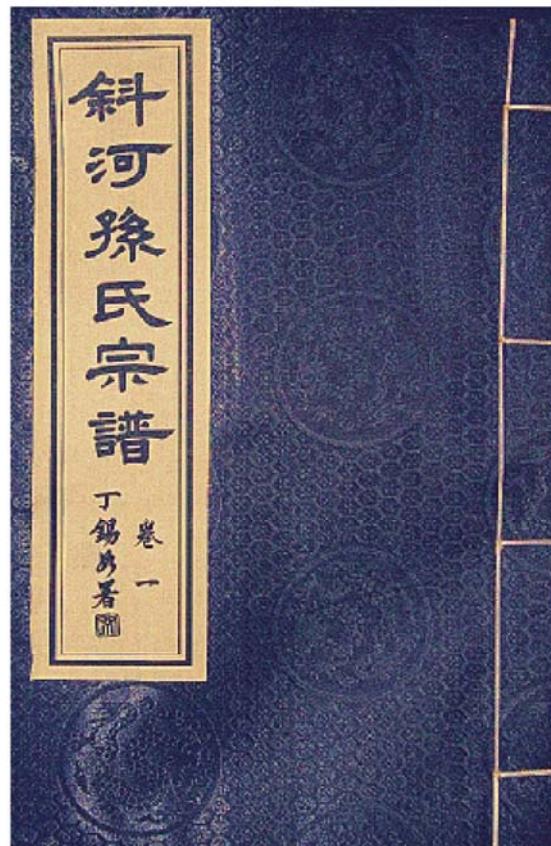
3.《澄江孙氏宗谱》二十卷,首末各一卷,民国三十三年(1944)木活字本,22册,孙芝南、孙培元主修。版心题“孙氏宗谱”,堂号为“馀庆堂”,为六修本。始迁祖孙千一,祖孙德(字庆三)、孙子林(字祖林),元代人。谱内录有孙中山像及中山纪念塔图等。本谱的收藏者为浙江慈溪的一位谱牒学者,笔者也没能目睹家谱真容,因此其源流情况也不得详知,暂且称之为“澄江千一派孙氏”。从家谱的卷数以及六修本这些信息来分析。这支孙姓已经规模很大,分布的区域也很广泛了。但令人费解的是,这套家谱为何本地不见,各大图书馆也不见,却出现在浙江慈溪的个人收藏家手中呢?

## 二.斜河孙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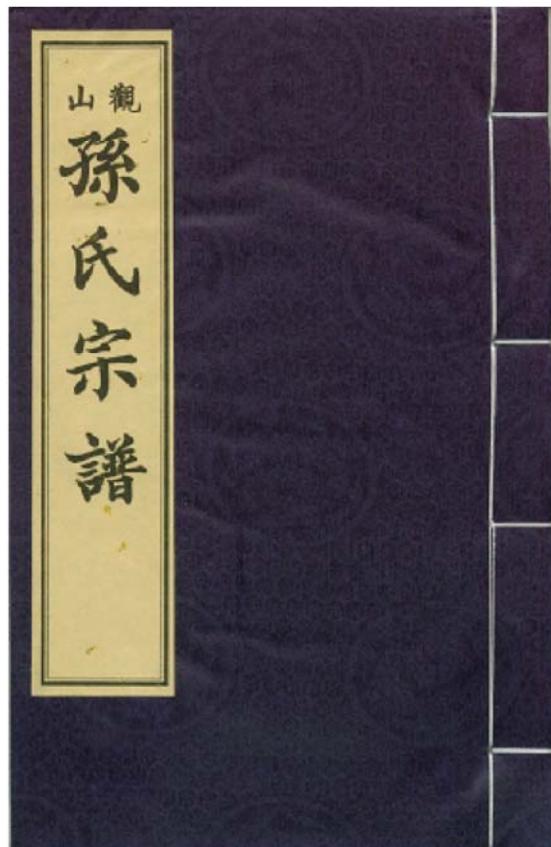
家谱有:《斜河孙氏宗谱》十四卷,14册,清·光绪六年(1880)木活字本,题签、版心等俱为“孙氏宗谱”,堂号“世德堂”,孙双喜主修,上海图书馆藏。

另上海图书馆还藏有该谱的民国五年(1916)木活字本,十六卷,16册,孙春荣、孙全春纂修。

斜河孙氏于2011年新修了家谱,二十卷,20册,孙汝鸿主编(照片二),江阴博物馆藏。斜河孙氏始祖孙万登,字朝元,号慎斋,晚唐时期人。其十二世孙孙吴会,南宋理宗时知常州,十九世孙孙椿,字企涛,号知山,明初移居江阴四河镇南斜河,为始迁祖,又江阴璜塘镇、太宁乡横塘二支,



新修《斜河孙氏宗谱》封面



新修《观山孙氏宗谱》封面

与斜河同出一祖，因此也兼录该二支世系图表。

上海图书馆藏有民国十六年(1927)《新安孙氏江苏统谱》，现存三十二册，孙启泰等纂修，堂号为“伦叙堂”，始祖、始迁祖与斜河孙氏一致，是南宋末知常州的孙吴会在常熟、无锡、江阴等地的分支，因此江阴斜河孙氏可归入新安系中。

### 三.沙州孙氏

家谱有：《沙州孙氏宗谱》十六卷，16册，清·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孙朝勇、孙鹤年主修，版心、书签题“沙州孙氏宗谱”，堂号为“积善堂”，常熟图书馆、山西家谱藏。另常熟图书馆还收藏有该谱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刻本，十八卷，18册，孙登瀛、孙鼎燮纂修。始迁祖为孙世孝，字诵莪，排行第二，明代人。是族为江南大姓，后裔散居苏锡常等地。由于该谱资料也尚未公开，源流情况尚不清楚，从家谱规模来看，应该分布较为广泛，人口也较多了。

### 四.观山孙氏

家谱有：《观山孙氏宗谱》(照片三)，2008年新修本，十卷、10册，宗谱主管：孙友根，堂号为“穀贻堂”，江阴图书馆、博物馆皆有收藏。其民国二十四年的序言中对其源流作了详细的说明，“……景公赐其姓曰‘孙’，食采乐安所谓有‘妫’之后……万登世居青州……率妻子移家黎阳，为唐田第一世开基之祖，越十一传吴会公随父玠渡淮住霍山……登宋端平乙未进士……升任常州知府，子规复荫授将士郎，淳佑己酉以父职往继常州，守遂从宦为家而奠居焉。越三传善持公于元末又自常郡迁居江阴城西十里许之环同桥创基立业……以姓传名其里曰‘孙家街’，且以公为始祖……自元而来六百余载，盖二十一传矣。其族分为五房，每房又分前后共计十房……而十房中又有徙居双桥，南闸及施袁场、南邵村、小孙村等处，其丁口之繁不亚于五百余人之数……”，序言为1935年时所纂，距今又已经七八十年了，这支孙姓迁入江阴为元末、至今有七百年的历史，人口也肯定增加了许多，分布的区域应该在今夏港孙家街、南闸、月城等地。

### 五.百丈孙氏

家谱有：《百丈孙氏宗谱》民国三十六年(1947)版本，现仅存六卷，藏于华士三余巷村。

这支孙氏的源流情况为“世祖君正，字端士，居马镇西洋百丈里。君正第十世云彩，字存仁，迁华墅西泰清桥孙家基(今华西村)，云彩子三：锡范、锡凤、锡龙。锡凤迁青

龙桥吴家基(今俭益村)；锡龙子定开，迁三余巷鞠家庄。云彩堂弟云青子三：延锡、延标、延佐；延标迁居华墅萝卜桥(今华中村)。境内百丈孙氏后裔今传至第25世”。近日百丈孙氏举行了新谱发谱仪式，这让笔者有了进一步了解的机会，新家谱为：《文林百丈孙氏宗谱》(照片四)，二十一册24本，堂号为“敦睦堂”，主编：孙林民，2012年新修本，江阴博物馆藏。其序言曰“万登公十二世吴会因家常州建昌等地，十三世观国(观光)为吴会嗣子，元至元间授平江路录事主司……置宅于琴川跨塘桥北……万登公十五世君正公遭张士诚之乱挈长子通一、五子尊五隐居江阴青阳芦塘，尊五又迁居文林之百丈里”这支孙姓属于较早迁入江阴的一支，迁入时间约在明初洪武年间，华士现存的百丈孙氏也只是百丈总支的一部分，这次新修家谱还只是将部分分支纳入其中，仅此就颇具规模，子孙遍布江阴各地了。

### 六.华士孙氏

家谱有：《孙氏宗谱》全套十五卷(宗祠在陆桥)，堂号：“敦睦堂”，宣统元年(1909)版，存于周庄。这支孙姓的源流情况为“世祖有沙，原姓萧名透。明万历三十三年(1606)入赘同里孙氏，遂改姓



百丈孙氏新修宗谱封面

孙姓，居华墅萃庄为孙氏一世祖。至七世孙君仕，字鸿儒，清乾隆五年(1740)，迁居华墅镇八字尖，营宅而居，遂以农耕。10世孙端崖，字殿魁，……设孙氏义庄，慈事甚力，里人称德……假孙氏义庄创办“养根小学”，造福桑梓，萌泽一方，……孙氏后裔多习儒，书礼传家，名扬乡里，分布全国各地，移居海外者甚多”<sup>②</sup>。孙姓家谱材料也未公开过，因此尚无法得知其具体的源流情况。孙黎明先生撰《书香之家华墅孙氏(小三房)》一文<sup>③</sup>中对孙氏源流所涉也不多，但详细的解读了该支中的孙氏名人；包国良先生的附文《人才辈出的华士孙氏》一文也补充了华士孙氏中的其他支派的名人传略及其名录，在此笔者不再赘述了。

### 七.蔡岐孙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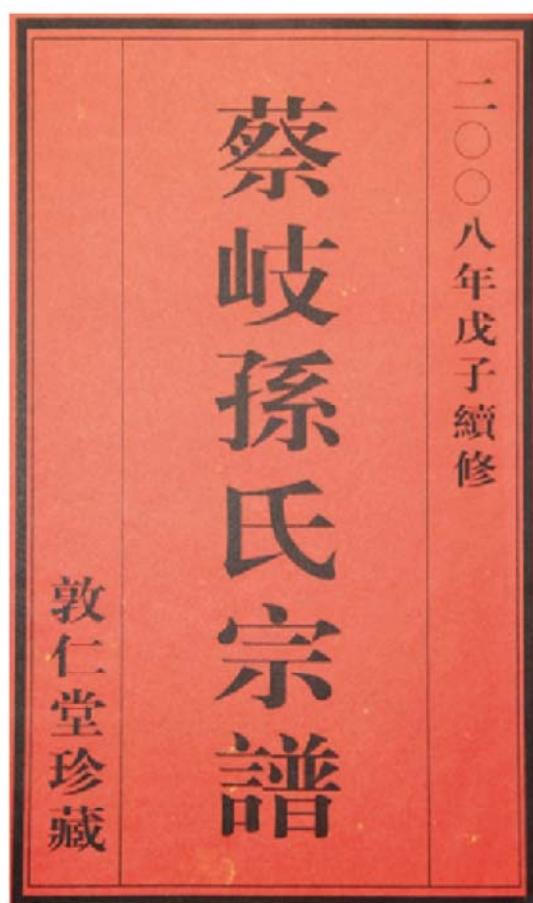
家谱有：《蔡岐孙氏宗谱》(照片五)，2008年新修本，8册，堂号为“敦仁堂”。这支孙氏的源流情况为：“元末朱元璋起兵时，孙兴祖与其曾孙继达随同征战，因战功，兴祖升任指挥使，赐宅宜

兴，后裔遂居宜城及官村等地，开创一派。继达升任总制，赐宅地于常州城内，开创另一派。孙兴祖一脉至明代隆庆年间，其裔孙鑑者，自无锡迁常，始卜居于毗陵之东四十余里即采岐（现蔡岐）为始迁祖也，至今已达四百六十年，后世子孙已繁衍至十七世。后世子孙二分居江阴西湾、香墩、钓台、双桥、下闸、花塘、峭岐、月城桥、庙头村、璜塘、周庄桥、西周巷、凤凰山、长寿、西石桥、黄观嘴等地。”

以上是九支江阴孙氏的源流情况，有谱可查，脉络还是基本清晰的。除此之外，查阅江阴地方文献，对孙姓氏族的记载也不多见。缪荃荪在民国《江阴续志·氏族志》中记载了江阴诸多名门望族，但却对笔者上述所提到的诸多孙姓家族只字未提，不知为何？此外各镇新修镇志中关于孙姓来源的信息，诸如《华士镇志》，上面已经做了介绍了，其它如《新桥镇志·人口》：“孙氏，境内主要是三支。郁桥孙氏，一支为明末从周庄古文桥由孙运侯迁庄桥；另一支为清初自陆桥八字尖迁入。还有一支孙氏系清代从太仓迁入，后裔聚居黄河、何巷两村。”从上的叙述，言简意赅，八字尖一支为华士孙氏的分支，这个没有疑问，而郁桥孙氏和黄河、何巷孙氏因没看到谱牒，其源头情况还不清楚。

江阴博物馆收藏有两方唐代墓志铭，为1993年长泾泾北村孙氏家族墓地出土，其中孙晖墓志铭保存稍好。另一方墓志铭破损严重，字迹无法辨认了，现将孙晖墓志铭摘录如下：“唐故孙府君墓志铭府君讳晖字渐华祖讳太字德仁皇考讳卿字青显专博学群书行孝养亲不仕终日乾乾谁不无羨先祖惟孝门呜呼以君子会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歿于私馆府君享年六十九以大中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安葬于常州江阴县瑞节乡仁兽里后余村西南路当家墓内与夫人寿塚丙首莹之礼也府君娶琅琊郡汤夫人生一子名元谅……”（图六）

出土的这方墓志铭所述的孙姓墓主去世的年代为唐代会昌六年即公元846年，距今已有1166年，这是有据可证江阴地方最早的先民之



新修《蔡岐孙氏宗谱》扉页



江阴博物馆藏唐代孙晖墓志铭

一。墓志铭上的记载相对简要，对家族的来源等也没有介绍，只是记载了世系：孙太→孙卿→孙晖（娶汤氏）→孙元谅，共计四代。但这支孙氏后裔在江阴并未留下其他痕迹，也消失了，或许迁徙他乡了。

根据所列各支孙氏情况，将江阴目前所掌握的孙氏情况总结如下：

一、从已经掌握家谱的孙氏各支俱出自“妫”姓，舜的后代，始祖为唐代孙万登。咸通五年（864）以左金吾上将军领师交趾，后卜居新安休宁黎阳乡之唐田。孙万登这支目前已遍布全国各地，从唐末开始其后裔发展至今约1100余年，规模如此确实叹为观止，江阴一地的孙姓有谱可查的俱出自这支。如“澄江大岸孙氏”、“斜河孙氏”、“观山孙氏”、“百丈孙氏”、“蔡岐孙氏”等。

二.“斜河”、“观山”、“百丈”三支出自孙吴会（孙万登十二世孙），“蔡岐”、“澄江大岸”两支始祖为孙文虎，与孙吴会是族兄弟，孙文虎后裔孙兴祖迁宜兴为蔡岐始祖；孙继达迁常州，为澄江大岸始祖。

三. 其它未有谱牒或者谱牒资料未公开的孙氏各支，因资料的原因，源头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必须得查阅宗谱以后才能知晓其源流。从现在所

能得到的一些资料进行分析尚可看出一些端倪来：“澄江湘派孙氏”堂号“富春堂”，明代由镇江迁来江阴，查阅镇江孙氏谱牒以后判断其有可能出自“润东当沙孙氏”；“澄江千一派孙氏”的主体应该是分布在澄江镇范围内的可能性极大；“百丈孙氏”堂号和“华士孙氏”堂号相同，俱为“敦睦堂”，因此判断华士孙氏始祖萧透入赘的孙氏应该属于百丈孙氏那支，而“沙州孙氏”堂号为“积善堂”，按其他家谱资料中透露的信息来看，属于“敦睦堂”的下面六个分堂之一，因此“沙州孙氏”也极可能出自“百丈孙氏”。江阴地区孙姓绝大部分都出自1100余年前的孙万登。从这点上看，江阴孙氏又是如此的单一性。

#### 四、孙氏各支迁入江阴的年代

最早的是元末明初的“澄江千一派孙氏”、“观山孙氏”，他们在江阴有七百余年的历史了；而其他各支孙氏都是在明代迁入江阴，如百丈孙氏为明初洪武年间；“澄江大岸派”为明代万历年间；“澄江湘派”也是在明代晚期；“斜河孙氏”为明代早期；“沙州孙氏”是在明代早中期；“华士孙氏”和“蔡岐孙氏”分别是在万历和隆庆以后迁入江阴地区的。

五、孙氏各支堂号差异很大，也很无序。“富春堂”、“馀庆堂”、“世德堂”、“积善堂”、“穀贻堂”、“敦仁堂”、“敦睦堂”等等，几乎一支一堂号，堂号的多样、复杂与孙氏始祖的单一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六、江阴地方文献中记录了诸多孙姓名人，从宋代开始一直不断，但似乎都无法与上述各支孙氏挂起钩来，笔者以为这也是缪荃荪为何在《江阴续志·氏族志》中对江阴各支孙氏只字未提的主要原因吧！

江阴文博

#### 注译：

①:《华士镇志》2009年第三编：人口 P259页 华士镇志编纂委员会编 方志出版社出版

②:同①

③:《江阴著姓望族》2008年 徐华根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中国民间器乐合奏《十番锣鼓》

撰文/邵振良

在江阴民间，很早就流行过《十番锣鼓》。

《十番锣鼓》，属于吹打类乐种，简称“十番”或“锣鼓”。所谓“十番”，含有热闹、翻花样的意思，由于乐器组合和演奏形式不同，又有“苏南十番锣鼓”、“苏南十番鼓”之分，也称“苏南吹打”。历史上曾有过“十样景”、“十不闲”等名称，民间俗称“吹打”。《辞海》“十番”条目注：民间器乐的一种，俗称《十番锣鼓》。曲若干曲牌与锣鼓段连缀而成的一种套取。起于明末。叶梦殊《阅世篇·纪闻》：“吴中……有十不闲，俗讹称十番，又曰十样锦，其器仅九：鼓、笛、木鱼、板拨、钹、小铙、大铙、大锣、铛锣；人各执一色，惟木鱼、板以一人兼二色。音节皆应此词，无肉声……且有金、革、木，而无丝竹。万历末，与弦索同盛于江南；至崇祯末，吴阊诸少年又创新十番，其器为笙、管、弦。”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十番鼓，只用笛、管、箫、弦（指三弦）、提琴、云锣、汤锣、木鱼、檀板、大鼓十种。……番者更番之谓。后增笙、钹、器辄不止十种。若夹用锣、铙之属，则为粗细十番。”据二书所述，可知十番原以敲击乐为主，而锣鼓与丝竹合奏则较晚出。十番流行于福建、江苏、浙江等地。据此，《十番锣鼓》应是起于“吴中”一带，明万历末流行于江南，以苏州、无锡为中心，渐次盛行于南京、常州、上海等地，明末清初流传于安徽、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区。《十番锣鼓》起先是以打击乐为主，后来才融合了江南丝竹。

历史上，《十番锣鼓》的演奏主要用于宗教的超度、醮事与民间风俗礼仪活动。《十番锣鼓》的

主奏乐器为笛（间或也用笙），配合使用的打击乐器有铜鼓、板、点鼓、皮鼓、大锣、喜锣、马锣、齐钹、内锣、春锣、汤锣、大钹、小钹、木鱼、梆子等。《十番锣鼓》因乐器组合和演奏配合不同，可以分为“文十番”和“武十番”。《十番锣鼓》常用的锣鼓点和套曲的骨架是《十八六十二》，结构由帽头、主体（身部）、收头组成。《十番锣鼓》套曲式结构中，以“身部”出现“大四段”（即以锣鼓或锣鼓丝竹相间组成的段落，必须变化演奏四次）和《鱼合八》为标志。“大四段”结构独立完整，每一段前有《合头》，后有《合尾》，中间是“十、八、六、四、二”句式构成的锣鼓段的四次变化重复。即：《合头》——一变——《合尾》——细走马；《合头》——二变——《合尾》——细走马；《合头》——三变——《合尾》——细走马；《合头》——四变——《合尾》——细走马。四百多年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不同地区的创新变革，《十番锣鼓》在文学内容、艺术风格、演奏乐器、演奏形式、演奏技巧上都有了新的面目。目前，《十番锣鼓》已经演化出了许多锣鼓演奏方法，其中最有名的是楚州《十番锣鼓》，它具有昆剧音乐与锣鼓曲牌相融合、曲目单一、唱词通俗易懂的地方特色，代表作是《咏花》；还有上海市松江区的古戏乐《十锦》，民间俗称《十锦细锣鼓》，它的特色在于锣鼓的演奏技法和特殊的器具配置，具有古老典雅的地方特色。

《十番锣鼓》这种吹打乐的兴起，是民间农民以自娱自乐为目的，或遇婚丧喜庆，农民自由组合，以吹打助兴而逐步形成的；在城镇则发展成



《十番锣鼓》演奏一景 (邵振良 摄)

为专业或副业性质的“堂名”和吹鼓手，以演奏吹打乐谋生。另外，这种音乐被道家或者僧家所用，俗称“梵音”。其实，苏南地区的许多“梵音”就是“苏南吹打”音乐。“梵音”是道家和僧家们给加上去的宗教色彩名字。《十番锣鼓》所用的曲调有的是宋代的词调曲牌子，如《满庭芳》、《柱枝香》、《剔银灯》等；有的则取自元代以来的南北曲，如《石榴花》、《收江南》、《滚绣球》、《上小楼》等；还有的是流传于民间的曲调名，如苏南地区流行的《下西风》等。虽然经过长期演变，已经与原曲不太一致，但还是能体现出浓郁的、特色鲜明的“苏南吹打”音乐风格。

苏南吹打的《十番锣鼓》曲把《十八六四二》的曲式结构作为程式套曲，使《万花灯》《翠凤毛》《十八拍》《香袋》等乐曲的曲式相类同，因而使每一首乐曲缺乏个性和生气。任何艺术一旦走向程式化，就会失去生命力。这一点可能也是《十番锣鼓》逐渐遭到冷落的原因之一。但就单个类型《十番锣鼓》来看，还是具有极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值

得我们去传承。

江阴地区的《十番锣鼓》盛行在解放以前，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以及西洋鼓乐队的流行，大型宗教、醮事与民间各种风俗礼仪活动不断减少，《十番锣鼓》这一民间艺术也日渐萎缩，即使民间有一些器乐演奏活动，也还是很少有人演得出全套《十番锣鼓》的。

可喜的是，2008年9月，江阴道教协会在组织道教音乐演奏中，还是原汁原味地演奏了一整套《十番锣鼓》，可见《十番锣鼓》在江阴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另外，在申港街道的六苏班演出时，也把《十番锣鼓》列在其中，往往把它作为开场曲，热热闹闹地演奏5到10分钟，演出效果十分热烈。在一些乡镇江南丝竹演出活动中，也能演奏一些片段。其中顾山镇的江祥声(1942.7-)14岁时就跟父亲江永基(1912—1987)学习民族乐器。江永基曾经参加过周少梅开办的培训班，得到了周少梅的《北方戏曲谱》、《国乐谱》、《乐乐集》三本音乐教材。江祥声将这些教材仔细研究，得益匪浅，学会了使用各种乐器的演奏方法，对《十番锣鼓》的研究也很有造诣。他的女婿赵志坚专攻器乐，先后上过无锡艺校、南京师范大学，通晓各种器乐，对《十番锣鼓》也十分了解，能够组织演出《十番锣鼓》。

《十番锣鼓》，将作为江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整理、保护起来，并作为江阴的优秀民间艺术传承下去！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副研究员馆员)

# 亚蒙先生

撰文/唐汉章

亚蒙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却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在我心中有些许减少。尤其每当我看到他生前为之努力保护的诸多文物，许多往事就会涌上心头。

亚蒙先生姓黄，原名宝珪，出身于华士黄氏世家。其兄宝瑜，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因设计台湾故宫等建筑而一举成为著名的建筑大师，且于书、诗、画、篆刻无不精通。其弟宝珉，也是一位艺术家，于摄影、篆刻、书法、绘画都有造诣。他自己除精于绘画与书法外，还热爱祖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热衷于文物保护工作。所有这些是我后来认识他之后了解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是江阴县(第二年撤县建市)政协的副主席。那时候江阴也和全国一样，文物保护工作在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也为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然而当时的文物管理力量很薄弱，负有协调职责的江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机构改革中被精减掉，博物馆还在筹建之中，文物工作主要靠刚由文教局分离出来成立不久的文化局和文化馆文物室承担。作为政协领导的亚蒙先生很关心文物工作，经常跑到文化局来谈文物的事情，经文化科陆云湘科长介绍，我才认识亚蒙先生。知道他曾是原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是一位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和对文物保护非常执着的人。接触多了我们也就熟悉了。

文物保护工作面广量大，涉及到机关各部门

和乡镇。在实际工作中使我深深体会到，没有文管会是很难开展工作的。有一次，我把恢复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想法说了出来，他听后非常赞同。他说，自从文物管理委员会被精简以后，确实存在很大问题，文化局与人家平起平坐，处理问题有诸多不便。由于他的努力，与有关部门达成共识，也得到分管文化工作的副市长徐海锋的支持。于是借江阴撤县建市的东风，由我起草向市政府打了要求恢复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申请，不久便得到批准。

1987年底，江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恢复。由副市长徐海锋兼任主任，亚蒙先生和建委副主任徐汉云、文化局副局长蒋锡源等担任副主任。成员由政协、建委、教委、财政局、文化局、审计局、公安局等领导组成。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文化局，由我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文管会的恢复，对江阴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起到很大作用。每每文物保护遇到重大问题便由



(图一)

文物管理委员会讨论拿出意见。如对江苏学政衙署遗址和仪门以及曹颖甫故居的保护,望江楼建设选址等无不体现该组织的重要性。

1987年,江阴由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那时的政府机关还在江苏学政节署遗址。昔日的学政衙署建筑仅剩一座五开间的仪门,中间一间是进出机关的唯一通道。那时,汽车虽还未成为机关干部代步工具,然而那么多人员进出也够拥挤,于是想将移门拆除,确保畅通。亚蒙先生知道后十分着急,与大家多方奔走,终于得到市领导的理解支持。仪门已作为江苏学政驻节江阴近300年历史的见证(图一)。

1988年的时候,著名经方派大师曹颖甫故居在城市改造中要全部拆除。曹颖甫故居位于司马街中段南侧,座南朝北3开间,前后有5进房屋。建筑不仅有规模,而且颇具江南民居特色,尤其是正厅具有典型的明末清初风格。这幢建筑不仅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是名人故居,拆掉实在可惜。

有一天,我正在曹颖甫故居转悠,正为保护问题一愁莫展。亚蒙先生找到我,交给我一只中信封,是全国政协的专用信封,他说事情可能还有一点希望。我急忙抽出信笺一看,原来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医界耿鉴庭等著名人士致江阴市政协的来信。信中简要阐明了曹颖甫在中国中医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和保护其故居的积极意义,并言辞恳切地呼请江阴保护曹颖甫故居。他要我赶快

交给徐海锋副市长,并建议召开文管会成员会议。

会上,委员们就曹颖甫故居保护问题达成共识,由我起草报告连同全国政协委员的信呈市政府。后来市里经反复论证后作出决定,将曹颖甫故居正厅及两侧厢移建到司马街北侧(今第八商场后门对面),虽然未能在原地保护,但总算为曹颖甫这位著名中医留下了一点遗迹。后来由文化、卫生两局合作、博物馆与中医院实施,创办了江阴第一座(也是全国县(市)第一座)中医药陈列馆。一时成为全国各地中医界领导或专家学者来澄必到参观瞻仰之处,在全国中医界产生了积极影响(图二)。

上世纪90年代初,有关部门在黄山席帽峰建了一座烽火台,成为南瞻古城新貌,北观长江和苏北风光的观景点。但是大家对其造形褒贬不一,称赞的说是为游人提供了登高望远的好去处,反对的说这不符合春秋时期特点,有违历史。关键是省文物部门领导来看后竟说:“这哪里是什么烽火台,分明是日本鬼子的炮楼嘛。”市里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决心重造一座建筑,取名“望江楼”,江阴有企业家愿意出资。事情倒是好事,大家都赞成,但是在选址问题上意见不一。最初的方案要将这望江楼建在东山大炮台临江的一边,这从文物保护角度来说是大忌。为了选择合适的地址,亚蒙先生和我们一起与建设规划部门的技术人员爬上黄山考察了好几个点。最后市里领导经慎重考虑,放弃了原来计划,仍然将望江楼建在了席帽峰上。

然而,选址问题解决后,对烽火台的设计方案大家很不满意。设计者别出心裁,说是望江楼近看似条船,远看象座塔。亚蒙先生和我们应邀参加过好几次论证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造型不伦不类,既不似船,更不像塔。关键问题是越往上每层面积越小,最上面一层仅有十几平方米,容不了多少游客。第二是这么高的建筑仅有一张楼梯供游客上下,人一多便会拥挤,容易产生事故。但是由于设计者是位江苏省著名设计师,方



(图一)



(图三)

案仍被通过。据说该设计师凭此设计,在全国得了大奖,而望江楼建造后的观赏效果和使用效果并不如人意。造好以后,由于缺少安全保障一直空关了好多年。而外观更不敢恭维,如果从东南方向遥看,该建筑好似插在美丽黄山上无比丑陋的一只牛角。

亚蒙先生是个极有历史责任感的人,常在市里有关会议上呼吁重视文物保护,还把保护文物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有一年,我带领博物馆的几位年轻人去对适园进行平面测绘,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陪同亲自作现场指导。当时大家对适园的沿革历史和建筑现状以及它们的名称不甚了解。亚蒙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大家作介绍,有些名称见我们不理解,他干脆拿来纸和笔一一写下来交给我们。当时政协在适园外的一幢房子里办公,适园作为政协活动场地。适园平时的保护,亚蒙先生与政协的领导们也作了很多努力。他到处奔走,请书法家书写匾额,悬挂在每幢建筑的门楣上,增强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由于管理得好,那些年适园一年四季鲜花盛开,使这座古园充满生机(图三)。

亚蒙先生对于江阴博物馆事业发展也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在文化馆主管文物室期间积累了一批出土文物,数量不是很多,但等级很高,这为日后博物馆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当年将黄山西山坡建的常青楼改为博物馆,恐怕亚蒙先生是积极

主张的一个,博物馆的建成让他非常高兴。1988年8月18日上午,博物馆举行开馆仪式,只见他手捧一只精致的石香炉来到会场,祝贺江阴有史以来第一座博物馆的诞生。这只青石质香炉体积虽不大,但重量不轻。那时公园路、虹桥路还没修通,从城里到达博物馆要从朝阳关沿如今的朝阳路(当时还是砂石路面)再进林场绕很长一段道路,不知他是怎么将这么重的石香炉带上山的。交给我时,我问他石香炉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是北干宿舍施工工地发现的。他叮嘱我说,你们要经常到施工的地方转转,能发现一些东西。

又过了一些日子,他打电话告诉我,说是北干宿舍基建工地发现石鼓墩(石柱础)。我赶到现场,亚蒙先生已在太阳底下等我多时了,真是让我感动。3只石柱础有规律地半埋在地下,根据勘



(图四)



(图五)



(图六)

察这应该是乾明广福禅寺大殿上的金柱柱础，应该有4只，但在另一只柱础相应位置只留下一个土坑，柱础已不知去向，甚为可惜。这石柱础上圆

下方直径在80公分左右，上刻一周婴戏牡丹图案，精致异常，为宋代典型之物，而乾明广福禅寺正是建于宋代(图四、五)。

还有那一年建第八商场时，司马街一批平房要拆除，原大司马牌坊上的一对石狮子，一直在一户市民家里。亚蒙先生经常去现场勘察，几次催我赶快去搬到博物馆，生怕被损坏或流失掉。当我去搬运时，那户老乡还主动把埋在地下保存了几十年的大司马牌坊上一块圣旨石捐献出来。正是由于亚蒙先生的高度责任心，这几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才得以保护，如今都陈列在博物馆的石刻馆内(图六)。

亚蒙先生也非常重视民间流散文物的征集。在政协工作的蒋治谷老先生收藏有一只青花海碗，经亚蒙先生做工作，蒋老毅然同意将其捐献给国家交博物馆收藏。亚蒙先生把我叫去，参加他专门在适园得蝶绕云山馆举办的捐献会。有人也许会说不就是一只碗嘛，还要开什么会，这么隆重。然而，在我看来亚蒙先生决非小题大作之举，而是要通过这样一种形式郑重地表彰蒋老先生的义举，同时也是宣传的过程，让与会者得到教育和启迪。这才是亚蒙先生的良苦用心。

亚蒙先生对江阴历史文化保护所作出的贡献我们是不能忘记的。他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对我教育尤深，得益匪浅。在工作实践中，我常以亚蒙先生为榜样，鞭策和激励自己，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开创江阴文博事业作出了积极努力和应有贡献。

谨作此文，表达对亚蒙先生的不尽思念。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博物馆原馆长)

# 森林卫士——啄木鸟

## ——江阴博物馆馆藏鸟类标本掠影(二)

撰文/符蕴

被誉为“森林医生”的啄木鸟，分布在我国的种类有37种，啄木鸟是人们最喜欢的一类鸟，遍布大江南北。啄木鸟很早就为古人熟知。据《甲骨文编》载，在商代甲骨卜辞上，已有啄木鸟的象形字。西晋时代女诗人左芬就有一首《啄木诗》：“南山有鸟，其名啄木。饥则啄数，暮则巢宿。无干于人，惟志所欲，性清者荣，性浊者辱。”诗中写啄木鸟，默默地辛勤劳动，不善炫耀功绩，是多么的可爱。

啄木鸟栖息于山地森林和果园之中。啄木鸟的支撑尾羽呈楔形，羽干刚硬，具有辅助稳定作用，能撑在树干上支持体重。从而极大地方便了它们的攀树，使它们在啄食和来回攀爬期间身体完全不贴于攀爬面从而能够保持一种放松的姿势。啄木鸟的头骨十分坚固，由骨密质和骨松质组成，其大脑周围有一层绵状骨骼，内含液体，对外力能起缓冲和消震作用，它的脑壳周围还长满了具有减震作用的肌肉，能把喙尖和头部始终保持在一条直线上，使其在啄木时头部严格地进行直线运动。这是一种特殊的适应性，可以保护啄木鸟的内部器官尤其是脑在啄击时不受震荡影响。这种保护对啄木鸟而言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啄击活动，有人对啄木鸟敲打树木的次数作过统计，每天约500-600次（如黑啄木鸟每日的啄击次数为8000-12000次）。现代防护帽的结构也是从啄木鸟头部防震构造中获得了启示。啄木鸟的嘴强直如凿，舌细长，伸缩自如，且前端有钩，富有粘性涎液，

察觉有虫时，啄破树皮，以舌探入十多厘米，把虫或虫卵取出。

啄木鸟还长得很漂亮，被人饲养作笼鸟。啄木鸟平时是一种“哑鸟”，但到春季，也唱“情歌”，除了有节奏地发出“笃笃——笃”啄木之声，还能发出如尖锐的笛子声“滴——滴——”，一个音阶比一个音阶短促。雄鸟还会用嘴和羽翼引诱雌鸟，把雌鸟带回自己啄好的树洞巢内。下面要介绍四种啄木鸟，均出自江阴博物馆馆藏标本：1. 黄冠绿啄木鸟、2. 栗啄木鸟3. 黑枕绿啄木鸟4. 大黄冠绿啄木鸟

### (一) 黄冠绿啄木鸟 (学名: *Picus chlorolophus*)

中文学名：黄冠绿啄木鸟

隶属于䴕形目啄木鸟科绿啄木鸟属

形态特征：中等体型

(26厘米)的亮绿色啄木鸟。枕部冠羽具蓬松的黄色羽端，脸部具红色纹理及白色颊线。雄鸟以具红色的眉纹和颊纹以及白色的上颊纹为特征。雌鸟仅顶冠两侧带红。两胁具白色横斑，飞羽黑色。虹膜红色，嘴灰色，脚绿灰。叫声响而尖的告警声，或单声作叫。

生活习性：分布于海拔800-2000米亚热带森林的非常见鸟。出现于常绿阔叶林和混交林中、竹林和林缘灌丛地带。习性喧闹，常单独或成对



黄冠绿啄木鸟

活动,有时以小群或跟随混合的大鸟群移动。以昆虫为食,偶尔也吃植物果实和种子。

## (二) 栗啄木鸟(学名:*Micropternus brachyurus*)



栗啄木鸟

中文学名:栗啄木鸟  
隶属于鶲形目啄木鸟科栗啄木鸟属

形态特征:是一种红褐色啄木鸟,除尾羽外,各羽都有黑色横斑,尾羽则具有黑色点斑。雄鸟眼下和眼后部位具一红斑。

生活习性:喜低海拔的开阔林地、次生林、森林地带、园林及人工林。啄木声少能听见。叫声:短而急。

## (三) 黑枕绿啄木鸟(学名:*Picus canus*)



黑枕绿啄木鸟

中文学名:黑枕绿啄木鸟(灰头啄木鸟)  
隶属于啄木鸟科绿啄木鸟属

生活习性:体长约30厘米。通体绿色。额部和头顶镶有一块鲜红色的大斑,红绿交相辉映,分外亮丽;4枚脚趾排列成两前两后的对趾型。

形态特征:黑枕绿啄木鸟是我国啄木鸟中分布最广和最常见的种类,也是长年停居在本地的留鸟。黑枕啄木鸟总是伴随着树林而出现,并且是以隐藏在林木体内的害虫作为主食。又短又钝的翅膀表明啄木鸟并不是善于飞翔的鸟种,它们

具有一对短而有力的鸟脚和两前两后对生的脚趾,使身体能够牢固地抓住垂直的树干,一般情况下是很少来到地面的。夏季常栖于山林间,冬季大多迁至平原近山的树丛间,随食物而漂泊不定。有些被蛀虫、毒蛾、天牛、松毛虫等糟蹋得濒临毁灭的大片森林,也经常由于招来和保护了啄木鸟,得到了拯救。

## (四) 大黄冠绿啄木鸟(学名:*Picus flavinucha*)

中文学名:大黄冠绿啄木鸟  
隶属于鶲形目啄木鸟科绿啄木鸟属

形态特征:体形较大的绿色啄木鸟,喉黄色,具形长的黄色羽冠,尾黑。飞羽深棕色,每片羽毛都有宽阔的黑色横斑。体羽局部绿色。与黄冠绿啄木鸟的区别在头部无红色。

生活习性:主要栖息于海拔2000m以下的中、低山常绿阔叶林内。常单独或成对活动。多往返于树干间,沿树干攀缘和觅食,有时也到地上活动和觅食。飞行呈波浪式。叫声和黑枕绿啄木鸟相似。以昆虫为主食,亦吃浆果。为常见的留鸟。

啄木鸟对保证树木健康有着重要作用,它能消灭大量害虫,特别是能消灭树干中的害虫,为其它鸟类所不及,也是其它杀虫方法所解决不了的。没有树木就没有氧气,没有氧气就没有人类,所以,我们要保护啄木鸟!

**江阴文博**

(作者:江阴博物馆科研部主管)



大黄冠绿啄木鸟

# 2012年江阴市文博大事记

## 1月

3日 江阴市博物馆在陶瓷馆和书画馆举办的“东方紫玉——文人紫砂艺术作品展”、“墨韵陶情——史国富国画陶艺作品展”结束,两展览于2011年12月29日开展。

6日 江阴市博物馆在奇石馆、书画馆、服饰馆举办“穆家善焦墨画国际巡回展”,1月10日结束。

7日 江阴市博物馆在陶瓷馆举办“迎新春·澄怀观壶”-鲍志强、季益顺、许艳春紫砂艺术展”,1月13日结束。

18日 副市长龚振东主持召开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员会议。

20日 江阴市博物馆在书画馆金银玉石馆书画馆举办“藏家藏炉展”,2月14日结束。

江阴市博物馆在书画馆举办“第四届江阴市青年书协迎春作品展”,4月16日结束。

江阴博物馆在陶瓷馆举办“悟对中西-俄罗斯功勋艺术家塔季扬娜、谢尔盖油画展”,5月18日结束。

## 2月

2日 香港凤凰卫视《大视野》栏目组来刘氏故居拍摄《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刘半农》场景,2月3日结束。

12日 江阴城事义工一行30人参观江阴市博物馆。

20日,总政治部《解放军画报社》马凯旋主任、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社》范清尧主任由武装部尤政委陪同参观刘氏故居。

## 3月

7日 镇江博物馆杨正宏馆长一行参观江阴市博物馆。

27日 宜兴文联一行20余人参观刘氏故居。

江阴市博物馆征集城东街道金童村金童桥桥石。

## 4月

1日 国家一级演员、中国音乐家二胡协会副会长李祥章一行,参观刘氏故居。

8日 《塔影国乐社》老年乐队将刘氏故居作为民乐活动场所,每周活动1—2次。

10日 江阴市博物馆考古部清理青阳镇街西村村委苍头村北侧古井遗址,出土执壶2个、汲水壶1个。

12日 浙江桐乡宣传部长一行15人参观江阴市博物馆、刘氏故居。

15日 市宣传部、文广新局、邮政局在刘氏兄弟故居举行《中国现代音乐家》纪念邮票首发仪式。

18日 江阴市博物馆在书画馆举办“名家走进江阴—李彤、王霖书法作品展”,4月26日结束。

20日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先生一行参观江阴市博物馆。

21日 刘氏兄弟故居与无锡高等师范学校签订《缔结青年志愿者活动基地》协议书。

25日 省人大常委会《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组在市人大副主任倪颖伟陪同下来江阴市博物馆检查和指导工作。

28日 江阴市博物馆在书画馆举办“名家走进江阴—书镜张良勋书法作品巡回展”,5月4日结束。

本月 徐霞客故居及晴山堂石刻保护规划报送无锡市文广新局并呈江苏省文物局审批。6月通过无锡市局审定,报省文物局批准。

## 5月

3日 无锡市鸿山遗址博物馆郭会泽馆长一行参观江阴市博物馆。

8日 新疆霍城县委宣传部领导一行参观江阴市博物馆。

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批少年班学生60载老校友14人及部分家属共20余人由刘育熙带领来刘氏故居参观,并敬献鲜花。

9日 江阴市博物馆在书画馆举办“翰墨壶韵—中国画·紫砂壶艺术作品展”,5月14日结束。

17日 江阴市博物馆接收捐赠的清至解放初契约合同和宣统时期的《时事报图画》和《时事报图画杂俎》。

18日 江阴市博物馆在服饰馆举办“景德镇陶瓷展”,5月27日结束。

19日 国家环保部万本太总工程师参观江阴市博物馆。

22日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江阴博物馆在书画馆、陶瓷馆举办“江苏省文联艺术家走基层惠民活动暨南京?无锡?江阴三地书画家邀请展”,6月26日结束。

23日 上海闵行博物馆蔡宏馆长一行参观江阴市博物馆、刘氏故居。

25日 国内著名抽象派画家鹿林、油画家朱鲲参观刘氏故居。

本月 启动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备案工作。

## 6月

5日 连云港灌南县组织部部长一行10人参观江阴市博物馆。

6日 如东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一行

10人参观江阴市博物馆。

江阴市博物馆梅雨季节前科研部对老馆木质家具等进行防霉防蛀养护工作。

博物馆考古部与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新沟河(江阴段)进行考古调查,涉及申港街道、南闸街道、月城镇和青阳镇。此次调查共登记遗址点5个,全部位于申港街道,在遗址点上采集到历史时期的陶片、瓷片若干。14日调查工作结束。

10日 科研部与上海科技馆合作对馆藏动物标本进行上半年的大保养。

武进县文广新局领导一行参观江阴市博物馆。

15日 江阴市博物馆“奢华的艺术—中国江阴博物馆馆藏金银器精品展”赴厦门华侨博物院展出,7月10日结束。

30日 江阴市博物馆在书画馆、陶瓷馆举办“我心中的美丽家园”扇面、书法展,7月30日结束。

本月初开始,文广新局组织各相关单位开展2012年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文化遗产宣传版面进行巡展。

## 7月

3日 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陆文宝馆长一行参观江阴市博物馆。

12日 作为文物普查的后续工作,为即将公布江阴市文物普查成果作准备。江阴市博物馆对澄江街道北门街区、南门社区及另外的一些文物普查点和第一批历史建筑推荐点进行重新排查,共调查北大街、同兴里、缪家场、光孝坊、新民巷、小桥河沿、忠义街、石子街、埠下街等地的古建筑及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共67个。排查工作为期3天。

16日 日本二胡协会85名师生参观刘氏故居。

19日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包燕丽等人组成的考察团一行5人(包括广东博物院、日本九州博物馆工作人员)来馆鉴赏馆藏出土漆器。

24日 市政协原主席黄满忠率学习文史委成员,检查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考察了祁头山遗址、适园等文保单位。

31日 我市召开祁头山遗址保护规划初步成果论证会。由江苏省文物局、无锡市文化遗产局以及我市各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对由南京博物院编制的规划进行了论证。

## 8月

2日 春晖社区夏令营参观江阴市博物馆。

6日 北京中央民族音乐学院来博物馆拍摄大师王国潼刘天华相关资料。

博物馆馆长董录科陪同天华第二代传人、二胡大师王国潼等人参观刘氏故居,王国潼大师于故居演奏二胡曲《病中吟》。

7日 人民西路社区夏令营参观江阴市博物馆。

11日 江阴市博物馆安防改造工程开始进行,各陈列展厅开始撤展。

15日 2012年第一期《江阴文博》出版。本期文博使用全彩版印刷,是继去年改版后的又一次改版尝试。

21日 江阴市博物馆对出土石器的云亭街道蔡村器物出土点调查,发现部分与余城遗址同时代的细碎陶片,该遗址位于余城遗址东边,由蔡村花木基地保护,保存较好,与余城遗址有较大关系。

28日 江阴市文广新局公布江阴市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306处。

29日 江阴市博物馆参与江苏省传统村落调查,全面掌握我市传统村落的类型、数量、地理分布特征及现状条件等形成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提出传统村落保护意见。

## 9月

11日 兴化市博物馆张长仪馆长一行参观江阴市博物馆。

20日 江阴市博物馆顺利通过了档案局对博物馆档案的检查。

26日 江苏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弘强由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蒋洪亮陪同下参观刘氏故居。

本月开始,全市实行不可移动文物管理情况巡查月报制度。

本月,遵照国家文物局要求,开展2012文物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活动。

## 10月

11日 江阴市博物馆采集南闸街道泗河口海港大道凤凰山隧道绿化带出土文物,铁牛3件和铜镜一面。

10月底 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牌全部安装、更新完毕。

本月 文管会完成省级以上文保单位的电子资料档案建档工作,其余市级文保单位已初步录入数据库。

本月开始,江阴市博物馆科研部针对馆藏钱币与纸质类文物实施RP保护。

## 11月

1日 徐霞客故居修缮布展工程通过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物局专家组验收。

12日 刘氏故居开始进行常规保养性维修。

13日 江阴市博物馆接收贯庄村贯庄小区徐纪云、徐竞荣捐赠的明徐鉴墓志。

28日 举办江阴市文物保护业余监管员培训,来自全市17个镇、街道办事处的30名业余监管员参加了培训。

29日 江阴市博物馆馆长董录科带队赴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闵行博物馆进行为期3天的学习交流活动。

## 12月

8日 中国水彩画名家平龙先生来江阴市博物馆进行有关水彩讲座。

本月,江阴博物馆科研部符蕴被评为“2012年度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优秀工作者”。

(王晓娟、宋荔)